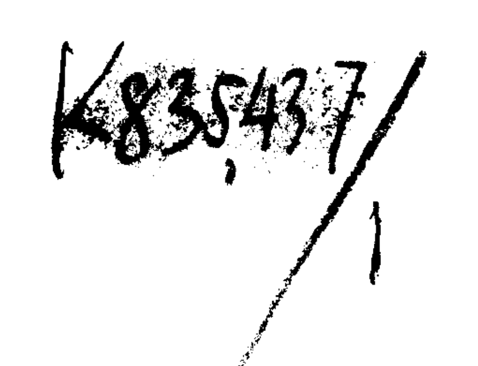
铁托
内幕故事

〔南〕米洛万·吉拉斯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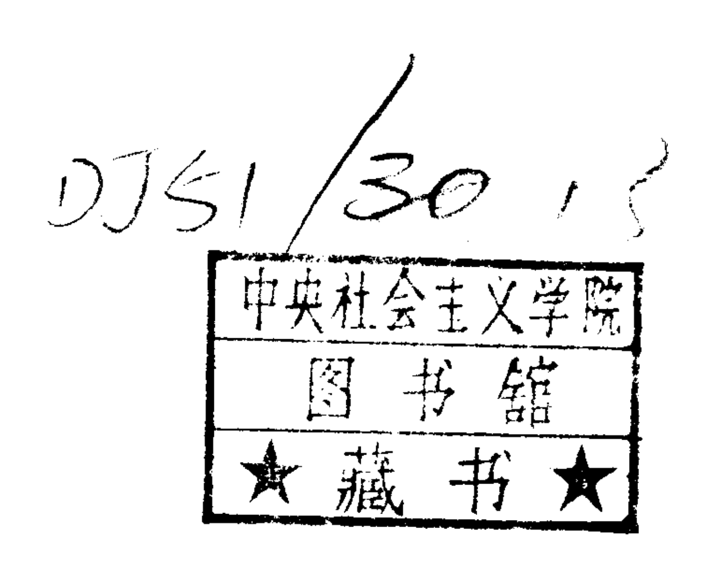
新华出版社



铁　托：

内幕故事

〔南〕米洛万·吉拉斯 著
柯　　雄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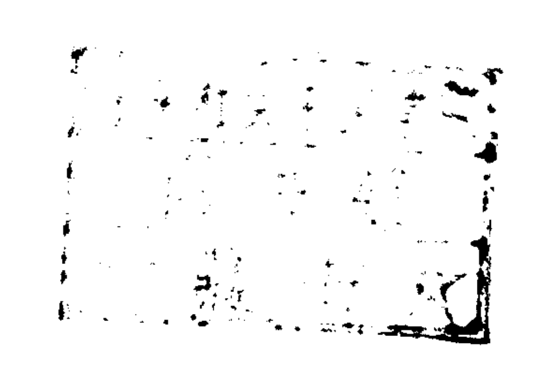
新　华　出　版　社

出版说明

美国哈考特·布雷斯·约万诺维奇出版公司一九八〇年出版了《铁托：内幕故事》一书。作者米洛万·吉拉斯（旧译德热拉斯）（一九一二——　），为南斯拉夫作家、政论家，早年加入南斯拉夫共产党，一九三五年起当选为南共中央委员，后为政治局委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南斯拉夫人民反法西斯武装斗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解放后，仍为南共主要领导人之一，并任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主席。南共六大后，特别是一九五三年以后，陷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立场，发表文章，与南共中央的方针路线相对抗。一九五四年一月，南共中央全会斥其为修正主义分子，吉拉斯旋即被免去党内外职务。两个月后，吉拉斯宣布退党，后曾两次被判刑，现居贝尔格莱德。

吉拉斯在本书里叙述了他跟铁托的分歧和决裂，着重写了铁托的为人、品格以及私生活。他承认铁托“是一位伟大的、具有很大独立性的政治家”，“在共产主义运动的范围内是取得独一无二的成就的政治家”；同时，吉拉斯也说，“我做不到无偏见”，因此在书中也对铁托写了不少贬损之词。但鉴于吉拉斯早年追随铁托，曾多年密切共事，书中所述铁托的许多情况实属“第一手资料”，是过去局外人所不了解的；吉拉斯在书中，也谈及对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若干问题的看法，值得注意，有些段落对共产主义不乏诋毁之词，谅读者自能鉴别。

一



人集“天使”和“魔鬼”于一身，这一说法虽说平庸无奇，但却无法驳倒。如果认为这两者当中的哪一点是主要的，那就错了，或者是在欺骗自己。天使和魔鬼的成分常常合在一起；在这两者之间有一种相互的作用，后者利用前者，而前者又为后者开脱。承认自己的本性的这一双重性的人，才能感受到胜利是最美好的。他可以本着他所承继的或者他所倡导的理论准则发挥这种双重性。

这一点表现得强有力和彻底，莫过于在政治中。政治决定一个民族和一个社会的生活，是人类活动最充分最高级的形式。政治最高度地集中了生活。列宁对政治的看法受到经济占首要地位这种教条的影响，但是经济教条并没有妨碍他成为可能是极权主义精神最强的政治家之一。

一个真正的政治家，一个实实在在的有血有肉的人，既不可能是天使，也不可能是魔鬼，对于他来说，政治是一种职业，不论这是一种更高的生活的力量强加于他的，还是他自身独一无二的创造性才能要求于他的。他越过这些过分简单化的“天使”或“魔鬼”的界

限，并不意味着政治家是超人。他不是超人。他不同于其他人的是，他具有比较强烈的政治本能，这种禀赋其他人也有，不过少一些罢了。的确，政治家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从本能而言，他既不是善，也不是恶。如果他克尽职责地行使政治权力，如果他在胜败和生死的危急关头敢作敢为，手腕高明地处理问题，他就不可能是“天使”或“魔鬼”。

我认为这些想法并不新鲜。在亚里士多德和马基雅弗利之后，很难有人能就政治这个题目说出什么新的见地。我不打算谈理论。我在这里仅根据我个人的经历和知识谈谈。更确切地说，我只谈谈我对约瑟普·布罗兹·铁托的看法。可以料想到，我将既涉及他的基本政治活动，也将涉及他的品格的基本方面。

我的生活过去和现在都是跟铁托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在这方面，最强有力的因素是铁托本人的品格。铁托是最完整、最复杂、最高深莫测的政治家之一。我认为，不仅在当代，也不仅在巴尔干这一狭小的范围内，人们都是这样看待他的。

铁托作为文学写作和政治评价的对象，他那动荡多变、光彩夺目的生活道路使他增色不少。他极好地表明了坚定的人格和独特的政治之间的联系。他是一个“政治人物”，他的私生活只有联系他的政治倾向才对我们有吸引力。诚然，从文学的角度去研究铁托的人格形成的相互关联的过程，既是富有教益的，也是令人神往

的，特别是因为他象征着民族共产主义的造反，象征着民族共产主义的异端。

我探索过这一象征是靠什么建立起来的，这促使我总结一下我对铁托的了解和我对他的感情。我不是偶然地或者无动于衷地这么做。我知道，当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全世界都在焦急不安地注视着，而南斯拉夫人则是忧伤地注视着铁托最后病况的戏剧性过程、他的去世以及去世后的情况。

首先，我与铁托的关系并没有了结。我们二十六年前在意识形态上分道扬镳了，但是，对于我来说，个人的种种联系并没有中断，虽然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中断个人联系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我认为，我无愧于他。我的所作所为，都是出于我自己的信念，分析到头，也是由于我自己的缘故。但是，我必须承认，关于政治，我大多是从铁托那里学来的，当然，我不是他的信徒，也不是他的学生。通过铁托，我看透了政治和政治生活的实质。但是我反对幻想和奢望。我所追求的是开放的社会，个人享有自由，经济上和政治上实行多元主义。我所向往的是法律的力量，而不是力量的法律。

可以有保留地把这看成是一种反面教育。这样一种教育——修改和重新调整我们对铁托的了解——可以成为运动和发展的基础。铁托身后的南斯拉夫在当代可能是重要的。

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教育作用大体上——即使不

是根本上——是告诉我们如何有所不为。有所作为和进行创造，是根本教不会的。这么说，并不缩小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意义；没有什么能贬低铁托或者他起了决定性作用的事件。生活和政治是无法约束的，它们日新月异，不断进行再创造，只要是不甘堕落，不陷于衰败的话。

这样的反面教育是奇妙的。这一点是铁托教给我的，虽然我只是在同他决裂以后才逐步认识到这一点。一九五三年年底和一九五四年年初，在那个时候，我完全意识到，自觉地意识到，我得同他，同他的党决裂。否则，我就会失去自己的面目，在他的显赫权势下变成苍白一片。我不怀疑，当时我一心想着个人的命运，这使得我看不清楚铁托政治品格的真相以及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多少东西。

二

引人注目的是，约瑟普·布罗兹·铁托除了有政治才能以外，别无其他专长。他智力过人，才思敏捷，能够有选择地全神贯注思考问题。我发现斯大林也具备同样的特点。不过，斯大林考虑问题更加透彻（虽然稍微迟缓一些），并显示出一种更加敏锐更加全面的洞察

力。

铁托的长处表现在他逻辑严密，目的明确。当他有什么事情不清楚的时候，当他对某个问题还没有想透彻的时候，他显得小心翼翼，甚至有些茫然。这种情况很少发生，通常只出现在意料不到的情况下。他常常想得快，说得慢，因此在公开场合他往往把两、三个句子并成一句话说出来，显得结结巴巴，含含糊糊。

铁托事实上并不擅长讲话，但是他决不限制自己公开露面的机会，更不用说放弃这样的机会了。作家拉多万·佐戈维奇在他还是共产党的一名高级官员的时候，有一次说了一句俏皮话：如果不给铁托讲话的机会，他会死掉。实际上，铁托正是通过经常向记者发表谈话和向听众发表演说来进行工作的；通过这些谈话和演说，他对事件作出反应，提出变革的倡议，从而提高他个人的威信，确认他作为一位不可或缺的领袖的作用。诚然，党支持他发挥这一作用，人人都承认他是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人物，铁托本人也始终意识到，并精明地起着这样的作用，使得这种作用显得是生来固有的。

但是，当问题是具体的而且是尖锐地提出来的时候，特别是在党内发生分歧的时候，铁托懂得如何讲话来打动人心。他由于反对马尔科·尼凯集奇试图扩大塞尔维亚党内自由化倾向而发表的那次讲话（一九七二年，在塞尔维亚共产主义者临时召集的一次会议上发表的讲话），是思想有条理、字斟句酌和巧妙说服的一个典范。

在他不得不就国内事务或外交事务作报告的那些公开的礼节性场合，他的表现最蹩脚。铁托的写作大体上也是如此：他的正式报告过于冗长，文句笨拙，而他就一些具体问题写的文章则条理清楚，明晰易懂，直截了当。

铁托受的教育是不足的。由于他上学不多，作为锁匠的学徒受的训练有限，只能是这样。但是他所知道的东西比杂乱的教育使他懂得的东西要多得多。在我在监狱中偶然相识的所有工人共产党员中，以及在地下革命者中间，有许多人是很聪明的，但是铁托以其广泛的知识和敏捷的理解力而出类拔萃。他似乎什么都懂得一点，但是他内心是痛苦的，因为他对文学、艺术和哲学所知不多。

他还因手指伤残而感到痛苦；在他当机修工的时候，他左手食指尖曾被机器轧伤。这好象是他身上的一个标记，说明他的出身仅仅是一个工人而已。只有在政治上有利的时候，他才暗示他的出身是工人。甚至在他从事地下工作的时候，他也穿戴得象一个纨裤子弟，一九三四年，他加入一个登山俱乐部，他填的职业是电气技师。他伪造的身分证上说他是一名工程师。

在一般技术问题上，不只是在摆弄锁这样的事情上，他的手艺是很不坏的。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作为一名战俘在西伯利亚养病期间，曾操作一座蒸汽磨坊。三十年代初，他在克罗地亚的莱波格拉瓦蹲监狱时，管过发电站。在跟他一起参观工厂的时候，我注意

到，他对所有的机器和机械加工程序都不生疏，新东西特别引起他注意。他熟悉农业和农业生产。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他用党的基金在萨莫博尔买了一座葡萄园，战后又扩大了这座葡萄园，盖了一幢别墅，他让他哥哥住进去。在那里，他常常向我们详细介绍酿造葡萄酒的过程。

但是，除了他受过训练的、在某种程度上他感到不光彩的金属加工的手艺外，他的知识肤浅，没有什么深度。甚至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也是不足的。他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主要著作，对于经济理论和历史则只有一星半点的了解。他是在监狱里，在莫斯科的党校里断断续续地学习“马克斯主义经典著作”的。莫斯科的党校要求死记硬背，人人都得在会上表明自己是忠诚的。然而，有人对我说，在监狱里，铁托是一名自觉和出色的“学生”。

据我所知，战后，他没有劲头十足地读书，虽然说句公道话，他的时间不多。他只是浏览一下标题，粗略地看一下新闻报道。但是电报、报告、南通社的《参考消息》，他看得很仔细。他对于小说不感兴趣，但对写小说的人反倒有兴趣。

他喜欢弹钢琴，甚至学会了弹几个简单的曲子。在他年轻的时候，他认为弹钢琴是文化上有教养的一个标志。在他处于权力的顶峰的时候，他把这一点看成是他的特殊作用的另一个方面。他舞跳得不坏，稍显拘谨，

但却是优美的，通常是跳老式的华尔兹舞。

显然，铁托学语言并不费劲。战后，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一九四八年同苏联发生冲突之后，他英语掌握得相当好，足以阅读和理解比较简单的政治文章。他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一名战俘学会了俄语的，虽然他看来从未透彻地研究过俄语。他常常把发音相同而意义不同的塞尔维亚文和俄文的单词混淆起来。不过，他的重音和发音还是很过得去的。他的听力和记忆力很好。他的法语很蹩脚，尽管他在巴黎呆了相当长的时间（从事党的活动）。我认为，德语是他掌握得最自如的一门外语。我听过他用德语会话，但是我自己的德语很蹩脚，无法评价他的德语如何。

总的说来，他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说得最糟。他讲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时最大的错误是把克罗地亚的成语同塞尔维亚的成语混淆起来。还有，他的发音倾向于他家乡扎戈尔耶的方言。他经常应用俄语中的成语。他的公开演说只是更使人相信说他不是“我们的人”而是一个俄国人的谣言。在知识分子中间，有人听说，他没有费心思去学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

甚至在晚年，借助于良好的记忆力，他仍然学得很快。我一九三七年第一次见到他时，他的拚音都不太确切，虽然他的语法是准确的，造句是有条理的、组织得很好的。他乐意接受别人的建议来改进自己的语言，除非这些建议损害了他讲话的含义。战后，我常常跟佐戈

维奇一起为南通社编辑他的讲话，小心地保留讲话的含义。铁托明白这样的编辑加工是必要的，但是他从来不让他不信任的人做这件事。我还记得另一个事例，可以说明他学得多快：战后，有一次，他用了“SINE QUA NON”①这个片语，他使用得当，但发音错了。我指出了他的错误。他再没有重犯过。

根据我的判断和体会，铁托在军事上并没有什么突出的才赋。当然，我指的是最严格意义上的军事才赋，作为一个杰出的司令官在作战中作出出敌不意和正确的决定，使人产生信心的那种能力。根据我战时的回忆，我一直对他作为一位战术司令官的军事知识和能力表示怀疑。我们一些最优秀的军事领导人也都持有这一看法，铁托知道这一点。一九七八年在奈雷特瓦河畔发表的一次讲话中，他对这种看法，间接地也对我进行了驳斥，强调说从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他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后，曾在莫斯科刻苦钻研过军事战略。

跟铁托的大多数讲话以及半官方的传记中的说法一样，必须对这番话加以仔细的考察。首先，铁托在莫斯科呆的时间太短，他在共产国际里的工作太忙，对于军事科学至多只能有一个粗略的了解。诚然，莫斯科党校的外国学员都得上战术课，但是这种教育是一般的和肤

---

① 拉丁文片语，意为“绝对必要的条件”、“必具的资格”。

——译者

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奥匈军队里当一名军士的经历要有价值得多。这反映在他承认战争的恐怖，他对军事组织和军队实际生活有很深的感受。

不论他正规的军事知识的范围有多广，他不具备一位军事领导人的才赋。他常常草率从事，紧张不安；他对个人安全的考虑压倒了一切；他有时发布自相矛盾的命令。他有时不顾战况的进展，奇怪地下令调动大部队。

这么说是否太苛刻了？我认为不是这样。在他直接指挥下进行的三次最大的、最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暴露了这些缺点。这三次战役表明了一些失算和贻误战机的情况，而这些是一位比较镇静沉着、更为熟练的总司令本来可以避免的。

一九四一年秋季的德军第一次攻势的高潮是我们丢掉了以乌日采共和国闻名的解放区（以及塞尔维亚西部和中部的解放区），在此之后，极度的混乱和惨败使得铁托提出辞去党的书记职务。造成这次大失败的肯定还有别的因素。这次大失败使最高统帅部只带着不到两千游击队员撤离塞尔维亚。无疑，左翼的煽动，残酷的恐怖，“旧制度”残存的影响，都起了作用。但是最高统帅不能随机应变和缺乏远见，起了决定性作用。

在德军第四次攻势（“白色战役”）中，特别是在一九四三年初春关键性的奈雷特瓦战役中，铁托不断改变命令。他过早地决定破坏横跨奈雷特瓦河的大桥，严重地妨碍了撤退，使得撤退复杂化。局势格外困难。尽

管有失误，作出了错误的决定，总的来说，这一仗仍然被认为是一个胜利，但是应该更多地把这归功于战场指挥官的足智多谋，而不是归功于最高统帅。

在德军第五次攻势（“黑色战役”）中，铁托一反他惯常的做法，迟迟不下决心。在那次攻势期间，我在别处，但是我听说，铁托显得不知所措，总想跟他的随从人员单独在一起。我在别的地方曾写过，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对于那些没有“等”他就进行了挽救败局的突破的领导人，他感到恼怒。

在这些战役中，铁托作为军事统帅是不相称的，这并不意味着铁托没有强有力地展示他作为政治领袖的品质。保卫乌日采的战役是一场灾难，但是乌日采共和国的政治活动和组织活动，给我们本国的经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奈雷特瓦战役使我们国内的主要敌人——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1]领导下的切特尼克分子[2]遭到

---

① 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一八九三——一九四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南流亡政府大臣、军队参谋长，并为反动民团组织切特尼克的头子，一九四一年投靠德意法西斯，与南共领导的武装部队作战。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六日被人民政权判处死刑。——译者

② “切特尼克”原为“参加队伍的人”之意，最初出现于十九世纪后半叶，系非正规志愿武装人员，为摆脱土耳其奴役而斗争。后为南王室所利用，变成了反动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切特尼克站在德意占领者一边，反对南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其首领为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译者

失败，他们再也无法恢复元气。这一仗使得铁托的新的游击队军威大振，并为盟国承认铁托和新南斯拉夫开辟了道路。苏捷斯卡战役是革命力量的意志对一支现代化军队取得的一次胜利，这一意志无疑是铁托的毅力和精神同我国人民容易发作的造反精神相结合的产物。再者，铁托很快就摆脱了失败和软弱。他没有去卖弄大道理，没有作多少自我批评，但却吸取了教训，增长了见识。好象他身上有一种不可摧毁的青春再生活力。

这些素质与其说是，与其说主要是一个军事统帅的素质，不如说是一个政治领袖的素质。更确切地说，这是战时的一个政治领袖的素质。这恰恰是战时的铁托——显示了光彩夺目的政治才干。这种才干明显地表现为他确有把握地估计作战部队的实际能力，表现在他能够预期战争过程中的行动或反行动，而首先表现为他卓有成效地从政治上进行强有力的组织工作。

甚至在战斗中，铁托也高度关心他的名声和权威。诚然，他的不在行的、常常是鲁莽的指挥肯定会损害他在党的干部和军队同僚中的声誉，假如他们没有认识到他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和精明的领袖的话。他懂得如何在适当的时机识别重要的和关键的行动方针。

我记得铁托在战术上犯过无数次错误，他有时匆匆忙忙作出反应，有时迟迟下不了决心。但是，我也记得，他多么明确地把握住了这场战争的性质。他把这场战争看成是通过抵抗占领军而建立政权的一种新形式，

看成是通过把游击队改造成正规军来赢得胜利的手段和保证。

除了一九四一年底和一九四二年初，塞尔维亚和黑山出现过左倾偏向这个错误之外，我回想不起，现在也说不上铁托还犯过什么大错误或可悲的错误，至于这里提到的那个错误，其他领导人也有责任。但是由于铁托担任的领导职务，他让共产国际批准了这一方针，他必须承担责任。他意识到了这一偏差，他迅速使党走上了正确的胜利的道路。

他的迷惘和自相矛盾，他的虚荣心和自高自大，都成了次要的了，被人们所宽容，因为他是一个满怀信心地领导人民走向胜利，走向友爱和自由的新王国的领袖。他的弱点和错误不再为人记起，胜利的荣光似乎早在人们仍在为胜利作出牺牲的时候就是有保证的了。

什么是政治才干？什么是铁托的才干？政治才干是一种个人的素质，它只有在广泛的社会和民族背景之下才能得到发挥，即使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它也只有在富有才华的集团之内才能得到发挥。领袖和运动，领袖和人民，是共生的，是相互结合的。你可以“无限地”探究这个问题；有学问的人和聪明的人已经在这么做。这里，我所谈的是铁托的一些并非是每一个政治家所具有的品格，但是这些品格使他在政治上取得了异乎寻常的，或许是没有先例的成功。

这些品格就是：一种既是合理的，又是本能的强烈

的危险感；一种要生活、要活下去、要坚持下去的不可战胜的意志；精明地、贪得无厌地追求权力。在铁托身上，这些品格通常都是存在的，但是强烈的程度有很大的变化：有时候，一种冲动变得模糊不清，看上去消失了，随后又突然爆发出来。我要说，在铁托身上所有这些都汇成了一股冲动，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则随着情况的需要而表现出来。这是否是所有政治领导人的特点呢？我不相信是这样，但是，我确信，这些品格不凝聚在一起，就不会有铁托，也不会有现在跟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绝大部分业绩。

三

铁托天生是个叛逆。他的性格使他能敏锐地察觉现存各方面关系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立场。从一开始，他就竭力要冲破农民家庭出身和一个大家庭的贫困所加于他的局限性，争取获得较好的职业。他经常换工作。一九一四年他加入奥地利军队，很快就被训练成为军士。在这以前，作为工人，他已经是个工会会员，自然也就加入了社会党。同时，克罗地亚民族主义的情绪、后来扩大为南斯拉夫民族主义的情绪，开始在他内心产生。他并没有、也不可能从事任何具体的政治活

动，因为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尚在襁褓之中，只有少数职业政治家和意识形态理论家才想要建立一个南斯拉夫国。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铁托被捕。他大概是在去塞尔维亚战场的行军途中被捕的。他在佩特罗瓦拉丁被关押了很短时间——一天。铁托告诉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说，他所以被捕，是因为他在气头上宣称要投降俄国人。但是根据最近发表的铁托自己的录音讲话，他是因为笔误而被捕的。

后来，他被派到塞尔维亚战场——他和他的传记作者对这件事一直守口如瓶，直到最近大家才知道。接着，他被派往喀尔巴阡战场去打俄国人。作为一个军士，他执行侦察任务很出色。最近奥地利发表的一封信说，奥地利司令部曾传令嘉奖军士约瑟普·布罗兹在执行侦察任务时和抓俘虏时表现勇敢。

他在一九一五年春负伤并被俘，但是即使在这个时候，他也没有参加在俄国的南斯拉夫俘虏所组织的志愿队。他留在集中营里，几乎被鞭打致死，后来又被锁起来，因为他领导大家抗议俄国人对他们的凌辱。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以后，他从集中营里逃出来，前往彼得格勒。他参加了七月示威，按照布尔什维克历史的标准来衡量，七月示威被认为是进步的。后来铁托说：“我以为革命结束了，革命完成了。”

他被驱逐到乌拉尔，又逃到西伯利亚，十月革命的

时候，他正好在西伯利亚。他正是在那里遇见他的第一个妻子彼拉吉娅·贝洛乌索娃的。一九二〇年他加入共产党，这时他还在俄国。同年回到祖国。

在铁托的政治生涯中，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四年是最不活跃的时期。这正是南斯拉夫共产党分崩离析、活动不多的时期，这时南斯拉夫共产党被取缔，它的领袖们被关押。在这段时期，铁托成了三个孩子的父亲，其中两个孩子在襁褓中就夭折了。尽管铁托并没有什么政治活动，他还是接二连三地被解雇。在以后的几年里，他走遍了南斯拉夫。在巴卡尔，他被捕。在奥古林，他被判七个月徒刑，但是萨格勒布的陪审团把徒刑减为五个月。他积极从事工会活动，有时他是工会拿工资的工作人员。一九二八年初，他在萨格勒布的党组织中崭露头角，他或许是这个党组织的最有能力的代表，但是并不象官方历史学家所说的是“唯一”的一个。所谓萨格勒布路线，是针对右的和左的派别集团的。

一九二八年八月，他再次被捕，在所谓的炸弹小组案的审判中，被判处五年徒刑。他在受审时宣称：“我不觉得自己有罪……因为我认为这个法庭没有资格审判我……只有党的法庭才能审判我。”他的宣言证明了他的勇敢和对党的忠诚，同时也反映了共产党员在“阶级法庭”上所应有的表现。铁托在法庭上的表现在南斯拉夫被传为神话，虽然还有一些共产党员也有同样的表现。历史是只记载它的主人的。

官方的记载说警察当局把炸弹事件栽在铁托身上，这未免离奇！要承认南斯拉夫这位后来好幻想的领导人，在武装斗争的条件几乎不成熟的时候收集武器，是令人难堪的。但是铁托告诉过我，他相信即使在战前的条件下，也能发动武装起义和武装革命。我是怀疑的。王家警察当局虽然傲慢而残忍，却不嫁祸于人。南斯拉夫王国是个腐败而不民主的国家，但是比起现在的南斯拉夫，王国的法律更受到尊重，法庭也更有独立性。

铁托在狱中服役的第一年表现得不失身分。他告诉我，他如何不服从一个看守要他拣烟蒂的命令。我从和他监禁在一起的别的共产党员那里听到的，都是赞扬他的话。在经过挑选的共产党员的环境中，铁托以他的气概、他的坚定，他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勤奋和他的直觉而引人注目。他还使人们觉得他是个能做到专心致志而不受外界影响的人。

一九三四年底铁托从狱中被释放出来时，按照中央委员会指示前往维也纳，后来去莫斯科。一九三五年是苏联进行清洗的一年。约瑟普·布罗兹的革命事业开始了一个新的和决定性的阶段，他经受了许多痛苦的考验，已经认识到，革命的制度和方法虽然同革命的思想分不开，但是仍然比革命思想重要。

他的基本个性是强烈抵制看得很清楚的现实。约瑟普·布罗兹从无开始，因为没有人也没有东西。他从一开始，就不接受普遍承认的现实。

布罗兹这个姓来自阿姆布罗兹，作为名字则要追溯到十五世纪。但是并没有迹象说明，铁托的家族是从第一代的布罗兹家族传下来的。根据铁托的家谱，他的祖先，是从波斯尼亚和达尔马提亚之间的交界地区移居到扎戈尔耶来的，他们大概是十六世纪在那里定居的。据铁托说，在这以前，他们是为了躲避黑山的库切家族而逃出来的。

布罗兹是个大家族，其中有一些是有教养的人，有一些是萨格勒布的著名人士。但是铁托的这 一 支 是 农民。不过一八九三年五月七日铁托诞生的那栋房子，还是属于库姆罗韦茨镇上最好的一类房子。铁托一家不得不为生存而奋斗，因为这是个大家庭：有十五个孩子，其中八个少年夭折，而铁托的父亲又不善于经营期票。他们有地，在镇的集市附近有八英亩地，虽然不是上等地，数量却不算少。铁托的母亲玛丽娅出身于斯洛文尼亚的富裕农民家庭。铁托长得象他的母亲，他的大部分童年时代同外祖父生活在一起。他的兄弟姐妹不论是得意还是失意，都没有过过显赫的生活。铁托一生没有依靠家里的人而飞黄腾达，他的一些家庭成员倒沾了他的光。

铁托从少年时期开始，就不甘于平凡的命运。战争和俄国革命，以及随着这两者成长起来的共产主义，是形式，是现实，是梦境，是幻想，他通过这一切来实现自己的愿望。在一个和平、大体上非意识形 态 的 世 界

里，他本来会是一个工会职员，或者是一个企业家，有权威的父亲，任性的丈夫。

在共产党以救世主的面貌发挥工人阶级历史作用的过程中，铁托发现了个人的意义和作为牺牲品的社会的意义。尽管他并不特别尊重工人阶级，他在阐明工人阶级的历史性作用时，态度是坚定不移的。不论在什么时候，他在使用“工人阶级”、“工人”、“劳动人民”这些词汇时，听起来似乎在谈他自己——社会底层的人是如何向往进入政府、掌握政权。

铁托在共产主义中找到了他自己；而共产主义在铁托身上，找到了一个最成功、最与众不同的拥护者。我认识许多共产党员，他们的思想更为坚定，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一个共产党员，象铁托那样自称是无可匹敌的、是独特的，竟达到如此程度而且如此无所不至。铁托热中于奢侈豪华，好讲排场，随着他个人权力的巩固，他的这一特点越发得到了发展，而且煞费苦心地去满足自己的愿望。

而自鸣不凡，不论是真的还是装出来的，并不排除风头主义和粗鄙的行为。铁托嗜好奢侈，喜欢时髦，他的贵族的生活方式，在权力上的独断独行，都是陈腐的、卑劣的。他只是在怀疑这样做可能削弱他的地位和威信时，才节制自己。一九四九年将近年底，我在纽约参加联合国会议时，《生活》杂志发表了一篇有关铁托的文章，刊登了几张照片：铁托在他的别墅前面；铁

托在客厅里，他的两侧是马和狗，周围是亲信，亲信中有我，有他的儿子扎尔科以及其他人。人们不会不注意到，铁托成了拉丁美洲的独裁者一类的人了。

当时，南斯拉夫由于抵制苏联霸权，威望日增。我们的领导渴望使自己具有非苏联的、民主的形象。当我们回到贝尔格莱德，被召见汇报我们在联合国执行的任务时，我提醒铁托：《生活》杂志上登照片这一类的事情所产生的不良影响，引用了“拉丁美洲独裁者”这个词。我相信阿勒什·贝勃勒在纽约用了这个词。铁托脸红了，一声不响。然而，除了有一段时间，他在被西方记者包围时比较谨慎以外，一切如故，他并没有改。

一九五〇年或一九五一年，我们讨论党的领导人是否不再个人占用别墅、私人住宅和游乐胜地时，铁托的反应是：放弃他在奥帕蒂亚的别墅，因为那个别墅离他在布里俄尼的办公住处很近，他不使用。可是他继续为他个人建造别墅、宫殿——即使有的他只不过在里面住过一夜而已。

一九五三年，决定允许城镇、街道、工厂和合作社，凡是后来以党的领导人的名字命名的，都可以改用原来的名字。铁托同意这样做，而大家同意铁托的名字不在此例。铁托生日举行接力赛跑的事也是这样。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谴责斯大林搞个人迷信，这在南斯拉夫激起了同样的反响。铁托建议把进行接力赛跑的日子定为“青年节”，不要再和他的生日联系起

来。但是庆祝活动却更盛大，更普遍——符合铁托的幻想：同不具个人特色的、浑成一体的群众相比，他作为领袖，起着具有超凡魅力的作用。

铁托小心防范别人触犯他的人格。不论是谁，如果对他的作风产生疑问，或者侵犯他的特权，就要冒惹他发怒的风险，如果不是更糟，那就是给你戴上怀有敌意和反党的帽子。他的这种态度是从个人出发的：铁托总是，而且事事极其精心地注意保持他的尊严，保持他的不凡之态。即使在战争期间，在山间的宿营地，或者在夜行军中，我碰见他时，从未见过他不修边幅，或者听见过他讲粗鲁的话。他总是把脸刮得干干净净，衣服清洁整齐，似乎战争环境对他毫无影响。

凡是他的东西——他的马，他的衣服，他的武器——都要最好的。他的同志也相当体贴地保证让他高兴、感到舒服。他的权力和作用的加强和他天生的优越感，相信自己应该受到特殊照顾，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最后，专制权力使自豪、体面的推动力，变成了利己、不民主的推动力，他的最亲密、最忠实的同志都成了领导人和阿谀奉承的人。

个人在他们的时代和社会中留下的印记，同他们精神力量和创造技巧是成正比的。一个民族越是独立于它的领导人，这个民族的创造力就越强。把领导人同民族和历史等量齐观，那就会人人遭殃，因为生活必须有新的前景和开放的趋势。铁托不大理解这一点：他把自己

高高置于人民和运动之上，置于远离人民和运动的地位。这样他就谈不上“崇高”了，因为他并不崇高。但是他将成为具有政治才干、在许多方面有所创造的历史性人物。

四

虽然铁托竭力要把自己同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等同起来，但是他并不毫无节制地发泄怒气或疯狂地行使暴力。战时，他对他的人员——他的“干部”——的安全显然是关心的，虽说他对自身的安全更加关心。诚然，这种关心似乎与他的地位的巩固和权力的扩大是成正比的。这不仅仅是一个感情问题。他对党和起义有一种责任感。他要是被打死了，那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他把他个人的权力同革命的改造等同起来。

不管如何解释铁托战时的作用，毫无疑问，他紧迫地意识到他的军队所面临的危险。一九四三年初，在德军第四次攻势期间，当拉马河和奈雷特瓦河附近的地区被包围的时候，他一再地改变命令，有时发布模棱两可的命令。但是与此同时，他冒着危险大胆地和忘我地重新集结军队，从而保证了拯救伤员并在维利察古夫诺击败德国人。他设法使游击队员摆脱他们受到的“德国精

神的束缚”——他们迷信德国武装部队的固有优势。被围困在奈雷特瓦河地区的铁托尤如囚在笼子里的老虎，伺机寻找薄弱环节，当然到意大利人和切特尼克分子中间去寻找，以便打开一个大缺口，足以使游击队发动猛攻突围。一九四三年五月，在德军第五次攻势开始时，他说：“我们从来不曾处于这样危险的处境！”其他人同样也感到这种危险，但却不那么强烈，为我们的安全采取防御措施的行动也比较迟缓。

经常发生一些几小时，甚至几分钟的战斗：在皮瓦峡谷的武切沃地区，无产者第二旅在德国人封锁通路之前突围成功；黑山第四旅重新夺回了留芭墓地；无产者第一旅发动了决定性的和主动的突围。在这些战斗中，铁托作为司令所起的个人作用是无关紧要的，也许是微不足道的。然而是他使人有一种危险感，是他鼓起了一种动力，是他迫使潮流逆转。

铁托的人格在关键时刻充分地显示了出来，很快地和本能地给人们留下了新的印象，但是在局势发生没有预料到的或急剧的变化的时候，他也表现得过于鲁莽草率。喜欢铁托的人总是不考虑或者不认真考虑这些情况。他们把狂暴和刚毅，严格和鲁莽混为一谈。他还有另一面——紧张、谨慎、善于估价复杂的重大问题和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在谨慎和冲动，临时性和长远性这两者之间所表现出来的所有行动，对于铁托来说，并不是典型的，虽然他，跟我们大家一样，主要是在平凡和日

常事务中生活和工作的。生活毕竟主要是平凡的，总有日常的事务。

然而，如果以为你是在跟两种人格打交道，那是误会。我认为神经质的，脾气急躁的铁托只不过是为另一个审慎的，专横的，处事果断的铁托的产生作准备而已。的确，在作出关键性的政治决策时，铁托是特别果敢的，他也是一贯正确的——如果我们把成功看作是一贯正确的话。

一九三七年，在苏联进行清洗的时候，共产国际指定铁托担任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人。那是在党的书记米兰·戈尔基奇被捕和南斯拉夫向苏联移民减少之后。当然，如果他个人没有被审查清楚，他对苏联的忠诚没有经受考验，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对他自己党内搞派别活动的那些人的不忠没有得到证实的话，他是不可能被任命担任这一职务，具有否决一切决定的权利的（这一权利便于他经由党的队伍得到荣升，虽然当时党在意识形态上和干部队伍这两方面已经斯大林化了）。其他许多共产党人都受过那种审查，然而他们都没能通过。

后来，铁托在谈到那个时期时说："我在搞派别活动的人中间没有交朋友，我埋头干自己的事情，而且我讲话谨慎，特别是在装有电话的房间里讲话的时候。"铁托是安然无恙地度过这种可怖的安全审查和整肃的唯一领导人。而且，显然他是直接而简单地度过的。他意识到有危险，但是与此同时，他坚信苏联的路线。他生

来就爱冒险，而且经验告诉他权力如何决定运动和思想的命运。我还记得铁托从莫斯科，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回来时的情景。他精疲力尽，心烦意乱，在“军人法西斯”，“君主政体一法西斯的”南斯拉夫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中间寻求安慰和鼓励。

铁托是否以背叛同志，以恶意中伤他的同志的手段求得宽恕呢？铁托在大清洗中，具体地讲在南斯拉夫党内的大清洗中实际上起了什么作用呢？当然，言论和思想不是永远不变的，而且不会独立于社会和思想趋势而具有或保持长久的意义。正如乔治·奥韦尔所理解的那样，这对于政治学语言来说尤其真切。

在这里，我们必须回顾一下苏联的经验。在战前时期（甚至在今天，在某个地方，以及对某个人来说，仍然如此）同苏联情报机构合作曾被认为（现在仍然如此）是一种值得赞扬的体面的事情。苏联特务控制着从事秘密活动和使用武力的特殊权力。在欧洲，共产党人梦想过，且这样说吧，崇高地为苏联效劳的巨大幸福。在不同情况下和关系发生变化时，甚至对共产党人来说，这种崇高的效劳可能成为当一个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同义词。在斯大林时代，社会的目标要求忠于斯大林。甚至在大恐怖开始之前，托洛茨基的追随者、右派分子、以及犯有其他偏向的分子，不管他们是有意还是无意，都被“革出教门”，其中许多人遭到逮捕。

铁托是在一九三七年，在几乎令人神经错乱的大恐

怖的中期成为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书记的。在一段时期内，他是忠于斯大林的。斯大林成为列宁的最合法的继承人，对他和其他许多人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因为问题在于要忠于斯大林主义的具体政策，默认斯大林所采取的方法。不应该忘记的是，远在一九二八年，约瑟普·布罗兹就最直言不讳地反对搞派别活动，最引人注目地支持党的铁板一块的性质。在党的实践中，这意味着在党内要让代表一个人的路线，实质上就是斯大林主义路线的人独揽大权。

约瑟普·布罗兹早在一九三五年初，在他去莫斯科之前很久就支持斯大林和斯大林的铁板一块的政策了——简言之，那时他就支持斯大林的苏联。此外，他是赞成在党内贯彻新的铁板一块和垄断精神的典型，虽然不是唯一的典型，他也是属于最善于随机应变和最机灵的典型之一。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是与铁托的心理和他的思想演变一致的。他自己就曾经大刀阔斧地清洗南斯拉夫党；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参加莫斯科的清洗对他来说是合乎逻辑的和必然的。当一个人促进布尔什维克主义，缔造和加强会为他达到理想和权力扫清道路的党，为什么还感到内疚呢？

我还记得铁托和爱德华·卡德尔（作为从前的“莫斯科人”，他们认识在苏联遭到逮捕的大多数南斯拉夫人）说过，苏联的权威为我们解除了“派别活动”的负担。斯塔奈·多兰茨和铁托周围的其他较年轻的人现在

企图证明，铁托甚至在战前，以及在莫斯科期间就已经开始同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作斗争。今天听到这种说法该是多么荒唐！如果铁托不忠于苏联，就是说不忠于斯大林，他又怎么可能活下来呢？就此而言，他怎么可能掩盖住他的动机而不让我们这些人，他自己国家内的斯大林分子，从来没有见过莫斯科的斯大林分子知道呢？莫斯科指定了一个可靠的人物来领导一个可靠的斯大林主义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列宁主义的党。

不过我的印象和我确信的是，铁托参与清洗的程度是有限的；对他来说，这些清洗是附带性的。莫斯科对南斯拉夫党已不再抱幻想了，它几乎把南斯拉夫党解散，就象它对待波兰党那样。在共产国际里，铁托受到了这批“干部”中的负责人，一位保加利亚人的怀疑。上面要求铁托，作为党的书记，定期汇报有关他的同胞南斯拉夫人的行为的情况。铁托的定期汇报都是在事后写的。这些汇报通常是消极的，因为他所汇报的那些人已经被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或者被地下特务人员告发为敌人。在中央委员会的机关刊物《无产者》上，铁托机械地为开除和逮捕那些搞派别活动的人辩白，使用一些从那种不得上诉或不得要求复审的可判死刑的案件中借用来的词汇：托洛茨基分子、叛徒、派别活动分子、间谍、反党分子等等。

甚至在南斯拉夫国内，党内的清洗也是残酷无情的。但是清洗的领导者不是铁托；他大部分时间不在国

内。投身到革命活动中的年轻一代要么不了解政治受害者在苏联所受的苦难，要么忽略了这种事。铁托担任负责的工作，虽然他同莫斯科和苏联情报机构保持联系，对于这种联系，其他政治局委员只能推测，除了铁托对他们讲的东西之外，他们什么也不知道。我认为他并没有多少情况要隐瞒。实际上，铁托开始逐渐摆脱苏联的控制。一九三九年他从莫斯科回来之后，我们对他说，我们党在财政上已经能够自给自足了，这使他很高兴。我们的这个财政上的第一次独立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比当时看来要大得多。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随之而引起的革命，政治分歧开始出现了，一个超级强国和一个小国之间的政治分歧开始出现了。铁托与莫斯科很难找到共同语言。他征求共产国际的意见，但是对于重大问题他也自己（或者与他的同志们一起）作出决定。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亚伊采举行的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游击队的议会）第二次会议上，没有告知莫斯科就作出了几项最重要的决定，从而引起了莫斯科的反对。这些决定是：南斯拉夫组成一个联邦国家；实际废除君主制；使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政府合法化。

铁托作用的加强是同革命的巩固，同他在莫斯科的影响的加强同时进行的。莫斯科陷入了自己的陷阱：苏联的等级制度，由于更加没有道理地助长对它的领导人的“迷信”，就无法来抵制铁托的日益增强的力量，而

这种力量来自革命的进程和战略上的宣传。此外，南斯拉夫是一个独立国家。虽然对铁托的迷信在一个方面是仿效对斯大林的迷信，但在同苏联的冲突爆发时，对铁托的迷信却有助于加强南斯拉夫独立抵抗的能力。

某些人可能不无理由地注意到，民主的南斯拉夫如果没有对铁托的迷信，靠它的社会结构就可以抵制苏联的控制。但是南斯拉夫已经变成了一个集权的和专制的国家。除了共产党人之外，没有别的有效的政治力量了。苏联的要求可以靠类似苏联人自己采取的那些办法和方针来对付。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个列宁主义的，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个斯大林主义的党，加上成功的革命遗产，才能够成功地抵制莫斯科的权威。

铁托在一九四八年是如何对付同苏联的冲突的？在这场冲突中，他所起的作用有多大和有多么重要？对铁托来说，同莫斯科决裂，虽然是逐渐的，然而在心理上和思想上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接近他的那些人认为，而且他本人也认为，那个时期正是他自己的胆囊病开始发病的时期。在公开场合和在局外人面前，特别是在苏联大使馆人员面前，假如他不得不接见他们的话，他处事沉着而又自信。在这方面，他是成功的，因为他有政治才干。但是苏联情报机构知道得很清楚，因为它在他周围安排了自己的特务，然而对于接近他的那些人，铁托并不掩饰他将要做什么。

在这几个月里，他一直烦躁不安，容易激动，而对

他最亲密的和最信任的同志则表现出亲热和热情——他在战争将近结束时期和在战后初期失去了这种亲热和热情。的确，他当时并没有得到今天的“建立了一半的”机构的支持，但是他曾得到莫斯科坚定的，然而内心里却是勉强的支持。

我之所以把那段时期——战争结束时期和战后的二、三年时间——看作是没有取得多少成就，在某种程度上有失尊严的时期，原因就在于此。胜利使我自己从一个有希望的作家和革命者变成了为比亚历山大国王甚至还要专断的君主服务的工具，变成了为一个令人失望的和显然不公正的社会秩序辩护的发言人。我希望重新搞写作，一心从事文学工作。我同铁托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表示赞成，他说我应当设法安排好时间，把我从事写作和从事官方宣传活动的时间都包括进去。但是同莫斯科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的预感给了我新的动力——追求某种新的事物与为国家和党效劳的崇高意识交织在一起。

虽然铁托由于同莫斯科分裂在精神上受到了痛苦折磨，但是他没有动摇，反倒确实加强了他的政府的独立性。的确，在同苏联领导人发生冲突期间，他的严厉而激动的反应——这是在困难情况下他的特点——由于他过去对莫斯科负有义务而反倒强烈起来。他关心的首先是他自己所创造的南斯拉夫的前途。铁托有充分理由感觉到过去的压力，以及更加难于消除的目前的压力。

他认识到了这种风险。后来（可能是在一九四九年）他谈到在苏联遭到“清洗”的那些南斯拉夫领导人时说：“本应狠狠地冲击他们一下，而不是把他们砍头。”他的这番话是意味深长的。在一九四八年六月危机期间，当时我们正在克拉尼宫的花园里起草拒绝参加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共产党情报局会议——在那次会议上我们将要受到一次“意识形态”审讯——的答复时，铁托突然愤怒地说：“如果要把我们打死的话，我们也宁愿死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在这一点上，他确实不是孤立的。但是，作为身居最高地位的人来说，他却比大多数人更强有力。没有为自己的行动作出牺牲的政治家算不上是政治家，虽然为这种行动作出牺牲也许是不值得的。

在同莫斯科冲突期间，在中央委员会内外，有些共产党人的胆量并不亚于铁托。但是由于铁托的权力和威望，他的作用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即使没有他，也会有人抵制，然而，冲突就可能爆发；而且我认为，那将会是成功的。但是，假如铁托屈服于莫斯科，混乱和动荡会是不可避免的。他不能接受的是：他知道并且很了解布尔什维克的以及斯大林本人的权力的实质，因此他是知道等待着他的是什么。

贯穿那些日子里的一条线是个人因素，而对铁托说来，这一因素决不可能与政治因素完全分开。另一条线是保卫和维护南斯拉夫和它的政府的权威。铁托个人的

命运是与他个人的权力——一种绝对权力——一致的，而且一切都是在同一时刻决定下来的，只受到党内亲苏的少数派的挑战。在同莫斯科抗争中表现出来的勇气和忍耐力是铁托的职责，他个人的命运和他的历史使命。

可能是由于这种个人的东西和目标，个人的危险和历史作用交织在一起的原故，铁托表现出一种独特的个性：带有他自己印记的直观实用主义。在同莫斯科分裂之后不久，他意识到南斯拉夫的国际地位所具有的份量：对这个国家，也就是对南斯拉夫的进攻会引起国际纠纷，且不用说本来就已经存在潜在的富有爆炸性的“冷战”了。

铁托并不擅长抽象的意识形态论战。当同苏联人的分歧达到炽热地步并严重危害我们党的意识形态时，卡德尔和我曾经不得不说服他，如果不在意识形态上清算苏联的制度，如果不从意识形态方面支持我们的立场，我们就会迷失方向，丧失信心和失去稳定。

在最高层的狭窄的权力走廊里，我们在顶住苏联的压力问题上不存在分歧。但是从一开始起，我们的观点就有细微的差别。搞“理论”的一批人——爱德华·卡德尔、鲍里斯·基德里奇、弗拉迪米尔·巴卡里奇、我自己、以及其他一些人——赞成把这场斗争扩大到理论领域里去。在我们看来，这场冲突反映了列宁主义的危机，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的危机。铁托、亚历山大一莱卡·兰科维奇和搞“实际工作”的人赞成把这场斗争限

制在政权和国家的范围之内。开始时，我们大家都全力以赴，绞尽脑汁来对付。有时，我仿佛看到我们满脑袋里是继承下来的，自动吸收的教条!

但是这种分成两派的情况并不能解释清楚铁托对我和其他几个没有指名的人的恶毒谩骂，这种谩骂甚至在我同他分道扬镳许多年之后，直到最近仍不断听到。他指责我们删掉了他对莫洛托夫—斯大林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七日信件的答复的部分内容。铁托在他回信的这一部分慎重而简练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他在政治局开会之前把他的复信交给我们。这是一个迹象，表明气氛发生了变化，他自己的态度有了改变，因为在此以前他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有一个人——我想就是我——指出，信中的那部分内容会特别激怒苏联领导人，因为它涉及了意识形态，而他们声称只有他们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享有权威。卡德尔、兰科维奇、以及其他在场的人都表示同意，他们建议由我向铁托提出此事。我在同他见面的时候提了出来。他毫不含糊地接受了我的意见。

一九四九年之后不久，我们的两种思想派别，理论派和实际工作派，合并成一派。铁托接受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创新，只是在斯大林死后才取消了这些创新，因为他把这些创新看作是政治上“可以抛弃的压舱物”和对他个人权力的一种威胁。

虽然同莫斯科的抗争使铁托深为震动，但是他本人

为这场对抗准备好了舞台。当然，他在为这场冲突作好准备时并不是孤立的，或者说他也不是最激进的参加者。南斯拉夫同莫斯科的关系一直是按着“之”字形发展的，直到苏联谋求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统治地位的图谋昭然若揭为止。根据我们的判断和当时的情况，我们从来没有放弃我们的权力和我们的特性。逐渐地，从最高层的权力小圈子到基层更为广泛的范围，我们开始痛斥苏联的制度，批评苏联对我们的政策，并且进而批评苏联对东欧其他大多数国家的政策。在所有这些方面，铁托是谨慎小心的，但却是坚持不懈的，肯定在他的内部圈子里是这样。他总是注意他的行动方针对他自己和对南斯拉夫带来的危险。

这是正视教条和现实——昨天的教条和现实——我们自己的教条和现实的痛苦的过程。铁托并没有因为所有这些痛苦和内部的动乱而受到妨碍。相反，这反倒激励他更加勇敢和更加机智，在同莫斯科的那场斗争中，在思想和感情引起的那种回响中，有过一些错误和过火行为，特别是长期固执地企图把阿尔巴尼亚从苏联的影响下拉过来，使它臣服于南斯拉夫。对于这种作法，铁托要负主要责任。斯大林和苏联政府把南斯拉夫对阿尔巴尼亚的这种不平等相待的霸权主义企图，作为对南斯拉夫发动攻击和进一步使东欧国家臣服的借口。铁托对阿尔巴尼亚咄咄逼人的态度既是仿效苏联的办法，又是他提防苏联保护自己的方法之一。但是面对苏联和阿尔

巴尼亚的抵制，他明智地在这条战线上后退了。

如果南斯拉夫领导人扩大意识形态上同苏联的分歧，如果这位领袖不那么热衷于权力，那么南斯拉夫共产主义对苏联扩张主义的抵制就会取得更为深远，更为巨大的成果。但是历史和政治斗争以及政治关系并不选择领导人；而是领导人选择政治斗争和政治关系。铁托需要把自己同历史等同起来，同他起了关键性作用的业绩等同起来，这既是他的力量，又是他的弱点。他对历史性的时刻具有一种勇敢的无私感。但是他也限制了生活的进程，限制了人权，并且捉弄了一些人和一些民族。

五

从马克思主义学说（或者共产党的其他学说）可以令人信服地证明，任何一个共产党领导人事实上都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充其量，他不过是半个共产主义者。如果对纯洁性进行这样一番仔细的考察，甚至列宁也不能例外，更不用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本人了。列宁几乎是在掌权之后的第二天就接受了德军统帅部的财政援助，并在布列斯特一立托夫斯克同德皇的将领们签署了和约。我们如何把这些表现同共产党的国际主义相调

和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恩格斯是一个工业家，有贵族风度。马克思曾在股票市场上搞过投机活动，而在谴责对手的做法上，他是斯大林学派的先师。至于斯大林，我必须在这里指出，根据可靠的统计材料，他消灭了将近七十万共产党人，且不说成百万其他的人。共产党人的这一死亡数字，比科学社会主义问世以来各国反动政权杀害的共产党人加在一起还要多。

政治哲学和政治实践之间出现鸿沟是不可避免的；政治哲学越是企求合乎科学和不犯错误，这一鸿沟就越深。在工业化之前的时代，在宗教领域里也发生过类似的现象：基督教会的头面人物很少是象他们布道时说的那种正人君子，统治者常常通过杀戮和掠夺来强行树立他们的正统地位。没有任何政治学说能够超越意识的相似性和构造型式，因为归根结蒂任何政治学说都只是特定现实在精神上和逻辑上的升华。任何政治学说本身不可能作为指导和动员某些社会集团的力量去起作用，因为能赋予生命的力量是从多方面的和无法预料的因素成长起来的。因此，虽然共产党领导人不是始终如一，甚至不讲原则，但是对他们的责难不应该甚于对其他领导人，除非共产党人隐瞒这样的证据，除非他们采取不容异说和强制手段来扼杀新的幻想的诞生。

如果用共产党的教义对铁托仔细衡量一番的话，他作为最不始终如一，最缺少共产党味道的统治者之一，理应受到谴责，原因与其说是在于他的专断的统治方

式，不如说是在于他的君主般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虽然许多共产党人想起铁托时不会感到亲切，但他的名字也不会象斯大林的名字那样令人毛骨悚然，受人谴责。这样一个信念虽说可能带有我的过去以及我同铁托的共事所带来的色彩，但是我既是在分析共产党专制独裁者的基础上，同样也是在分析其他革命的专制独裁者的基础上，得出这样的信念的。我的一位朋友在谈到共产主义时说：越是有毛病，越是不始终如一，就越好。这番话不无道理。

然而，这不应当使我们得出结论，认为铁托同或多或少信奉马克思和列宁的意识形态的其他共产党领导人有本质的不同，或者比他们好，或者比他们坏。直率地说：他不过是使自己顺应现有的条件罢了。众所周知，在胜利以后，那些反革命的对手受到多么粗暴的对待，很少考虑从轻处置的情况。一九四六年夏天，我同波兰外交部的一名官员一起驱车前往布莱德和卢布尔雅那。这个波兰人担任这样高级的职位，是太年轻了，但是他是一名严格的共产党人。他告诉我，斯大林多么严厉地训斥了波兰代表团，因为波兰人对反对派采取了不太激烈的措施。形成对照的是，斯大林赞扬铁托："铁托是中流砥柱……他把他们全肃清了！"我曾经把这一故事详细地说给我在中央委员会里的同志们听，我们当时有一种严酷的、但并非不愉快的自豪感。我说这一切不是为了指责什么人，或者为我自己开脱（在某些事情上，

我比别人更糟糕，在某些事情上又好一些）；我提到这件事，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历史事实和对未来的教训而已。

我们都知道，为了证明斯大林指责南斯拉夫党奉行富农政策是错的，我们进行的意识形态上是反斯大林主义的集体化产生了破坏性结果。我们都了解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里的日丹诺夫式的压制性的、不成功的、徒劳的方法；据官方和半官方的人士说，甚至在三十年以后，仍要由我一个人对这样的方法承担责任。一九四八年以后，斯大林的恐吓和攻击使我们胆战心惊，而在此以前，我们却因得到斯大林的赞同而洋洋自得。政治是不能脱离整个具体环境来理解或解释的。

但是，象斯大林和毛泽东一样，铁托背离共产党学说的纯洁性，这与其说是否定还不如说是肯定了他始终不渝地忠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忠于列宁的共产主义变种。马克思和列宁的意识形态对铁托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他认为在这一意识形态中什么是实质性的、不可变更的、不可侵犯的呢？

从他个人在俄国革命中的经历，以及从他所受的俄国革命的宣传影响来看，他必定认识到，没有一个新型的党的支持，革命和新型的政权是不可能实现或者存在下去的。他必定看到，这样一个党在意识形态上以及在组织上必须是中央集权的。在他作为一名获释的战俘从俄国回国的时候，这一认识行将在变化难以预测的南斯拉夫

党的熔炉里经受检验、澄清和锻造。从本性而言，铁托是一个实干家：言辞、演说、大会，对他来说是格格不入的，甚至是无法容忍的，除非这些是作为政治行动的工具。作为党和工会的积极分子，他认为派别对于党不仅无益，而且有破坏性。他认为，党在走向革命专政的过程中，应当把觉悟和阶级斗争结合起来。

一直到一九二八年，他倾向于左翼。他自身的经验，党的基层青年积极分子的共同经验以及共产国际反对各个民族派别的倡议（一九二八年发表的《致南共党员的公开信》），都肯定了铁托对一个摆脱了派别的党，一个在群众中积极活跃的党的设想。这是列宁主义党的斯大林变种的胚胎状态下的变种，因为党的思想统一是斯大林的发明，在适当的时候，这一点通过党的领袖对意识形态的垄断而实现了。在铁托看来，思想统一已经有了，是一个"既定事实"，那就是毫不含糊地、宗教般地把列宁主义和苏联党当成模式。党只消清除掉派别就行，而最可靠的方式——诚然，是指保证这一点的方式——是在一个铁板一块的领导班子的领导下不断地采取行动。

一旦给这样一个党，这样一个领导规定了这样的概念，它就成为一条"先验的"真理。铁托蹲了五年班房，这使他没有机会组织这样一个党并加以巩固，如果不算他那一小批难友的话。但是亚历山大国王一九二九年一月六日宣布实行独裁，这便造就了一批与过去无

关、与派别无关的新的青年共产党人，他们把列宁主义以及列宁和斯大林建立的党看成是理所当然的革命实践唯一可学的模式。这就是铁托一九三四年从监狱里释放出来时所面临的气氛和实际情况。在莫斯科，他所遇到的是以那种在思想一致和无阶级社会的名义下动员起来的恐怖。南斯拉夫人心目中的革命理想，在苏联已经成了恐怖。一九三七年，在铁托在莫斯科呆了一段时间以及在南共前任书记米兰·戈尔基奇被捕之后不久，铁托被共产国际选中担任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当时党在南斯拉夫国内已经布尔什维克化，毫不动摇地忠于苏联和斯大林，在一批毫不妥协的、由于一月六日独裁统治而团结在一起的好斗的党员的领导之下。

当我这一代人在三十年代初参加革命斗争，参加党的时候，一切都被无条件地接受：列宁主义，共产国际，苏联；而在三十年代中期，甚至斯大林也被无条件地接受，尽管他搞了清洗，组织了审讯。说句老实话，当时我们自以为了解情况，其实有些事情是我们所不了解的。但是对于革命行动来说，这未必是一个缺陷；这甚至可能是有利的。铁托明白这一切，他同这些新党员站在一起，他是老一代中这么做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中间的一个。这正是他所要的党，为了这个党，他进行了奋斗，在监狱里服了苦役，他逐步上升到这个党的领导岗位，这是他应该得到的。他的领导是个人说了算，大权独揽，当时只有莫斯科才有权力给予或者否认这样一

类的领导。他不使权力分散，因为首先这不符合莫斯科的利益。再者，在国内持不同意见，在莫斯科表里不一，都告诉他，在政治中，特别是在共产党的政治中，权力和利害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在自己的国家里不掌握权力，在苏联意识形态暴政领域之内就休想存在下去。

仅仅由于这一早年的准则，马克思和列宁的意识形态对于铁托来说，直到生命的终止，一直是必不可少的、无法变更和不可侵犯的。这个意识形态不仅是以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为先决条件，而且是以领导党并维护党的意识形态纯洁性的领袖（至少是一个领导班子）为先决条件的。意识形态和党是生命攸关地联系在一起的。意识形态必须不改变它的基础。党必须进行不断的斗争，来追求垄断权力。这两个方面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必须进行下去直到实现乌托邦式的未来为止的过程，在这样一个未来，将不会有任何阶级体制，不会有任何权力，也不会有任何政治。

没有乌托邦式的意识形态，这样的权力显然是不可能存在的。铁托不仅认识到和承认这一真理，而且他还自觉地运用这一真理，把它看作个人发迹和个人走运的一个条件和工具。对于他来说，意识形态和理论同政治是无法分开的。说真的，他没有把意识形态降为权力的手段，而这正是苏联领导人的特点。但是他并没有把权力同意识形态分开，对于他来说，意识是权力的另一

面。在理论争论中，他不时显示出某种程度的灵活性和自由主义，但是他不让它超越建设性的批评的范围之外，更不用说批评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批评党控制权力了。由于党内的关系确保铁托个人的权力，因此他认为，修改列宁关于这种权力的主张的任何暗示都是对他个人作用的威胁。在同斯大林发生对抗时期，每当有人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性质表示怀疑，从而类推到南斯拉夫，铁托总是觉得，不仅他的国家受到威胁，而且他本人受到侮辱。我有时候认为，他象是一位被异端惹怒的高级神职人员。

这一意识形态的基本因素是：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社会主义必然要在世界上建立，党在实现无阶级社会的过程中起着先锋作用。这些跟铁托本人的威信和地位一样，都是不能改变的。一九五四年一月，由于我批评这个社会，我被叫到铁托那里，兰科维奇和卡德尔也在场，我谈到我得出结论：恩格斯把辩证法引进自然界是错了。铁托采取守势，他问我："你打算公开宣布这一点吗？"我可怜地天真地回答说："我始终打算这么做，而且乐意这么做！"当然，没有做到这一点，因为不久以后，根据卡德尔在中央全会作的报告，我被斥为"修正主义"，铁托认为我的观点证明党内出现了一个阶级敌人。要害在于：同斯大林的对抗表明共产党国家之间有可能发生战争，但是这一对抗并没有发出信号，表明这些国家的政权和意识

形态要发生变化。

是否有可能改变（或者发展）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而又不破坏党和政府赖以为依据的社会主义基础？正是巴枯宁以其无政府主义乌托邦分子的直觉第一个指出，马克思的学说必然会导致建立可怕的、镇压性的国家机器。在巴枯宁的故国，情况业已证明，确实可以建立这样一部可怕的机器。列宁从马克思主义吸取了他关于政权的基本学说：无产阶级专政。这不是偶然的。

从政治观点来看，政权事实上是否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完全不相干的。但是，重要的是，列宁是从马克思主义抽出这一概念并把它运用于俄国条件的。有人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完全不涉及权力的根本精神力量，这样一种看法今天只存在于西方的某些大学中。在共产党国家里，不存在别的马克思主义，而只有列宁主义的变种：规定的行为，可怕的意识鸦片，强制性的权力因素。

铁托的马克思主义同其他共产党国家奉行的马克思主义没有区别：把权力奉若神明并牢牢地抓住不放；但是铁托的马克思主义有其南斯拉夫的特点，坚持国家及其模式的独立性。铁托的讲究实效的列宁主义，加上卡德尔对社会和民主概念混杂的咬文嚼字以及列宁主义党的垄断概念，逐步地合成一种马克思主义权力主义的南斯拉夫变种。一种独立和垄断主义的权力仍然要求有一个不犯错误的意识形态。

因此尽管意识形态和权力在发展和完善，它们的基础仍然没有触动。铁托是不会坚决反对这样一种推理的，他也没有任何理由要反对，虽然他只是凭经验接受这种推理。在他同苏联决裂以后，他很快就明白，独裁政权，特别是一个不发达的小国的独裁政权，如果不能再给予它所依赖的社会结构以鼓舞的话，就会停滞不前，腐烂败坏。

铁托在实践中是大胆的、富有想象力的，而在作出政治决定时却是谨慎小心，过分谨慎小心，更不用说提出新思想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的那些杰出的思想，没有一个是属于他的。

我于一九五〇年提出了自治的思想。后来，基德里奇和卡德尔又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现在他们却说，早在革命时期，自治就已存在了，虽然我并不想争功！还有，最初，铁托是反对实行自治的，只是后来才接受了简化了的、切实可行的自治。（“噢，我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工厂归工人！”）我们同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类型的党加以区别的做法，也不是他提出来的，这种加以区别的做法表现为我们把共产党改名为“共产主义者联盟”。一九五二年的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这项决定比较起来是非教条的和非列宁主义的，这不是铁托首先提出来的，但是他乐意接受这一决定。在领导人中，只有兰科维奇表示不同意。但是，铁托接受非斯大林化和非列宁化并不妨碍他重提“民主集中制”来对付

我的修正主义并称我为第六次代表大会决定的破坏者。

在一九七二年再度发生的自由化危机中，他宣布，他并不同意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定！铁托的性格中之所以不具备在实践中始终如一和坚持求实的精神，这正是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是一个从列宁主义党意识形态等级制模子里刻出来的政治家。“友爱和团结”这个口号是铁托提出的，但是就是这个口号也不新鲜，因为类似的口号曾表达过建立一个统一的南斯拉夫王国的思想。在战时，在灾祸频仍，流血不断的时候，这个口号具有实际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铁托主义”的口号。这一口号使我们在南斯拉夫和党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推动了战后建立一个联邦和共产党政权的思想。

各国政府不结盟运动的思想不是产生于铁托的脑子；就其根源而言，这个想法是外国提出的。但是铁托很快就看清了，不结盟的思想有可能使南斯拉夫和他本人登上世界舞台。他成了不结盟运动的最坚定的发言人和组织者，这是完全符合他的性格和野心的。南斯拉夫没有及早理解这个运动所固有的徒劳无益和致命分裂，南斯拉夫没有及时地找到它在欧洲的天然的政治地位，只能用南斯拉夫意识形态上的自命不凡和它的固执己见的领袖的野心来解释。

口号不胜其多。“别人的东西，我们什么都不要，我们自己的，也决不给！”“让我们象和平要保持百

年那样工作，但是要象战争明天就爆发那样做好准备。”虽然这些口号现在刻在大理石上，雕在铜牌上，但这些口号不是铁托提出的。这些口号是通过苏联通俗的成语式的宣传，或者是通过综合各种政治立场，进入他的头脑，而在反抗的时刻冒出来的。铁托的演说和讲话的风格充满了从马克思主义继承下来的陈词滥调和概念以及民间的谚语：“他们把木桩伸进我们的车轮里”，“量入为出地过日子”，“工人阶级的历史性作用”，“工人必须得到属于他的东西”。等等。相形之下，在确实少有的私下谈话中，铁托的讲话是生动、自发和无拘束的。

铁托也许没有能力提出新思想，但是他肯定懂得如何利用这些思想，并加以改造和调整。他本能地善于从这个或那个意识形态设想中，恰好抽出为实现或促进他的目标或政策所必要的那么多的想法。必要时，他可以压住或者悄悄地放弃这个或那个意识形态提法，而在局势再次发生变化的时候，又重新强调，重新提出来。摆布各种思想，以及摆布人民和各种机构，这是铁托的一种政治手腕。

甚至一些不足道的思想，中央委员会或者政府提出的一些不足道但却有价值的主意和方案，铁托也会声称是他提出的，而在今后的哪次演说或谈话中加以运用。最后，我们这些提出这些不足道但却有用的思想的人，也接受了铁托的这种做法，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有多少权力，就有多少思想。

六

在同铁托共事的十七年中，我的脑子里有时闪过这样的想法：对于铁托来说，党、共产主义以及人民，归根到底，只不过是表现他自己和他个人权力的手段而已。我可以想象，铁托在个人欲望不可遏制的驱使下，只知道他所要建立的社会秩序会不同于他所继承的社会秩序，而且会有更强大的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使我觉得他象一位艺术家，虽然他对艺术不感兴趣。他求助于艺术家们的注意，只要艺术家们的作品有助于加强他的制度和提高他个人的威望，他就给艺术家们荣誉和褒奖。哲学和宗教构成政治的精神核心，但是艺术仍然更靠近政治，因为艺术创作的力量和能力能吸引和博得政治家们的欢心。

我回想起铁托在我去职之后对外国记者说的一句话："政治上的死亡是一切死亡中最可怕的死亡。"这句话难道不正是证实了铁托认为政治使命比生命本身更重要吗？这句话难道不也说明我长期以来记住铁托这句特殊的话的原因吗？

在同铁托决裂以后，我对铁托的看法并没有大的变化，但是我想通过自我检查、回忆过去和我对政治的了

解来解释我的看法。

在铁托看来，共产主义、党、工人阶级、人民、工人这些概念都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当然，他说，不论他做什么，都是为着人民。考虑到可能性和所要完成的任务，他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真实的。因而，他在任何特定的时间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共产主义。

那么，对于从理论上来说是先锋队，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事业中是“最有觉悟”的力量的党、铁托又持什么态度呢？铁托从列宁主义的理论中学到，党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建立无阶级社会的斗争中的一个手段——必不可少的主要手段。

由于铁托把无产阶级专政看成是他的个人权力——其根据是他认为除了实行等级制度以外，权力不会自身形成或保存下去。客观上，他把党看成一种势力。但是从主观上说，他把党看成是达到他个人意图、发挥他个人作用的工具。

一九五三年秋天，在的里雅斯特危机期间，我在德迪涅的白宫跟铁托在一起。我们讨论了我写的文章，这些文章开始对列宁主义理论和南斯拉夫的列宁主义残迹提出批评。他显然感到进退两难，因而说：“文章不错，你写得挺好。你应当多写一些文章批判资产阶级，他们特别在心理上仍然有影响。你应当为年轻人写文章，年轻人是最重要的。我们还不具备发扬民主的条件；

专政还必须保持下去……”南斯拉夫大部分地区的资产阶级已被剥夺了独自行动的机会。资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遭到了无法挽回的失败。因此，在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思潮和形式活跃而又强大的时候，要我写文章批判资产阶级，把矛头对准已经溃败的敌人，等于是浪费笔墨，无的放矢。铁托的思想显然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已经消逝的时代。也许是他无法摆脱过去。但是我已打算走我自己的路——这条路将使我和铁托彻底分道扬镳，虽然我当时根本不清楚我所走的是什么路。

铁托显然知道，同苏联的对抗会使一些事情发生变化：会改变南斯拉夫的立场及其社会结构；还会改变共产党员的觉悟。这一点在他当时发表的一些讲话中，特别是在一九五二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讲话中明显可见。铁托认为，苏联的扩张，尤其在思想领域的扩张不仅对南斯拉夫制度，而且对铁托本人的地位和历史作用是有危险的和威胁性的，也许对南斯拉夫制度的危险和威胁的程度要小一些。在压制“修正主义”民主思想和倾向方面，铁托觉得，甚至确信他可以得到政治统治集团中教条的喜欢掌权的干部们的支持。这些干部会意地把他们的命运同铁托的命运以及他独断专行的作用联系在一起。同时，铁托意识到，他再也无法恢复他在同苏联发生冲突以前所行使的那种权力，当时的中央委员会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际上，在他的个人机构中只是发挥一只臂膀的作用。鉴于铁托“重新恢复”的新作用，

重新恢复和建立的社会体制和机构要予以保护，但是不仅是作为“铁托主义的”体制和机构加以保护。如果没有同苏联发生对抗，南斯拉夫的制度可能不会比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现存制度好，甚至会比它们差。南斯拉夫敢于同苏联对抗的勇气来自战后革命爱国主义精神，来自自身产生的权威，最后，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来自铁托维护他的国家和他个人作用的决心。

按照战时的做法，铁托通过那些直接向他汇报的人——警卫、秘密警察、军队——行使权力，这些人都独立于党，或者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党。只有党才能确立铁托的合法地位：所有共产党国家都是如此。斯大林没有能使自己摆脱这种合法性，甚至在他于一九三四年召开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期间，把中央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处死之后也没有能摆脱这种合法性。铁托从来没有放弃或者忽视这种合法性，虽然他在战后依赖这种合法性不如依靠军队和警察那么多。而且，在同苏联决裂之后，他又以新的信心和热情转而依靠党。铁托从来没有正式地完全地显示出个人独掌权力，甚至在同苏联发生冲突以前也是这样。铁托的权力始终也就是党的权力，且不说在多大程度上是这样。

对于铁托来说，党不仅仅是实现革命和社会稳定的工具。对于共产党的绝大多数领导人来说，党是铁托感情上理智的堡垒，是铁托生活的目标，是铁托的命运。

在南斯拉夫半官方的历史记载中，每一件事都以

“非官方”的形式出现，但是每一件事情都得经过官方的同意。在描写铁托和党的不计其数的书刊材料中，铁托不仅被描绘成巩固党的人物，而且还是创建党的人物。如果巩固党的功劳不是归于广大的革命者，不是归于铁托一九三七年被提名来领导的广泛革命运动，而是归于个人，那么毫无疑问，铁托发挥的作用最重要。如果我们不把“缔造者”的作用下定义为最高领导成员，那么说铁托在党内发挥了“缔造者”的作用是适当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铁托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国外度过的。作为党的书记，铁托几乎从来没有参加过重要的级别较高的全国性会议。举个例子来说，虽然他经常在贝尔格莱德，他一次也没有参加过塞尔维亚党的地区委员会的会议。

毫无疑问，铁托以一种狂热的、几乎是神秘的方式激起人们的坚韧精神和旺盛精力。他把他的个性同在战争的具体情况下显现的有形的党，即有血有肉的战友们，以及同抽象的党，即传播思想的党融为一体。共产主义运动是注重实际而又是乌托邦式的。它的乌托邦目标得到科学的支持，并得到实践的证实。铁托的灵活的实用主义与旧制度解体表现出来的革命热情促成的这一目标是一致的。

共产国际诸神——国际革命者和新世界的创造者，其中斯大林体现了马克思列宁的普遍智慧——给铁托戴上了他们信任的桂冠。共产党人在铁托身上看到了真正

的东西，看到了自己，尽管铁托的私生活和他的知识水平与党的文人学士们所宣扬的清教徒式的标准非常不相称。人们默默地或是轻描淡写地放过这些弱点——对更高目标和最高最有势力的职位作出让步。

如果有可能把铁托概括为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就是党派观念强。首先，铁托是党的中间阶层的代表和领袖。在革命前的阶段，这个阶层是由未来的知识分子、或者放弃了自身职业的知识分子组成的；是由不满自身命运的技术工人、理想主义者、空想家和少数野心家组成的。由于党掌握了政权，各个社会阶层的人都涌进党内，人们追求政治特权和官位。这个阶层的社会成分发生了变化，但是它的社会职能没有改变。在革命前和革命中这两个阶段中，这个阶层组成了党，开展了斗争；从这个阶层中涌现出一批负责人和领袖。这个阶层产生了不少英雄人物：共产党人是一个社会和意识形态团体，他们愿意作出牺牲、忍受痛苦甚至献出生命来实现自己的目标。革命胜利以后，职业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工作人员主要是从这些战士、这些英雄人物中选拔出来的。

党欢迎知识分子——铁托欢迎，从战争中奋斗过来的那些人也欢迎——但条件是他们不得"卖弄大道理"，他们愿为工人阶级的理想牺牲自己——总之一句话，只要他们屈从于中间阶层，最终溶化于这个阶层才行。这个中间阶层对知识分子疑虑重重，尤其是对那些不同于

专业学者、善于思考和探索的知识分子。谁也不能无视知识分子，尤其是无视那些“思想家”和“文人学士”。但是对知识分子持某种程度的戒心是必要的。

铁托对党内外知识分子也持有党的专职干部们所持的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不过铁托对知识分子看得广一些，态度灵活些，肯定比党的其他干部看得广，态度来得灵活。这些党的领导人竭力标榜自己就是工人阶级——或者更确切地说，在理论上自己负有工人阶级的使命——他们超出了自我牺牲的范围，甘愿自我菲薄和自我责备。这些党内知识分子要经常在官方的报刊上控诉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出身”和“自卑感”。铁托对知识分子所持的坦率和灵活态度可能是因为他自己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但是即使在这个问题上，他的动机主要是政治方面的：没有知识分子，当代的各种机构就无法存在下去，更不会发展了。没有知识分子，谁来做宣传？谁来扛科学、文化、教育的大旗？谁来建设城市？说实在的，谁来建造颂扬革命及其领导人物功绩的纪念碑？铁托在政治上是富有经验的。党的其他专职干部就很难说有他这样的经验了。

中间阶层——各级党的委员会和政府机关中的人员——组成了政权的骨胳和神经系统。铁托无论说什么话，办什么事，总是想到这个阶层。铁托主义的高级官员们也是如此。一九四九——一九五〇年的危机以后，集体化即建立合作社——苏联集体农庄在南斯拉夫的翻

版——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再也不容忽视了。事实上，南斯拉夫发生的情况并不象苏联那样，是由于放逐富农以及由于后来的灾荒引起大规模死亡所造成的。南斯拉夫没有西伯利亚，南斯拉夫推行的政策比较谨慎和灵活。

此外，美国开始以供应食品的方式向南斯拉夫提供援助。但是监狱里塞满了犯人，农民进行的本能的反抗越来越猛，把我们推到了自我毁灭和全国性灾难的边缘。一九五二年，卡德尔和我建议废除合作社。当时的形势是荒谬的。我们接受美国的援助，也接受英国和法国所给的规模较小的援助，虽然南斯拉夫当时可以自给自足。甚至今天，如果就农业生产制订一项比较合理、不带意识形态色彩的政策、我们光以出口食品就能抵消对外贸易赤字。但是铁托不同意："我们才刚刚开始——我们不能在农村放弃搞社会主义！"铁托的意见得到了党的农业专家们的支持。中央委员佩塔尔·斯坦鲍利奇甚至说："一想到要解散数目众多的集体农场，我的心都要碎了。"

因此，这个问题被搁置了一年，直到这个问题引起的混乱和反抗闹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才着手解决。我同卡德尔举行会商的消息传出去了，我们两人研究了以自愿退社的办法，解决如何取消合作社的问题，报纸也对存在的问题含沙射影。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如何安置在合作社做政治工作，并以合作社做避难所的那些心存不满的当年的将领和没有固定工作的干部？这个问题

找到了解决办法。私人拥有土地的最高限额由三十公顷下降为十公顷，把剩下的土地办成国营合作社，上述人员可以安置在这些合作社里。实行这套办法的法律今天仍然有效。有人甚至大胆地建议把山区私人拥有的土地增加到二十公顷，虽然南斯拉夫仍然需要进口农产品。

此外，铁托对中间阶层，对一种自发的，几乎是有机的联盟的依赖还表现在群众的热情接待中，铁托甚至在去他的狩猎场的途中经过农村时，都受到群众的热情接待。这种接待活动不仅仅是进行组织和施加压力的结果。这些活动表现了地方各级组织的真正的热情，而这种热情又能轻易地传输到思想简单、不关心政治的群众当中去。

在战后初期的几年里，情况并不象现在这样。当时党的领导人，包括铁托，都比现在接近群众。铁托仍然非常关心他的上层同事们的福利。铁托甚至批准他们霸占已经取消并收归公有的别墅。他规定，各种特殊商店里供应要好。我记得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的那个冬天，铁托指示要给联邦政府的每个高级官员分配五吨煤。我们是多么感激啊！薪水的确很低，但是我们不用花钱就能得到几乎所需的一切东西，价格昂贵的煤炭除外。我们之间的关系仍然是美好而正常的。从来没有任何人觉得，按照合法的措施来解决我们所有的物资供应，甚至包括煤炭的供应，是更合理的。

但是由于实行中央集权，由于政治决策机构的权力

逐步缩小，中间阶层开始失去革命主动性，而把他们自己变成中央的一个政治联盟。但是，即使在专制统治下，政治仍然有空子可钻：在铁托周围的圈子里，分歧和冲突开始显露出来。首先是同苏联发生了对抗，其次是关于民主化的问题（即我的事件），最后，是对手在接班问题上的要求（即兰科维奇事件）。我认为，铁托懂得，对于他和他的制度的威胁主要来自上层；如果上层不团结，这种危险就会渗透到基层组织、中间阶层和人民群众中去。铁托主要是从他同我的冲突中而不是从他同苏联的冲突中得出这个结论的。在一个不民主、一党制的国家里，情况只能是这样。这种情况已经在克罗地亚共产党人的民族主义分歧挑起的群众运动所作出的反应中非常清楚、非常不祥地显示出来了。

铁托只得依赖党，首先是依赖那些利用意识形态和权力谋取特权的集团和阶层。同时，他并没有忽视他同人民保持联系。同多数共产党领导人相反，尤其同在克里姆林宫里深居简出，因而使人更加觉得神秘莫测而又自以为无所不知的斯大林相反，铁托经常在集会上露面，视察建设工地，喜欢在众多的人面前发表讲话。每当这种场合，人们的欢呼声和鼓掌声震耳欲聋，街上到处是鲜花，人们为了一睹他的风采，把广场挤得水泄不通。每当这些活动结束之后，兴高采烈的人们甚至还久久不愿离去。铁托会合理地对场面和气氛作出评价，注意到人们是热情的，欢迎场面是壮观的。

由于铁托把自己与党等量齐观，他就坚持要控制党。为了确保这种状况得以延续下去，党必须跟随一心一意引导它走上历史性征程的那个人，尤其是因为这一征程保证有一个“幸福的明天”，保证使人民的生活改观。错误是可能犯的，甚至会出现一些偏差，尤其是在某些政府官员中间。铁托以领袖自居，他的举止俨然是一副领袖的派头，一个给人民以幸福的领袖的派头。铁托对他自己的这种超凡感是他的心理的主要部分。

他之所以不仅同军队而且同人民群众保持一种独特的个人关系，原因就在于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随游击队在农村度过很长时间，对农民的不幸和痛苦有所了解。失败使他心绪不安，胜利使他欣喜兴奋。一九四四年，铁托在德尔瓦尔的时候，担心将来铁钉的生产情况，因为要重建遭到破坏的房屋，没有铁钉是不行的。在一九四六年的一次历时很长的干旱期间，晚上他从德迪涅别墅中出来观察天气，因为气象人员也作了错误的预报。随着时间的消逝和事物的变化，随着问题的日益复杂，铁托同人民打交道的经验日益丰富，他同人民的关系也日益深化。这些问题变成了不仅是南斯拉夫的而且也是全世界的问题。权力和荣誉把铁托搞得眼花缭乱，也把党和人民搞得眼花缭乱。由于铁托习惯于享受特权，使惯了权力，党就不可避免地把他置于自身之上。人民又怎么样呢？人民遭了殃，并且多少还按照他们一贯的做法去应付：领袖和人民之间的联系越来越脆

弱和抽象，越来越快乐、单纯、光明。

铁托同党——中间阶层——的联盟仍然是持久的、具体的、实际的。在这个联盟中，具有活力的是胜利、权力和生存。每次危机中，铁托都依靠中间阶层，承认他们是他的权力链条最牢固最坚韧的一环。铁托一贯觉得并且知道，这些人比党和国家的工具更加属于他“个人”。铁托从来不干预或者责骂那些在生活上奢侈豪华的官员——涉及政治和触犯法律的严重事例除外。这并不是由于他自己缺乏限制过舒适生活的决心，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他认为，这种生活是官员们理所当然享有的来之不易的权利。新的解放力量披上了他们自己的权威的外衣；他们制定法律、确定自己的道德方式和习惯；过去是如此，现在必然也是如此，只要我们不使我们的权力、我们的权威、“我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遭到威胁。

七

对于共产党独裁者来说，他所统治的是哪个国家，是无关紧要的。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不过，这种说法也反映出反共的偏见。

共产主义，不管它是在哪个国家实行的，其实质都

在于权力。有了权力才能建立一个新的共产党社会。每个真正的共产党领袖的行动和愿望总是有动力的。共产党领袖，尤其是独裁者，都是在长期艰巨的民族斗争中造就的。

抽象地来看，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共产党的权力来说，共产党专制者统治的是哪个国家，这是无关紧要的。但是，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不是完全抽象的，当然也不是完全纯正的，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是可以适用于各国和一切情况的。一旦开始运用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或那种设想就会失去分量或获得分量。权力也是如此。共产党领导人，独裁者都有各自的个人特点。阿夫托尔哈诺夫①敏锐地观察到要把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培养成独裁者是徒劳的，因为勃列日涅夫自己不能够把自己变成为独裁者。

无论是法西斯独裁者，还是共产党独裁者，都是意识形态群众运动的领导人。这并不是要把法西斯主义同共产主义相提并论。这两种主义仅仅是在表面上和形式上相似，因为这两种运动有不同的社会根源和社会抱负，有不同的社会结构，它们必须维护这些东西，或者以这些东西为基础。从表面来看，共产党独裁者就其爱

---

① 早年加入联共（布）党，三十年代曾任联共（布）党中央督导员。一九四三年亡命西方。他先后出版了好几本书，被西方誉为“克里姆林宫学家”，其代表作为《权力学》。——译者

装潢门面和知识肤浅而言，是与法西斯独裁者相似的。他们都有不可抑制的强烈愿望，追求个人的显赫地位和个人权力。但是他们争取达到目标的方式是不同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党领导人是从旧社会的废墟和古老的梦想中产生的；他们的力量有一个不断增长的过程，他们的方式不断更新和变化。共产主义产生新的形式和新帝国，将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即使某些共产党国家，包括苏联在内，不再存在了，共产主义还会存在下去。

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有本质的不同。法西斯主义者谋求改变政治关系，保持社会条件。法西斯主义是恶梦，是疯狂；共产主义是暴力，是禁忌。法西斯主义是暂时的；共产主义则是一种持久的生活方式。随着法西斯强国意大利和法国的灭亡，法西斯独裁者已消失或退化，拉丁美洲、非洲等地的当代的法西斯独裁者只不过是军警结成的腐败联盟的主要官员而已，他们徒劳地企图建立一种意识形态和群众运动，以便保持寡头政治家的特权和过时的统治方式。

无论从意识形态还是从意图来看，法西斯领导人都是民族主义的。阿道夫·希特勒设想在未来建立的亚利安人世界毕竟是以德意志民族为基础的。法西斯领导人梦想征服，他们作出征服计划，并予贯彻执行。法西斯主义存在的目的在于征服。一个法西斯领袖企图奴役别国，但是他认为，只统治他本国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他完全体现本国人民的意志和命运。

一个共产党领袖则有所不同，他会同意去统治另一个国家，但是那并不意味着，他能够或者愿意知道如何去统治。他会说，意识形态上的迫切需要和国际意识要求他这么做；在这里，追求十全十美变成了个人的勃勃雄心。但是愿望和愿望得到认可还无法保证有可能做到或者有能力做到。共产党国家一旦挣脱苏联帝国的控制而获得独立，随即就认为自己是最完美的意识形态形式，同时坚持本国的民族主义特点。共产主义是在本国国土上的国际意识。一个共产党领袖是国际舞台上的一国的统治者。

毫无疑问，苏联一九四八年对南斯拉夫的猛烈攻击激起了南斯拉夫和铁托在巴尔干和对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勃勃雄心。在这个时期，南斯拉夫的注意力转到了本国的现实情况和种种可能性上面，这是千真万确的。当时，铁托怀着十分悲伤的心情对他最亲密的同志们说："我们基本上不是一个发达国家，只要这种情况继续存在……。"他说这番话不是偶然的。不过，南斯拉夫一俟巩固了自身的独立，不结盟国家运动就立即使南斯拉夫和铁托出现在更广泛的国际舞台上。铁托和南斯拉夫既然已经越出共产主义的范围，就越加会成为苏联的眼中钉，妨碍苏联扩张主义在世界各地的活动。

铁托在南斯拉夫有点象是个外国人。这主要并不是因为他在那场诞生南斯拉夫的战争中曾站在奥匈帝国一边作战，也不是因为他在我国发展的关键阶段在苏联住

了七年，也不是因为他本人是在苏联革命和清洗的高潮中长大成人的。由于他是克罗地亚人，所以从血统上和思想观点上来看，他象是半个外国人。无论是从感情上，还是从历史上来看，扎戈尔耶地方的人是克罗地亚人当中最道地的克罗地亚人。从语言上和心理上来看，克罗地亚是自成一体的。克罗地亚是南斯拉夫海上的一个孤独的岛屿，其语言具有悠久的文学传统，是不同于我国标准语言的一种方言。人民是勤劳的，爱移居他方，他们活泼快活，喜好玩乐，爱好喝酒，擅长唱歌。

某些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把铁托看成是企图破坏塞尔维亚政权的奥匈帝国主义分子的继承人，这是毫不相关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分子斥责铁托是把自己出卖给塞尔维亚人的叛徒，这同样是毫不相关的。重要的是，尽管铁托文化水平不高，他还是执掌了统治整个南斯拉夫的大权。南斯拉夫是个多民族国家，其中有两个民族把他们本民族就看成是国家。从整个南斯拉夫，从南斯拉夫全国唯一存在的政党共产党，从通过革命维护一个联合的国家，从通过自卫把南斯拉夫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巩固下来的斗争中，都可以找到一些原因。我在本书中已陈述了一些原因。

但是，铁托在这当中所起的作用有多大？铁托的作用，象每一个政治家的作用一样，是以他对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贡献大小来衡量的。在这一切当中（虽然我暂时要撇开一些东西不谈），也许最重要的是问题如何

解决，而不是通过解决问题取得了什么东西。铁托担任党的领导工作之后，就埋头于研究南斯拉夫的现实情况，当然是从共产党的观点来观察并通过共产党的活动来解释这种现实情况。法西斯的入侵，战争，对立党派的投降，苏联的力量和影响的增长，在占领下的革命条件，所有这一切都证实了共产党的预言。这些条件使党有机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并开展活动。

必须经常不断地进行组织工作，必须随机应变，在合适的时候改变方式。在这方面，铁托无疑要比南斯拉夫其他任何革命领导人更有进取精神，更有谋略。对于具体的事情，可能做到的事情，铁托最能敏锐地感觉到，而且凭直觉也能知道。他远不是不会犯错误的，因为现实的政治是变幻莫测的。但是他很快就恢复冷静，打消异想天开的念头，然后抓住可能做到的事情和具体的事情。他从不公开承认自己的过错，决不以直截了当的方式或以悔悟的方式承认自己的过错，即使过错明显而严重也罢。他发现自己犯了错误之后，就停下来，静静地思考，然后，他就毫不感到内疚，毫不犹豫地改正错误。一九五一年或一九五二年，有一次，我曾很随便地建议废除军队中的政委制。不管是出于本性还是出于习惯，他把有损于他的威信或他的地位的任何事情，都说成是异己的，有敌意的，这是很有讽刺意味的。对于我的建议，他大发雷霆，说：“废话，你想干什么？天哪！你想搞垮我们的军队吗？”但是，几个月后，军队

中政委的职位废除了。当他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宣布这个消息时，他毫无歉意地看了我一眼，接着说："多听听一些意见，总是好的……"。

铁托从来都是不能衡量他对失败所负的责任的；随着他个人权力的扩大，他就更不能这样做了。他只了解别人的现实情况，只了解别人的错误。因此，他往往动不动就训斥别人，有时是无意的。他训斥别人的时候，他的言行举止显得他并不拥有绝对权力似的，他往往使用"我说过"，"我指出过"，"别人没有听我的意见"，"我不知道"，"我受骗了"这样一些说法，他用这样一些说法来掩饰重大的错误或过失。

在偶像崇拜的气氛极浓和铁托的权力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时候，尤其是在我同铁托决裂以前，我注意到铁托越来越不能作自我批评。我相信，他对具体的事和可能办到的事的辨别能力也在下降，虽然其下降的程度不同于他越来越不能作自我批评的程度。要不然，南斯拉夫就不会陷入这么严重的经济灾难，就不会受"不结盟"义务的约束，就不会出现官僚机构工作效率很低的现象。尽善尽美的世界，没有批评和没有别的选择的世界，就是要犯不可估量和无法挽救的错误的世界。

对铁托来说，南斯拉夫和共产党既是当前的现实，也是历史的现实。虽然南斯拉夫是铁托本人的现实，但是它不可能是一个只属于他个人的世界。他懂得这一点，并不断地设法跨出南斯拉夫的疆界，甚至把南斯拉

夫的现实和南斯拉夫的问题强加于世界。他坚决而又毫不含糊地吹嘘南斯拉夫的成就、南斯拉夫的威信和力量，尤其是力量。“力量”和“强有力”是他常常使用的两个字眼。

对于一位政治家来说，具体的事和可能办到的事是基础，是目标，是手段和理由。但是象铁托这样的职业政治家是从不满足于具体的成就的，因为他懂得，现实是变幻莫测的、不可靠的和危险的。铁托经常保持着警惕，维护自己的成就和自己的独立性。

五十年代初，由于苏联实行封锁，由于我国落后和我们自己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南斯拉夫不得不依靠西方的援助，主要是依靠美国的援助，而且为了回报西方的援助，南斯拉夫不得不对外交政策作某些调整。铁托对最亲密的同事表示他心中的不安和痛苦。他说：“没有独立的对外政策，就不可能有独立”。他认为，接受经济援助，尤其令人感到耻辱。另一方面，在他看来，接受军事援助，我们承担的义务要少一些，因为南斯拉夫是有力量的，并且准备象其他国家一样进行自卫。因此，在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去世后，他便急不可待地强调，南斯拉夫不再需要西方的援助。但是由于外来的大部分援助是粮食，而南斯拉夫农业又一团糟，他的“不靠外援”的政策既行不通，又没有实际意义。

然而，当具体的事和可能办到的事成为一切政治活动所追求的目标之后，就可能迷失方向，最后甚至可能

招致失败。政治理论对政治实践来说是重要的；没有理论，政治活动就没有远见，也缺乏鼓舞力量。继党内民主潮流受到镇压，南斯拉夫同苏联领导言归于好之后，铁托政策的重大缺点便显而易见了。当时，他顽固地、然而并非始终如一地坚持过时的列宁主义理论，坚持卡德尔的把列宁主义同社会民主结合在一起的注重实际的理论。由于铁托没有从事理论工作的头脑，而只有需要理论的本能，所以他就更加心满意足地接受卡德尔的理论，自从南斯拉夫既同东方又同西方进行合作，加强了南斯拉夫的独立性和他本人的作用的重要性以后，就更其如此了。

一九五三年秋，美国和英国决定将A区，即的里雅斯特及其周围地区，割让给意大利，南斯拉夫于是爆发了示威游行，铁托扬言要派军队开进A区。虽然他表示实在痛心，我认为他的决定也是一个周密制定的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是要在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出现变化的迹象的时候，强调南斯拉夫对西方的独立性。当时我去看望铁托，为的是了解他对我所写的文章的反应如何。他当时正在同科斯塔·纳吉将军通电话，我想是下命令要把我们的苏制坦克开进有争议的地区，但不是把我们的美制坦克开进去，如果把美制坦克开进去，那会是尴尬的。我问他："如果意大利人有美国人和英国人的保护，我们如何向意大利人开火呢？"我们是不是也要向美国人和英国人开火呢？"他回答说："如果意大

利人进去，我们也一定要进去。然后，我们就等着瞧……，”事隔不久，铁托在他的住处举行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觉得业已采取的措施还不够。他说“如果我们态度不坚决，他们会进一步要求把B区也割让给他们，而这一点正是我所担心的。”

我认为，当时并不存在这样一种危险。美国和英国只不过是要卸掉一个毒化南斯拉夫和意大利两国关系的小小负担。美国和英国不久后就放弃了它们的计划，吵吵嚷嚷之声平息了下来。一年后，也就是在一九五四年，各方在伦敦达成了一项协议。根据这项协议，A区割让给意大利，B区割让给南斯拉夫，这是美国和英国原先就打算做的。铁托就这个问题作出决定时，感情因素是重要的，或许是最为重要。在政治中，这种感情上的考虑实际上就是重要的现实！另一个事例是，铁托心目中的具体的事和可能办到的事并不因为理论的遗产而使他感到为难，也不是以理论遗产为根据的。一九五一年，在的里雅斯特危机继续存在的时候发生了一次冲突。冲突期间，我态度犹豫不定，针对我的这种态度，他对我说：“我们不能占领的里雅斯特！”

在对政治家的行为和品格作出评价时，经常给人造成错觉的是他们所讲的话。而这并不是因为政治家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喜欢用漂亮的言词来掩饰心中的打算，用漂亮言词掩饰心中的打算是形同走兽的人的本性。然而，我们认识到，政治活动，即使是真心诚意地进行

的，也具有这样一些特点：隐瞒真相，自欺欺人，夸大其词，贬低他人，散布流言蜚语，用各种各样巧妙的，不可预测的办法歪曲真相。原因是，政治活动中集中反映出来的生活脉搏必然是变化不定的，多种多样的。政治家要生存下去，要取得成功，就必须在一切情况下确定正确的方向，采取行之有效的办法。为此原因，如果我们对政治家作出评价时所根据的是他们讲话的方式，而不是他们讲话的内容，那么我们就是立足于比较牢靠的基础之上了，因为从讲话的方式中可以看出讲话者的个性，他可能具有的特点和倾向，而政治家讲话的内容本身常常是没有什么独创性的，总是掩盖他的个性，使人无法正确了解他的真实意图。

铁托作风的特点是明快和朴实、毫无夸张的色彩，没有一点演说家的能言善辩。他讲话简单明确，即使当他企图掩饰在某些事情上举棋不定的心情的时候，也是如此。大家都明白铁托想要的是什么，不想要的是什么，明白铁托认为该干的是什么，不该干的又是什么，尤其是党的中层干部更是如此。这样一些素质以及他的求实本能或许是他精神中最强有力的方面。实际上，他讲起话来简单明了是与他对具体的事和可能办到的事的感知结合在一起的。

铁托的朴实、明快的作风无疑表明，无论铁托和共产党提出什么主张，都是真实的主张，而且一定会予以实现，虽然需要作出一番努力和牺牲。每当我听政治家

们，尤其是那些在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二年间违背党的路线的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党领导人，以转弯抹角的方式发表自己意见的时候，我看出了明明白白的迹象，表明他们的地位在下降，并且行将下野。那也许是因为我本人两度有过类似的经历。头一次是一九五三年夏季在布里俄尼岛，当时根据铁托的建议，我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以显示团结；还有一次是在一九五四年一月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我在那次会议上充当共产党的实用主义者，我声明收回我的主张，其部分原因是我已把我的主张的重要性和影响完全同共产党联系在一起了。那次会议谴责我犯了修正主义，并为此把我开除出中央委员会。

心目中考虑具体的事和可能办到的事，作风明快朴实，铁托认为这些素质是掌握住权力——我甚至要说，是掌握住绝对权力——的手段。总的看来，他对于掌握住党、秘密警察和军队的权力的兴趣要大于他对拥有高于一切、可干预一切的那种权力的兴趣，他主要也不是凭借后一种权力来维持统治的。铁托所作出的每一项决定，即使是马马虎虎作出的决定，从来都是从纯政治的观点来考虑的，或者宁可说是从发挥和促进党、秘密警察和军队的作用的观点来考虑的。

在非共产党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下，不管国家官僚机构和决策过程在多大程度上是民主的，情况基本上是一样的。说来十分简单，各种制度之间的差别就在于挑选

政治领导人的权利和批评政治领导人的权利有多大。南斯拉夫的生活与其他的共产党国家相比要好一些，还算过得去，这是许多因素造成的结果。其中的一个因素是铁托的纯政治观点（这一点看来也许令人觉得荒唐可笑）和铁托的与其说是极权主义的，不如说是专制的统治。正是因为铁托把纯权力、纯政治摆在第一位，而把其他方面，例如经济、文化和体育运动等等摆在次要地位，这些其他方面就顶住了教条主义和压迫，产生了部分的独立性。铁托追求豪华奢侈的生活是政治所造成的又一个荒唐现象，他的这种追求刺激了别人对于吃喝玩乐的向往，这使社会和文化上的分化显得不那么突出。

如果南斯拉夫对铁托来说是太小的话，那么铁托对南斯拉夫来说就太大了。但是让我们把理论撇在一边，用圣奥古斯廷所说的“一个有罪之人总要比一个机械人好一些”这句话来结束这一章。

八

无论哪一种政治制度，都不完全是按照领袖人物的意志制定的。即使是在恐怖最严重、集体化最迅速的时期，苏联制度也没有完全反映斯大林的纲领和方法。社会制度是基层产生的自发力量与上层组织机构两者之间

相互作用的结果。政治的艺术在于引导这种自发力量与上层组织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

以战后南斯拉夫的制度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广大党员无不争先恐后地想获得各种特权。我们可以看到“非社会主义的”那一部分人对新制度的自发反抗。我们可以看到对各个生活领域实行了有组织的压制。就这个方面而言，经受过革命严峻考验的南斯拉夫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区别仅仅在于，它实行的压制更激进、更广泛。虽然有不少私有权幸免于难——农业财产、私有房屋、小型公司——但是无法无天和高压的行为却严重到这样一种地步，即从国内来说，南斯拉夫更象苏联，其相似的程度——是相似，而不是一模一样——甚于它同其他任何人民民主国家的相似之处。但是，西方把南斯拉夫称为“头号卫星国”，这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南斯拉夫人与莫斯科的关系中意见一致多于听从。此外，我们也同莫斯科发生过秘密的争论，甚至竞相要在发展共产主义方面起先锋作用。苏联与南斯拉夫真正能够作比较的是在纯政治和纯权力方面，这方面是约瑟普·布罗兹·铁托所擅长的。

官僚机构的人员不断地增多。一个人只有得到了一个官职，才算是有了稳定的生活和前途。甚至连镇压机关——尤其是政治镇压机关即秘密警察——也不例外，尽管招收秘密警察时要求的条件很严格。起初，这些机关的人员都是党员，是一些忠诚的、毫不动摇的共产主

义者。但是，后来一些政治野心家和革命后站出来的革命者也逐渐被吸收到这些工作岗位上来了。秘密警察控制了生活的一切领域，渗入到生活的每一根毛孔里，渗入到家庭和私生活之中，其结果既有害于执政党，也有害于社会。一九四七年，我的第一个妻子米特拉向我吐露，当主管秘密警察的同志在场时，连塞尔维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说起话来也谨小慎微。贝尔格莱德的情况尚且如此，省一级党委会的情况又会怎样呢？

党通过秘密警察实行控制，一部分共产党员监视另一部分共产党员的主张，无疑是莫斯科，是列宁和斯大林发明的。铁托和“铁托分子”只不过是把它从那里搬过来而已。倘若不是这样，我们自己无论如何也同样要发明出这个主张来的，特别是在大战结束后党组织扩大的时候。为了控制膨胀和防止党受反革命势力和外国影响之害，秘密警察成了上层权力工具，成了国家新主人的太上皇。由此产生的一个重大后果是，党的作用降低了，随之而来的是，党的下层组织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下降了。

同莫斯科决裂之后，许多事情起了变化，一般说来是变好了，但是秘密警察的权力愈益增大，越发无所不在了。起初，由于有人从事亲苏活动，秘密警察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在南斯拉夫同苏联的紧张关系松动以后，在斯大林去世以后，秘密警察的作用并没有改变。甚至在非政治领域恢复了法治之后，

秘密警察的作用也毫无减弱。一九六六年，当革命的警察制度开始丧失其用处的时候，当铁托怀疑或者说发现了秘密警察队伍里有人策划一个阴谋的时候，秘密警察确实发生了变化——尽管这种变化是表面的、短暂的。据大家所说，那个阴谋不是针对铁托本人的，但是有可能使铁托的权力削弱。秘密警察的大多数军官都因此退休或被调到其他部门工作。而且，至少从理论上来说，秘密警察从此被看成是一个专业部门。

党内的民主倾向很快就露头了——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倾向、塞尔维亚的自由倾向、斯洛文尼亚的专家治国论倾向。铁托迎合了这些倾向和变化，但是仍坚定不移地维护他的个人权力。铁托统治时期中这一最自由的阶段的特点是，个人自由和学术自由受到侵犯的情况减少了。

然而，在五年之间，这些非列宁主义的倾向逐渐形成了强大的势头，对“铁托主义”制度，进一步说，也对铁托本人构成了威胁。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二年，在军队的协助下，铁托对党进行了清洗，并把秘密警察重新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

他被正式授予绝对权力——党的“终身”主席和国家的“终身”总统。他很少出席主席团的会议；由副手们向他汇报情况。一项思想灌输计划被提出来了，从孩子到老人，各种年龄的南斯拉夫人全都受到“铁托式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在国内，他是唯一公认受到崇拜的

人物。在世界上，在共产党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在不结盟国家，人们欢呼他是无与伦比的政治家。

所以，是社会制度，是社会秩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铁托所起的发号施令的作用和行使权力的方式基本上原封未动。如果权力不是这个制度的支柱，如果党不是社会的基本单位，这个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政权与党，即使在很大程度上不与意识形态发生联系，仍然具有固有的权威。确切地说：铁托本人改变了，他的统治改变了，但是造成这种改变的是他。这种政治上的荒唐事连辩证法也无法说清：铁托所以能够稳坐钓鱼台，所以能够继续巩固他的绝对权力，是由于他没有约束这个社会制度的其他领域的变革。也许可以说没有约束整个制度的变革。在非政治领域——例如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铁托极少主动提出主张，这并不是偶然的。但是同样属实的是，一旦某种政策改革或政策转变为人所接受，特别是已被证实卓有成效之后，铁托就满腔热情地表示赞成。当基德里奇等党的经济学家和理论家想让经济适应开放性市场的时候，铁托给予的支持再热情不过了。他的支持方式是采取一个简单明了的措施：改变第纳尔的价值。但是这并没有把经济同政策的其他方面联系起来。

直到临死，铁托也没有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政治活动（包括党的干部的薪水、青年团体的活动项目、革命的庆祝活动）可以用第纳尔来衡量。他认为，政治

有政治的标准，并不总是能够用经济规律来衡量的。

如果在一九四八年同苏联发生冲突以后，南斯拉夫还继续实施以苏联经济模式为基础的行政管理制，那它一定早就陷入混乱了。这种混乱又会使国家的权力和铁托的权力受到危害，无论二者的关系是如何地不可分割。这种混乱有可能招来外国的干涉，首先是苏联的军事干涉，而外国的干涉又会使南斯拉夫本国的发展受阻几十年。为了有效地发挥作用，经济企业和企业经理得到了自主权，但是这种自主权以不触犯党的权力为限。文化界也一样有自主权，只是不得涉及禁忌范围内的题材，即党，革命，当然还有铁托本人。一切事物都具有非意识形态的市场价值。

由于官僚主义的准则与警察的无限权力，反斯大林主义与自由市场成了互不相容的一对事物。但是，自治的概念是从反斯大林的暴虐统治和从对真正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憧憬中产生的。自治使人们对官僚制度的批评合法化，也使官僚机构的任性受到抑制，巩固了在走向自由市场经济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但是它对政权的性质或对政治情况的性质影响不大。由于有一个铁板一块的党，有一支无所不在的秘密警察队伍，有一个专制的领袖，自治实际上不可能是民主的。南斯拉夫发生的一切政治危机都与自治无关：秘密警察权力的盛衰；反对派的暗流在党内是自行产生的；没有一次罢工（确确实实没有一次，尽管近年来发生过无数次经济磨擦）是自治机

关或工会发动的。

简言之：就生产者的权利和自由市场经济方面而言，自治无疑是一个成就，但是它对政权和政治制度即纯政治毫无影响。此外，在过去十年期间——在这以前对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进行了清洗，实行了思想灌输的全面计划，铁托荣升为绝对的终身统治者——党的活动焦点集中在自治机构上，这使这些机构内的党员人数增加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因此，应该说自治工作是党的活动的最重要的方面。“民主极权主义化”的最著名理论家是卡德尔，他的最后一部著作《社会主义自治的政治制度的发展趋势》尤为著名，顺便提一句，这本书也博得了西方某些社会党人的好评。

正因为自治是在创造性地反对斯大林和苏联制度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正因为自治未能限制党的政治官僚，因此，它为一种新型的思想动员提供了基础。自治体现了乌托邦的思想，可谓是社会主义的“理论”。

铁托对自治从未有过真正的热情。他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热情，除非他心甘情愿让他自己的权力遭受尖刻的评价。但是这并不是问题的所在。铁托支持自治。一九五〇年，他甚至制定了自治法，使自治运转起来。他懂得，如果让自治成为绝对的自治，用意识形态去左右它，那将会加强南斯拉夫的民族独立并使它更加显得与众不同。但是他也有自己的限度：自治不能超越在革命中产生的管理体制，更不能使这种管理体制受到危害，因为

这个体制是符合他自己的愿望和信仰的。实际与理想融合起来了：于是就产生了不彻底的市场经济。在有利于独揽政治大权的这样一种所有制形式下面，还能有别的什么结果吗？理想化了的现实极少妨碍铁托的真正的现实。

市场经济促进了生产过程和就业机会。南斯拉夫向旅游者开放了边界。法律和秩序现在具有约束力，甚至那些执法和负责维持秩序的人也得遵守。对政敌的迫害情况有所改变：刑罚减轻了，标准化了，虽然即使在今天，政敌仍有可能，而且经常地仅仅因为在一群朋友中谈论轶事或发表“敌对”见解而被判处多年徒刑。这种监视大网以及公民受政治审查的情况依然如故。

为了说明问题，这里不妨根据我的记忆略举几例，这些例子将有助于揭示在对待政敌方面，在继续实行监视方面，以及在政治官僚对公民行使权力方面的一些变化。

据我记忆，一九四五年，赛勒斯·苏兹贝格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猜测说，南斯拉夫有五万名反共游击队在活动。南斯拉夫领导人——我把自己也算在内，尤其是因为当时我主持宣传工作——痛斥了苏兹贝格，说他的数字是恶意的捏造。其实，他的估计或许比我们自己当时的估计还更接近于事实。我们估计有四万名从战败的反革命军队逃跑出去的人。他们中间有谋杀者和犯罪集团头目，同时也有不少的人，用当时那种革命

的、教条的、从感情出发的标准衡量，不该判处徒刑，更不该受到处决。大量的，或许可以说是大多数的逃兵投降了。但是也有为数不少的人继续留在丛林之中。说实在的，有些人犯过重大罪行，例如暗杀党和国家干部，抢劫商店和集体财产等。要不是党和当局坚决而巧妙地追捕他们，发动舆论谴责他们，对他们的同谋犯施加压力，他们的人数恐怕就不会这么少。在小规模战斗中被俘虏的人或者从躲藏地点逃出来的人，自然未经任何法律程序便被打死，往往是就地处决。他们通常都是坚决与新政府为敌的人。但是，正如意识形态斗争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情况一样，其中也有一些人并非爱干犯罪活动。然而，对他们都一样论处了。一共有多少这样的人，谁也说不准。当时没有一个量罪的标准。按照战时的革命的标准，他们统统是有罪的：帮助过自己的头目的，给周围的人鼓过劲的，修过隐蔽处的，恐吓过老百姓的。在南斯拉夫，革命正巧同反占领军的斗争发生在同一个时候，因此反革命分子和通敌分子都被视为卖国贼。革命纲领的宽大压抑不了战斗激起的怒火。

我在我所著的《战争年代》一书中说过，铁托于一九四五年后半年制止了这类由秘密警察（人民保卫局）执行的草率的处决。“没有人再害怕判处死刑了！”铁托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这样嚷道，他感到兴奋，同时也知道已经来临的是怎样一个可怕的现实。从那以后不久，死刑实际上废除了，而且在今天，南斯拉夫也是世

界上死刑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这一点多半要归功于铁托。

但是除了特殊案件之外，这些歹徒一般是不经过法律程序处理的。这究竟是因为意识形态的严厉所致，还是因为深仇大恨难平，还是因为有报仇雪恨的极强烈的欲望呢？谁能说得上来？在这些情况下，异常行为出现了：检察官的情绪、同乡关系、私仇全都起了作用。然而我坚信，基本问题是绝对权威的革命性质，也可以说是非司法的性质的问题。铁托信奉合法程序，但是不信奉那种约束政治决策过程或者向国家的最高权力挑战的合法程序。一九四五年，铁托在同一些同志讨论关于斯特皮纳茨大主教问题的争端时强调说："教会不能凌驾于国家之上！"

我在全国各地视察时，经常有机会听治安官员谈他们如何追捕和消灭变节者。他们全都夸耀自己是如何机智或他们的同志是如何机智。但是他们却往往对自己的计划失败和错误地处决了人文过饰非。有一次，兰科维奇在几位最亲密朋友的陪同下，细致地、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一些最重要的、戏剧般的奇袭。我早已确信，在清算变节者方面，主导原则是维护新政权的至高权力和让它能行使职能。公道地说，我必须补充一句，这个原则并不仅仅是共产党才有的原则，而且就此而言，也并不仅仅是南斯拉夫才有的原则。等待着巴尔干国家的变节者和叛逆者的往往就是这种命运。欧洲其它国家也是如

此，尽管不那么经常。我在我的中篇小说《交叉路口》中以故事的方式涉及了这个题材。南斯拉夫作家从未触及变节者这个主题——不仅因为这个题材属于禁忌的范围之内，而且还因为他们对此了解甚少，对其趣味和意义毫无所知。

有两个相当重大的事例体现了这个原则，虽然这两个事例都没有对社会制度或对政府构成威胁。这两个事例如下：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四九年冬春之交，爆发了穆斯林农民叛乱。来自各个村庄的五、六百个农民聚集起来，沿公路向波斯尼亚的察津挺进。途中，他们占领了一个派出所，缴了一个碰巧开车路过的克罗地亚政府官员的枪。附近一支驻军的指挥官拒绝出兵干预，因为他没有接到上级的命令，为此后来他被撤职了。

但是约有一、二十个治安军官和党委成员拿起了武器（他们还有一挺机枪），在一座俯瞰该镇的小山头上摆好了阵势。当这些农民大叫大喊地走进射程以内时，他们开枪警告，那群闹事的农民顿时溃散了。结果，没有一人受伤。大多数叛乱者回到自己的村庄，就象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但是约有三十个有罪或自认为有罪的人逃进了森林：过了几天，他们全被抓获，并就地枪决了。

贝尔格莱德密切注视这次事件。两星期以后，一个报告写出来了，全面叙述了这次事件。卡德尔提醒我注意这次事件的特殊性。他说："一伙典型的乌合之众。

全都是农民故事和幻想引起的。完全没有组织——没有明确的目标。”这件事确实就是如此!

我们原先担心会发生一场亲斯大林的动乱，但是实际发生的却是一场农民反革命暴动。察津的穆斯林自成一体：他们尚武好斗，性情狂热，在奥地利和土耳其之间的一小块地区生活了几个世纪。游击战争期间，他们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不决之后，终于同游击队联合在一起，尽管是作为另一支军队联合在一起的。显而易见，由于强迫实行集体化，他们与政府的关系疏远了，但是，他们与其他任何人一样没有理由抱怨。然而，最令人费解、最出乎人们意料的却是促使他们奋起反抗的原因。从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民族历史来看，没有任何东西使他们倾向于塞尔维亚君主国。可是，关于彼得二世被用降落伞空投到他们地区某地的谣传却使他们造起反来了。

比耶洛波列的十一、二名亲苏的地区和城镇负责人正是在那时，即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四九年冬，在地区委员会书记伊利亚·布拉托维奇的率领下逃进森林的。他们不但没有得到任何人的支持，而且，他们所在地区的人民都无一例外地参加了追捕他们的队伍。这伙变节者被打败了，四处溃逃，相继缴械投降了，未作任何抵抗。然而，没有一个人活着回到镇上，他们在押解回镇的途中都被抢杀了。

农民的心理的确很古怪：当官方的保安部队向这些

农民说明，怎样从山脉的这一边到那一边组成一道防线，防止这伙变节者偷偷地溜过边界进入阿尔巴尼亚的时候，这些农民公开地对这些前游击队员说："我们早在一九四三年，当切特尼克分子动员我们打游击队的时候，就从他们那里学会了。"

早在战争之前，我就认识伊利亚·布拉托维奇。他为人诚实，态度谦虚，而且和其他上过一两年中学的农民一样，遇事有点好卖弄大道理，但是他在党校学到了马克思主义。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在共产党情报局反对南斯拉夫的决议发表之后，布拉托维奇以老相识的身分给我写了一封信，告诫中央委员会，不要背叛苏联，从而使国家淹没在帝国主义的汪洋大海之中！同年七月，当他作为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代表到达贝尔格莱德后，我请他吃午饭，讨论这个问题。他吞吞吐吐、神情沮丧地对我说，他现在同意中央委员会的意见。他说，他写那封信是出于个人的苦恼。我记得，我曾向布拉托维奇表示，希望他和许许多多身负要职的干部一样，摆脱由于当时疑虑重重而在理论上和精神上所面临的困境。

布拉托维奇和他的同志们的事或许是个最突出的例子，说明亲苏共产党人是如何受到对待的，但是，这个例子还不是最典型的。除了那些逃往东欧其它国家的人之外，所有没有被杀的人都被遣送到一个集中营服刑。在南斯拉夫，严格地说来，只有一个集中营，那就是位

于达尔马提亚沿岸的裸岛上的集中营。

这是一个讳莫如深的问题。除安托尼耶·伊萨科维奇之外，任何人对此都没有写到过。伊萨科维奇描述裸岛的中篇小说，两年前还不准出版，不过，最近我听说，该书可能要出版了。这个问题在各个方面确实都很重要，我在这里也不能回避它。这不仅是因为这个问题牵涉到铁托，而且还牵涉到我本人：自从我与这个制度决裂并对它作出重新评价以来，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道义上来说，裸岛都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

铁托是在一九四八年秋，作出把共产党情报局分子囚禁在裸岛的决定的。他事前没有同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或中央委员会书记们，即卡德尔、兰科维奇和我商量。我是在黑山听到这项决定的。黑山中央委员会委员安德罗·穆戈沙对我说，他接到了贝尔格莱德发出的一项逮捕共产党情报局分子的命令。命令要求把这些分子送到裸岛上的集中营。兰科维奇必定早就知道这项决定，但这只不过是因为需要他的办事机构负责执行这项命令。这项决定恐怕是匆忙作出的。当逮捕开始的时候，集中营还没有准备好，如果说确实作过什么准备工作的话。

至于铁托为什么不先同中央委员会和他长期以来最亲密的同志商量，我只能加以推测。在中央委员会里，他不会遇到大的反对，然而，他或许疑心最高层会有人强烈反对他的决定（或态度犹豫不决）。众所周知，在

联邦部长、议员和各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中，的确有人对苏联和共产党情报局有好感。铁托并不病态地多疑，但是他时刻都保持着警惕，处事谨慎。尽管当时的气氛很紧张，并为搞阴谋的情绪所毒化，但是，我们却接连不断地惊悉，某某高级官员立场动摇，他表示支持共产党情报局。在国家生活的各个机关，很快都发现了斯大林分子。诽谤性和威胁性的亲苏宣传把许多人搞得思想混乱。所有那些觉得应该对国家和党负责的人都渐渐地产生了疑心。

在动乱开始的时候，兰科维奇满腹忧伤地说："最糟糕的是，你不知道谁是你的敌人！昨天的朋友成了今天的敌人——敌人就在你的身边！"如果说铁托比其他人疑心更重的话，那是由于他在苏联的经历，还由于他的责任的重大。一九五一年，铁托曾经向兰科维奇打听我出了什么事，因为他看到我忧心忡忡，情绪低落。兰科维奇对他说，我爱上了中央委员会里一个叫什特法尼娅的同志，她就要成为我的第二个妻子。铁托耸了一下肩，轻蔑地说道："哦，是这么回事，我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

当时有消息说，在各级党委内部和军官当中，斯大林分子的势力日益高涨。铁托也许是因为听到这些消息才突然独自作出那项决定的。在我看来，这是最有说服力的解释。虽然最直言不讳、最好斗的斯大林分子已被逮捕，但是，共产党情报局分子的人数却似乎在日益

增多。逮捕斯雷滕·茹约维奇和安德烈·赫布兰的决定也没有在中央委员会里讨论过。这项决定是铁托自己作出的。我认为，有人可能争辩说，那是个不健全的中央委员会。这个中央委员会是一九四〇年在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选出的，但是在一九四八年三月之前从未举行过全体会议，以后举行过一次全体会议还是为了答复莫洛托夫和斯大林批评南斯拉夫出了偏差的信件。

铁托在他的正式出版的《选集》注释中坚持说，由于当时处于战争环境，中央委员会不可能开会。这是胡说。当时战争已经结束三年了！当时确实有充裕的时间消遣和打猎。难道中央委员会在战时就不能象称为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游击队议会那样开会吗？事实真相是，当铁托需要取得中央委员会的合法支持时，中央委员会就开会。他曾需要中央委员会的支持来反对斯大林，并需要一个正式的讲坛。在此之前，政治局曾不定期地开会，指定的政治局委员也参加。由于斯大林的指责，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提前召开，最高领导机构改组了。这促使铁托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宽容态度，并在采取集体行动时谋求合作。

铁托把他对危险的感觉变成认识，进而变成某种形式的防御，这无疑是自发的，但是也并非没有仔细考虑过事态的趋势。恐怖的事物到处出现，而且日益增多。出路几乎是现成的：出路来自苏联。看到这一点的并不只有铁托一个人！我的思路也在转向这个方向，虽然我

一听到有关集中营和其它激烈措施的消息，心里就不是滋味。在共产党情报局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八日的决议发表之前，有一天我同兰科维奇乘车外出，当我们的汽车在德迪涅转弯的时候，我随口对他说："我们现在对待斯大林的追随者就象他当年对待他的敌人一样。"兰科维奇几乎是绝望似地反驳说："不要这么说！别谈这个问题！"

回过头来看，虽然我可以作种种自我批评，但是我必须承认，我们不能不建立一个监禁共产党情报局分子的集中营。我们的党确确实实是个斯大林主义的党，独揽大权。如果它宽容忍耐；如果它允许反对派在党内合法化；如果它一再退让，对苏联和东欧集团各国共产党步步紧逼的压力放松防备——如果党容忍这一切，那就可能会导致党的分裂，使亲苏势力占上风。如果独裁政权，特别是极权主义政权，容忍反对派的存在，那就不能不使自己无法存在下去，这实在是一大不幸。何况这些亲苏势力比我们自己的领导更富有斯大林主义的气味。如果亲苏势力取得政权，那就意味着，不仅我们现领导要被撤换，党内要发生流血的清洗，而且还会使南斯拉夫隶属于苏联。对于这一点，任何人都不会有什么怀疑。

我们既有革命政权，又有列宁主义教条和斯大林的学说。权力胜过一切，权力就是我们的现实。除此之外，还有裸岛。虽然我们没有用斯大林式的野蛮办法对

待共产党情报局分子，但是我们实在不知道，怎样才能不设这个集中营。

当匆忙制定的关于集中营的法律在国民议会通过时，逮捕已在进行。这项法律的措词笨拙，不加修饰。不过，法律中使用的“对社会有益的工作”这一措词倒很起作用。保安部门领导人在一定程度上是欣赏这个提法的。保安部门宣判的刑期一般为两年，但是，这一刑期在集中营还可能延长。

在集中营，等待着这些囚犯的是不幸和耻辱——无与伦比的不幸，无休止的耻辱。且不说吃的是腐烂变质的饭菜，在采石场从事不用动脑筋的劳动累得囚犯筋疲力尽，这些囚犯还受尽摧残，其倒行逆施的程度与残酷的程度不相上下。对这些囚犯进行再教育的任务给了那些保安部队军官，并且指示他们，不要使用暴力。甚至铁托在他的讲话中也夸口说，我们正在对囚犯进行再教育。秘密警察从悔过自新的人中招募了一批人，并把他们组成了“自治部队”——这些部队正是这样称呼的。然后，这些部队把再教育的任务接了过去，不过，是通过暴力进行再教育的。

那个时期，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具有两重性：它既要不象斯大林主义那样残忍，又要取得与斯大林主义没有多大不同的结果。这个集中营展现了那个时期南斯拉夫共产主义的这种两重性。这种两重性是以最令人憎恶的方式展现出来的。在登上开往裸岛的船时，囚犯首先

被人按着头，推进了船舱。在上岸的时候，押送犯人的保安人员排成两行，囚犯被人驱赶着从中走过，这些保安人员对他们拳打脚踢。伊萨科维奇在他的中篇小说中提到了这种作法，称之为“吓唬兔子的原则”。这种作法常常在那些所谓死不改悔分子身上试用，也发生过施私刑的事件。那些不肯悔改的囚犯受尽了凌辱，只有狂暴的教条主义分子和改过自新的机灵鬼才做得出来！囚犯的头被按进马桶。他们不得不挂上写着“叛徒”字样的牌子。他们必须当众供认自己的非政治罪行。所有这一切都是精心策划的。

在贝尔格莱德，似乎并非谁都不知道裸岛发生的事情。人们产生了怀疑。我也从某些人的销声匿迹和杂乱的零星消息中开始产生了怀疑。但是，就连秘密警察头子兰科维奇也不了解最坏的情况。他曾去裸岛作过一次视察，时间恐怕是在一九五二年夏天。岛上的犯人，就是说已认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的同志，对他的欢迎，使他又感动，又高兴。他视察回来后一再说，我们必须改变对他们的态度。一九五三年九月，我在尼什巴尼亚胜地同多布里察·乔西奇和奥斯卡·达维乔这两位作家一起度过一段时间。我们谈到了新的自由化趋势：我们的共产主义对斯大林和苏联集团进行了抵制。我听说乔西奇出于好奇心曾访问过裸岛。他对我说，保安部门，即国家保安处，发明并运用了改造人的办法，这些办法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凶残暴戾的。我一回到贝尔格莱德，就

把我从乔西奇那里听到的情况告诉了兰科维奇，并安排乔西奇直接向兰科维奇报告。卡德尔也参加了这次会见。他愤怒地喊道："我早就知道那里出了些见不得人的事！"兰科维奇下令调查。情况很快就有了好转，但是，这个集中营并没有关闭。

大约有一万五千名党员和党的同情者先后在这个集中营服过刑。许多人之所以被送到那里服刑，仅仅是因为他们在朋友中间表露了亲苏感情。有些人完全是无辜的。不过，的确有为数不多的活动分子四处宣传，试图组织力量，推翻政权。这些犯人不受法律保护，也不准他们的亲属探望。这个集中营实际上是进一步逮捕的一个情报来源：出卖一个尚有行动自由的同伙是表明自己悔过自新的最好方法。

如果我们考虑到，在各级军官中，存在着大量的共产党情报局分子，足有七千人，那么，我认为，我们的制度可能遇到的危险就不是微不足道的了。但是，当时的警惕性太过分了。如果说还有人没带着伤从裸岛回来的话，那也是人数极少的。他们受到的创伤不只是肉体上的，或许还有心理上和思想上的创伤。许多人都痛苦万分，神情沮丧，萎靡不振。即便是明智的、善意的思想再教育，如果没有公众的监督，也必然会出现偏差，造成惨痛的后果，更不用说裸岛的强迫办法了。公众的监督是唯一的监督。

尽管我没有直接参与集中营的组建和管理工作，但

是，我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活动也不能避而不谈。我对斯大林和苏联制度的批评，言词之激烈，程度之深刻，加重了裸岛犯人遭受的苦难。我的意见被当作官方的意见，并照此办理。那些被认为心存怀疑的人都被迫作了自我批评——采取什么方式，产生了什么后果，人们只能想象。不过，我本人后来也产生了怀疑。一九四九年底，当我在纽约参加了联合国会议之后回国时，我已经开始产生了一些异端想法。

当我在联合国时，我就注意到，西方官员都以理解的心情看待共产党情报局分子受到的迫害，但是也并非没有恶意。当然，也有人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提出了抗议。在我向铁托汇报我国出席联合国会议代表团的活动的会议上，我强烈要求，对取消裸岛集中营的问题给予一定的考虑，那些有罪的人应该交给法院处理。卡德尔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我的意见。他说："我们现在极其需要这个集中营！"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兰科维奇说，通过正常的程序同共产党情报局分子算账，不是那么容易的。铁托默不作声，沉思良久，然后驳回了我的意见。理由大概是：现在取消这个集中营还为时过早。因而，我们就以政客的典型的方式表了态——政客是不受公众监督的，他们追求政治目标，专横跋扈，而不是优先关心人的生存条件和人的苦难。

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二日，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这是此届中央委员会自一九四〇年当选以来，第一

次举行这样的会议，也是起草对莫洛托夫和斯大林的谴责的答复的一次会议。铁托在这次全会上嚷道："我们的革命是清白的！我们的革命并没有把献身革命的人吃掉！"这番话不管对他本人和其他人有多么鼓舞，但却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通过抵抗，南斯拉夫革命开始偿还它对党内的列宁主义分子和斯大林分子欠下的债务——即吃掉依然对老的信念信守不渝的革命者了。逮捕共产党情报局分子并把他们关进集中营进一步证明，这场革命的残酷程度令人难以忍受。是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不把革命追随者吃掉的革命不是一场真正的革命，正如那些由于对革命存在幻想而让革命把自己吞掉的革命追随者并不是真正的革命者一样。

在约瑟普·布罗兹·铁托所创建，然而也造就了铁托的这个国家中，遇事不通知群众，不向群众说明情况，也不交给群众讨论。这种情况（至少在执政党内部是如此）导致了同共产党情报局分子的这场危机，同时也导致了形形色色的过火行为和偏差。禁止新闻自由是共产党政权的罪恶之源，也是铁托和南斯拉夫的罪恶之源。这种罪恶遍及整个社会，渗透到社会的每一根毛孔，妨碍了机体的发育，促使独裁政权实行恐怖和行使暴力。

倘若当时有新闻自由，倘若当时有可能进行公开辩论……那就会出现一个不同的南斯拉夫，第三个南斯拉夫，一个目前我们只能梦想的南斯拉夫，那就不会出现

裸岛集中营。即便建一个集中营，如果领袖的意志和难于驾驭的秘密警察没有在党内取得支配地位，这个集中营的监管当局也不会是由两伙思想右倾的人——保安部门干部和受过再教育的人如此令人厌恶地结合而成的。

倘若，倘若……倘若我们不是那样办事，许许多多问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例如，卡德尔曾在一九四九年召开的中央全会上作过一次报告，表示支持办合作社，但是他是彻底反对集体化的。倘若那样，就不会出现多年强迫出售农产品这样的事情。头号经济学家基德里奇到头来终于把强迫出售称为抢劫的一种形式。然而，这还不是问题最不祥的一面。我记得，基德里奇曾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宣布：一定要在强迫的基础上收购六万五千节车皮的小麦。兰科维奇在记下这个数字的同时，哼哼唧唧地说："逮捕了一万二千人！"被捕的农民都在两、三个月之后获释了。但是，这次逮捕和随之而来的残酷迫害造成了多么紧张的气氛啊！人们多么失望，多么痛苦！

今天，不可否认，情况已经改观，不再象当年的样子了。现在的制度在各个方面都有了发展和变化，只是政府的机构、新闻垄断和制定政策的过程依然如故，如有必要，整个过程还可能来一次循环。

现在，他们逮捕人是有选择的。我所说的不是指恐怖分子和间谍，对这些人是必须逮捕的，哪一个国家都逮捕他们。我指的是那些被认为独立性太强，爱造反的

人，那些向朋友或"官方朋友"陈述己见的人，那些会见流亡者的人。人们几乎总是能够发现"敌意的宣传"，因为"敌意的宣传"含义广泛，从人们对商品价格的抱怨一直到对住房不足的议论，都可以包括在内。如今，他们已不再因此而抓人了，但是，愿上帝阻止，他们一旦需要，还会因此而抓人。有选择地这样逮捕三、四个人，即使不能吓倒整个地区的人，那也足以吓倒全镇的人。

铁托有时反驳外国的指责，即南斯拉夫没有自由，他本人也反对自由。一九七八年，在讨论赫尔辛基协议的贝尔格莱德会议上，在南斯拉夫的人权运动期间，他对外国的这种指责提出过反驳。谁都认为自己对任何人都一样的公正。正如马克思所说，谁都不泛泛地反对自由，而只是反对危及本人权力的自由。铁托赞成这种有选择的自由，卡德尔赞成"逐渐增大的自由"，赞成"与觉悟的提高相称"的自由。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铁托也就不会对他自己，对他的共产主义以及他的权力信守不渝了。

因为铁托信奉纯粹的权力，这种权力才使他得以在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即便新的领导人设法把自己同铁托的"固执己见"，"反复无常"和"低水平"分开，这种印记也会显示出来。

有时也会出现一种机会，使某个人能够做出超越自己的水平，或超越自己潜在力量的事。但是，谁也不可

能超越自己的成就。在铁托的领导下，生活依然是在奋斗，依然是在向前推进，依然是在萌发出新的嫩芽。铁托并不想抑制自己的权力，更不用说超越自己的权力了。

九

即使在战时，约瑟普·布罗兹·铁托也表现出对宫殿的偏爱。但是在那个时期，他更加喜爱山洞。波斯尼亚和黑山的山区并没有宫殿，只有山洞，这些山洞是合适的防空洞。对铁托来说，只有在发生巨祸的日子里，只有在他毕生从事的事业或他本人的生命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他才不过奢侈的生活。

每当我们占领一座城镇，铁托往往给他自己物色一幢最好的大楼，或者是别人为他物色。一九四一年，我们在乌日采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地方，那是一家雄伟壮观的国家银行，这家银行的另一个好处是有一条地道，可以作为掩蔽所。长时间在露天逗留是危险的。铁托寻找山洞和森林，或王室政府在战前刚刚建成而从未有机会使用过的地下掩蔽所。其他一些战时领导人同铁托一样，也喜爱宫殿。然而铁托的这种癖好最突出、最根深蒂固。我认为，这与他要求绝对权力和专制统治的欲望出于同

一根源。

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日，即南斯拉夫军队和苏联军队解放贝尔格莱德之后的几天，铁托视察了德迪涅的王宫，并下令修复。实际上，这些宫殿主要是失修而不是受战争的直接破坏。家具和瓷器毫无损失。保罗亲王的白宫的情况比称作旧宫的亚历山大国王的王宫糟糕。这两座王宫都座落在树木茂盛的小山上，可以俯瞰优美的风景。但是，这两座王宫并不是盖世无双的。同欧洲的王宫相比，这两座王宫看来更象别墅，更象宽敞而华丽的别墅。铁托最喜欢的是保罗亲王的白宫。这座宫殿既明亮，又较现代化，尽管它是按新古典主义的传统设计的。亚历山大国王的旧宫是按照所谓的塞尔维亚式样、拜占庭式样或巴尔干式样建造的。

战争结束之前，白宫修缮完毕，铁托搬了进去。铁托还保留国王宫和罗马尼亚街（一九四八年以后改名为乌日采街）上的别墅。国王宫是留给官方客人住的。正是在这座王宫里，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二日至十三日中央委员会召开了会议，起草答复苏联指责南斯拉夫的一封复信。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九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也是在这里召开的，在那次会议上，起草了一项草案，对共产党情报局的决议进行反驳。铁托并不是无意中决定选择这座王宫来举行这几次会议的：那里以前没有举行过任何重大会议，所以房间里大概都没有被安上窃听器，这座王宫大概不会受到袭击或破坏。

在战后的最初几年中，铁托的工作日多半是在白宫中度过的，他住在罗马尼亚街的别墅里。这座别墅原先是一个名叫阿策维奇的富有的塞尔维亚人的财产。别墅里有一个大花园。战时，德国人征用了这座别墅，让经济部长诺伊豪森使用。战后，共产党人没收了这座别墅。这大概是德迪涅最漂亮、最舒适的别墅。当战争接近尾声、贝尔格莱德战役仍在激烈进行的时候，第一集团军就把这座别墅留出来给铁托了。后来，铁托把邻近几座别墅和花园合并在一起，并且筑起了一堵石墙，全都围了起来。他对这座别墅产生了特别的感情。他不仅住在那里，工作在那里，而且还在那里接见来访者，正式的接见除外。

按照礼仪和法律，铁托无权拥有这些王宫。他不是国家元首。主席团主席伊万·里巴尔博士同主席团其他成员一样，没有表示反对。所有的人都满足于分给他们的住宅。甚至在王室摄政时期，在成立了有王室政府代表的联合政府以后，也没有人提出过反对意见。甚至王室摄政者或王室大臣也没有提出过反对意见。确实，国王在英国人的压力下不得不接受我们共产党人所指定的摄政者。王室大臣们也同样是如此。但是，这些摄政者只满足于所扮演的有威望的、尽管是过渡性的角色；他们不大关心王储的财产，他们只是在形式上代表王储。胜利者夺取了一切，唯独精神除外，精神是胜利者所不能束缚的。

中央委员会的其他委员也不批评铁托。作为革命战友，他们当然有权批评铁托，但是，他们满足于在铁托领导下取得的胜利、他们的职务和前途。除了个人之间的小分歧外，他们全都拥护同一个政权，全都拥护铁托。如果他们有一点点怀疑和批评意见，他们都藏在心里，以免被说成是搞派别活动，或被说成是怀有卑鄙的野心。所有的人全都为了党和意识形态的统一而心甘情愿充当奴隶。脱离他们的社会环境，脱离他们自己的乌托邦，所有的人都将被遗弃，都将无依无靠。

铁托喜好过奢侈的生活与他任性地占用宫殿是分不开的，虽然他的这种喜好只是伴随着他任性地占用宫殿而来的。在这件事情上，与在其他一切事情上一样，对铁托来说，必不可少的是双重的权力，既控制国家又控制党的绝对权力。在人民的眼里，宫殿是权力的所在地和权力的象征。老百姓也许对浪费金钱去修缮宫殿和他们的统治者挥金如土感到不快。但是，他们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不可避免的：荣耀也许并不总是伴随着财富，却总是伴随着权力，或者说至少在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革命成功以后，权力是天赐的说法似乎不再说得通了。然而，人民继续把权力当作某种不寻常的和崇高的事物来遵从。难道权力不对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产生影响吗？

因此，老百姓也许认为共产党的干部住进宫殿和别墅不对，但是，他们并不大加反对。在起义和战斗中，

情况往往也是如此。共产党人曾许下诺言，说他们上台之后，人民的生活就会改观，就会出现一个不谋私利、办事不走极端、人人平等的时代。某些人确实曾嘲笑这些诺言。然而，一般来说，人们并不认为铁托搬进王宫居住是什么不寻常的事。他是领袖。权力掌握在他的手中。他住进王宫是理所当然的事。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感觉到了这一点。他知道这一点。他住进王宫，从王宫实行统治，就是墨守君主的传统，就是墨守关于权力的传统观念。如果人们把铁托所受的那些毫无用处的关于阶级政权和国家逐渐消亡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从他头脑中清除干净的话，就可以看出，铁托没有什么修养，他的志趣也不高尚。基本上，铁托抱有统治者是操持一切的主人、人民是忠实的仆人这种旧式思想。在他看来，宫殿、高人一等的生活方式，以及舒适的生活条件，使人对权力有更深刻的印象。战争结束以后，铁托接受了那些确切说来并没有参加过革命的人所表示的忠心。他私下同象我这样的清教徒式的人说："最好的公民是俯首帖耳的公民。国家依靠公民的忠诚。"

但是，举铁托的奢侈生活为例，来说明他是如何把自己凌驾于党之上、如何把群众普遍对他个人迷信的风气带到党内来，其重要意义要大得无可比拟。确切地说，他把他个人与意识形态等同起来了。铁托并不象列宁那样是思想家。我已说过，作为思想家，他是比不上

斯大林的。只有通过显赫的权势才能够把意识形态和个人等同起来。同斯大林和毛泽东不一样，铁托从来不是凡事有度，从来不是普普通通的。对他来说，讲究排场是必不可少的。那样做满足了他生来想当新富翁的强烈愿望；那样做也弥补了他意识形态上的不足，他所受的教育的不足。

讲究排场不仅明显地反映了铁托的意愿和野心，而且也反映了党和政府的发展。战时，他对过奢侈生活的爱好和对权力的欲望经过几次决定性的流血战斗以后更为强烈了，而且由于铁托受到群众自发的和被有意激起的颂扬而合法化了。实际上，这种情况早在战前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当时，党通过内部的激烈斗争取得了思想上的团结一致，铁托以奸诈的手段，一心致力于夺取领导权。

当然，这种占用豪华宫殿的行为具有广泛的反王室的和革命的含义。君主制度的象征和君主的所在地被占用了，尽管国王并没有废黜。在这方面，所有的共产党人都支持铁托，对君主制度和旧南斯拉夫不满的其他人也都支持他。多么荒谬！共产党人的觉悟仍然是平均主义占主导地位，是混同于“老百姓的”；他们的习惯和生活方式几乎是禁欲主义的。许多共产党人，特别是那些比大多数人更死板和更理想主义地看待意识形态的革命知识分子，不能够或者不愿意接受这种炫耀权力的做法，不能够或者不愿意接受这样一种无节制地追求奢侈

生活的做法。

最早出现的不满是由不同的动机引起的。早在一九四五年，赫布兰这个自己喜欢过豪华生活的人向苏联领导人表示了不满，说铁托感兴趣的与其说是斯雷姆前线，还不如说是修缮白宫。更常引起这种不满的是人们把铁托与王族相提并论："可是，铁托并不是国王！"这种不满情绪很快就平息下去了，因为轴心国仍然是强大和有战斗力的；由于在党内和在他与苏联人的关系中，铁托的地位已十分稳固，他只要指责谁是敌人，就可以把谁搞掉；而且还由于他占用宫殿是得到具有绝对权威的莫斯科同意的。理由是：你能怎么样？这个国家将存在下去；应该关心和巩固这个国家。铁托还在我们关在监狱里时，还在进行革命期间就领导我们。谁身上没有缺点呢？

铁托接管王室的财产是公开的，一贯的。他在细小的行动上以及在日常的谈话中明确地表示，凡是属于宫廷的东西，现在都属于他。这样做有其好的一面：房屋修复了，家具保存下来了，瓷器、装饰品和艺术品得到了妥当的保管。南斯拉夫解放后，王室的财产继续被占用，即使铁托只是偶尔才利用一下也罢，这指的是罗曼尼亚山上的一座毁了一半的别墅以及斯普利特的几座别墅。此外，卡拉乔尔杰沃和贝列的大片庄园和禁猎区现在已经归这位新主人管辖和使用，这些原来是旧南斯拉夫的国家财产，王室只是在举行狩猎聚会或度短期的假

日时才能利用。确实，铁托表现出了一定的灵活性：他邀请政治局委员和他的心腹到那些地方打猎，尤其是在他能够同他们一起打猎的时候；他还让他们得到庄园上出产的物品。

只有塞尔维亚的托波拉的王室庄园和别墅，以及黑山沿海的米洛切尔的王后宫殿没有受到铁托的占用政策的影响。他对前者不满意的原因，我认为是那里的一座教堂里有王朝的地下墓穴。总之，托波拉不大，只有两座小小的别墅，而铁托周围有大批随从的行政和警卫人员。托波拉也是塞尔维亚人心中最庄严和最受崇拜的圣地之一。所以，托波拉让给了塞尔维亚政府。米洛切尔既偏僻又很小。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以后——而且由于铁托更喜欢布里俄尼岛——米洛切尔就交给黑山政府使用。

至于贝尔格莱德市中心的王宫，一座里面有个美术馆，另一座在一次空袭中被炸毁了。这两座王宫不适宜于铁托居住，因为没有适当的安全设施。这两座王宫修复后，分给了联邦政府和塞尔维亚主席团。

在王宫和别墅里工作的人薪金优厚，还享有某些特权。维持这些王宫和别墅的费用有多大？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贮存的食品被用完和实行市场经济，铁托的某些开支开始记帐，至少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的薪金开始记帐。铁托本人的薪金是微不足道的，勉勉强强够吃穿之用，是象征性的。他个人的开支同国家的开支是分不开

的。营造的费用和整修房屋的费用都记在国家的一项特别帐目上，铁托只不过是指示财政部付钱就是了。在过度的和特殊的开销中，不可能分清哪些钱该花，哪些钱不该花，也不可能弄清实际上花了多少钱。

毫无疑问，铁托是他那个时代最奢侈的统治者。值得回忆的是，亚历山大·卡拉乔尔杰维奇国王在个人特权方面仅次于日本天皇，甚至非共产党人士也议论过这位国王的奢华。表面上，就铁托的薪金而言，供养铁托的费用要少于供养这位国王的费用，然而，实际上，加上供养铁托身边的工作人员的开支，铁托的这笔费用肯定大于国王的费用。最伤共产党人感情的莫过于铁托贪图享受一事。这些共产党人把自己摆在从属的地位上，摆在朝臣和善良而忠诚的臣民的地位上。

在铁托身边的人员中间，有过一些卑劣的行径。据传出现过小偷小摸、耍阴谋诡计和妒忌的情况。铁托总是惊奇地说："令人难以置信！我身边的人变得多么腐化！"当然，并不是人人都腐化了。总是有一些谦虚和正直的人，然而，某些人由于自身所处的特殊地位而腐化了，即使一些在正常情况下本来不会腐化的人也腐化了。他们腐化的原因在于他们接近于他们为之效劳的政权，在于这种环境使他们有机会胡作非为。要弄清楚哪些行为是过分的，哪些行为是非法的，哪些行为是倒行逆施，那是不可能的。这些行为超出了铁托控制的范围。这些行为要广泛得多。但是铁托位于中心，是显而

易见的实体。

由于铁托自己把王室财产据为己有，所以他阻止不了其他领导人侵占受连累的政治人物和受连累的富人的财产——“受连累”这个词用在这儿不太准确。最初几年中，我们这些居于上层的共产党人从这座别墅搬进那座别墅；我们经常搬家，毫不费事。我们下令要来国家所贮存的物资，要来家具和陈设品以及绘画，这些东西值多少钱，我们极少予以估计。在这方面，最能够克制自己的是科查·波波维奇和亚历山大·兰科维奇，前者是清教徒式的知识分子，后者则是因为在党内负有责任。就艺术品来说，我也表现出了克制态度。我立即将自己的几幅画交给国家博物馆，把一尊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像交给了文化书店。我不知道那几幅画现在是否还存放在博物馆的贮藏室里，但是那尊雕像直到现在还摆在书店中央。

贝尔格莱德解放后不久，就按苏联的做法设立了特殊商店。这些商店不对公众开放，只供高级官员使用。贝尔格莱德那个有名的外交人员商店，向政府官员、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外交团廉价提供高质量商品。

侵占财产，从这个住所搬到那个住所，改建办公室，占有艺术品，征用专门设计的家具，这些行为已达到患一种舒适症的程度。它不仅传染了高级官员，也传染了机关。豪华的饭店和别墅，除少数外，都被改成只有少数人才能进出的娱乐中心。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

员会掌管贝尔格莱德附近一座别墅——据说是用来写报告的!

我从来没有听过铁托斥责任何一个高级领导人在庆祝活动上大肆挥霍，这些活动的费用都得由国家负担。不用说，他对偷窃、贪污和任何一种公开的过火行为都感到遗憾。当基德里奇和我不顾与铁托一起在布里俄尼岛避暑的一些同志不大的抵制，主动采取行动关闭特殊商店时，铁托适应了这个变化。随后，他把他的家庭费用与国家的费用分开。他结算了家庭费用以后说："真叫人不能相信! 这里浪费了多少钱啊! 他们想要什么就拿走什么! 一个人靠自己的薪水是可以过得舒舒服服的。"如果乌日采大街十五号铁托的厨房里的情况是这样，那么在别墅、狩猎的庄园和布里俄尼岛又有多少东西被浪费和被偷窃呢? 铁托的私人司机普尔利亚是波德戈里察的游击队员，他是身上既具有战士特点又具有流氓无产者特点的典型人物。他提升得很快，所以他既不尊重政治局委员，又不爱护国家财产。他在私卖从铁托应有尽有的汽车库里偷来的轮胎和零件时，被当场抓获。他受不了这件丑事和监禁，自杀了。

普尔利亚事件以及铁托将私人家庭费用与国家费用分开的决定都发生在五十年代初期，那时反官僚主义和反斯大林主义的斗争正处于高潮。然而，随着铁托的个人权力再度得到巩固，私人费用与公家费用再次无可挽回地混到一起了。一个名叫莫塞克的农场主的财产和葡

萄园被置于这座新王宫的直接控制之下，不久就成了食品的主要来源地。农民称那块地是“铁托的家园”。原先是莫塞克的地，而现在却是铁托的，他们并不认为这件事有什么奇怪。早先，党的官员们称执行总部是“宫廷”；后来，他们给它起了一个合适的称呼：“元帅的总部”。

规模最大的建筑物是：在铁托的避暑胜地布里俄尼岛上。它保留了它在奥匈帝国时期的旧主人的标记。铁托增建了一个动物园；他喜欢让人在那里为他养上猎物，喜欢追捕猎物。岛上还建了一座供党政高级官员专用的旅馆，房间里的设备都是质量最好的。起初，铁托住在斯波莱托公爵的别墅里。后来，他为自己建起了一座新的宽敞的别墅，于是就把斯波莱托公爵的别墅慷慨地让给了卡德尔。“将来可以在这儿举行五百人的招待会，”当这座新的别墅还在修建的时候，他曾这么夸口说。岛上的建筑物多半是犯人施工的——必须承认，他们在那儿的生活比在监狱里好，获得赦免和保释的希望也比较大。

一九五二年或一九五三年，当我已经开始表示我的“无政府自由主义观点”的时候，斯维托扎尔·伏克曼诺维奇—泰波去布里俄尼岛参观后回来告诉我，铁托曾开玩笑说：“请告诉吉多，[1]我的别墅是什么样子，告

① 为吉拉斯的昵称。——译者

诉他，历史上一切伟大的东西都是奴隶建造的。”除了公事，我从来不去布里俄尼岛。这一点引起了别人的注意，我受到了责备：“你脱离集体。”

在挨着王室狩猎场的贝列，铁托建了一个真正的狩猎别墅。他在其它地方也这么做：他不同意住在不属于他自己的房子里，除了只是勉强地住一个短时期以外。他曾去伊加洛洗温水浴，治疗坐骨神经痛。那里的一座山丘被夷平了。那是一个市立公园的一部分。据说，他对伊加洛的别墅并不怎么满意，因此在靠近王后的小王宫的米洛切尔又开始建造了一座新别墅，那时，铁托已八十五岁或八十六岁了。

在为这些王宫和别墅配备家具、布置艺术品的时候，他很挑剔。有时他亲自挑选，有时是官员们为他挑选，这些官员借此证实他们的忠心，提高他们的地位。雕塑家安东·阿夫古斯廷契奇的“布里俄尼的维纳斯女神像”就是以这种方式得来的，作为“礼品”送到了铁托在布里俄尼岛的别墅。收藏家米马拉战后赠给“克罗地亚人民”和克罗地亚国立博物馆的藏画，最后大部分都弄到了铁托在萨格勒布的别墅里。

我在那个时期的南斯拉夫领导人的眼里，想必是个不好对付的人，因为我注意一切，并且提醒人人注意一切。一九四六年或一九四七年，有一天，铁托向一群官员炫耀新运来的、收藏家米马拉的绘画，当时我确确实实说过：“这些画应该送给博物馆。”没有人附和我的

观点。铁托没好气地说：“你不知道情况。我们把艺术品保存在这里是供展出的。再说，艺术品放在这里可以保管得好一些。”二十年后，发生了一件丑闻：米马拉通过外国报界查问这些画在什么地方。结果，这些画终于被送到了博物馆。

那时发生的某些事情简直荒唐。王室的专用列车也被继承下来了，但是对铁托来说，王室的那列列车不舒服，或者说不够豪华，他下令改装。火车加了两节装甲车，一节在前，一节在后。苏联人在战争结束时曾建议我们采取这种根本性的安全措施。那是在他们有计划地收买我们的官员和职员的活动看来具有阴谋的目的之前。

铁托的所作所为就象是一个逮住了机会，就捞一把，就建造房子，就改善生活的穷人。他有意识和无意识地把现在和未来结合起来了；他谋求连续不断地建造房子。他常常说：“应该造房子，房子总是保存下来的。”然而，他并不是光自己建造房子，别人也为他造房子，也就是说各共和国和各省的官员们为他造房子，当然那是在他的同意之下造的。一九五二年，波斯尼亚政府主席久罗·普察尔向我解释了为什么在波斯尼亚的弗雷洛建造一座宫殿时说：“我们是为‘老大①’建造这座宫殿的，供他到萨拉热窝时居住。”建造这样一些

① 是南党内和游击队对铁托的尊称。——译者

宫殿往往并不仅仅是为了讨铁托的欢心，某些宫殿大概是以那种借口建造的，但也是为了供当地官员们使用的。铁托是否清楚多少宫殿由他支配呢？恐怕谁也说不清。许多宫殿和别墅名义上是为他建造的，其实是为了满足某一个地区和某一个地方的官员们的欲望和虚荣心。

铁托接受礼物，态度是极其一本正经的。铁托说一辆罗尔斯—罗伊斯牌汽车是“萨格勒布市的礼物。”帕韦利奇① 从犹太人手中没收的那些别墅，萨格勒布市的人民后来将它们交给了铁托。铁托说，这些别墅是“萨格勒布市效忠的表示，”似乎萨格勒布人民是诚心诚意这样做的。

铁托的机构以及联邦和地方上的许多官僚机构都占用一些重要的禁猎区。那些最好的狩猎场主要是联邦的财产，那里有着丰富的猎物。当年流传的一则笑话说，只有兔子才是本地或本省的猎物。

有两次打猎我记忆犹新，对革命和我对铁托所持的异端立场来说，每一次印象都是不可磨灭的，是深刻的。

拥有共同边界的国家通常要比邻居更经常地吵架。

---

① 安特·帕韦利奇（一八八九——一九五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组织反动武装乌斯塔沙，在德意占领者卵翼下组织“克罗地亚独立国”，残害大批游击队和平民，被南列为除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以外的最大战犯。战后潜往南美，后死于马德里。——译者

但是塞尔维亚人和罗马尼亚人却是例外，他们从未争吵过。尽管安东尼斯库没有向德国人关闭过他的空军基地，但是罗马尼亚军队却没有对南斯拉夫采取过军事行动。新南斯拉夫和新罗马尼亚继承了悠久的友谊。罗马尼亚总统彼得鲁·格罗查来访问铁托时，战争还没有结束。这次访问是一个邻国的国家元首第一次访问南斯拉夫。象我们一样，罗马尼亚人也曾度过艰难的日子。他们感到很痛苦，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曾听说他们的党和抵抗运动几乎完全被消灭。与其说我们赞赏他们，倒不如说是他们赞赏我们，因为他们认为，过去的塞尔维亚大起义是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主义的革命战争的先声。

有一天，罗马尼亚人邀请我们的领袖一起去打猎，双方都很做作。打猎时，统治者们和政治家们进一步表示亲切友好和善意。在东欧国家共产党领导人中，举行猎宴是显示权力的机会，南斯拉夫人当时在这方面无疑是领先的。我们当中没有人在战前是猎手，甚至连铁托也不是。（我年轻时喜欢钓鱼。）我们去狩猎与其说是为了消遣，倒不如说是为了显示我们的权力和我们的声望。我现在记不清那次国家领导人打猎是在什么地方。那个地方不可能离边界太远。那次打猎定在第二天，当然是在拂晓时分。

当天晚上，罗马尼亚官员们在王室的城堡里举行晚宴，出席宴会的罗马尼亚官员中有党的书记格奥尔基·乔治乌一德治、安娜·波克和瓦西里·卢卡。安娜·波

克知识浅薄，但是长得漂亮，尽管她已上了年纪。彼得鲁·格罗查没有出席那次宴会，此人以前是特兰西瓦尼亚的一个地主。在米哈伊国王统治时期，他担任过首相，因而他一定对于参加在王室城堡里举行的宴会感到不自在。他也没有参加第二天的打猎。他穿一身骑马的装束，只是到处溜达，脸上露出神秘的微笑。

这次宴会很丰盛，有各种各样的罗马尼亚名菜，这使我们想起了我们的民族风味菜肴。还有一些罗马尼亚的吉普赛人，他们热情地歌唱，并且很熟练地演奏管乐。大家边谈话边开玩笑，晚宴直到第二天凌晨时分才散。第二天，我们的保卫人员告诉我们说，王室人员呆在同一个城堡里，在楼上的一个房间里，不让出来。在米哈伊国王流亡期间，这座城堡一直是他们避难的地方。我们感到很不舒服。我感到自己好象是一伙精干的强盗中的一员。我们还是不由觉得罗马尼亚人的这种考虑不周的作法令人好笑。我们听说，罗马尼亚保卫人员搜查了那些吉普赛人的身体，从他们身上搜出了王室的银器，这使我们更感到好笑了，这些东西是在我们尽情吃喝和欣赏音乐的时候被偷的。

在这次狩猎中，我们自己又发现了另一件事。科查·波波维奇第一个发现：那些帮助我们赶出禽兽的猎人助手——他们共有好几百人——看上去不象是农民，尽管他们戴着皮帽、穿着羊皮大衣。他们都很年轻娇气，皮肤很白。最奇怪的是，他们当中还有一些姑娘。我们

和他们聊了天。最初，他们不大愿意谈，但是后来一点点地谈开了。他们都是大学生，其中多数是党员。他们都是从布加勒斯特用公共汽车送到这里来的。他们全都能讲法语。他们感到做了傻事，但是他们很想见一见铁托。

另一次打猎活动暴露了我国政府最高领导人之间的关系状况。我没有参加那次打猎。这次打猎活动是在一九五三年九月间。铁托和其他一些领导人当时在贝列。卡德尔刚刚完成起草新宪法的工作，这部新宪法要取代一九四六年宪法，因为一九四六年宪法在许多方面是仿效一九三六年的斯大林宪法的。卡德尔极为重视这部宪法，因为他认为它是推进民主化进程的一个工具。早先有人向他指出，国民议会好象是个认领尸体的陈尸所，代表们象傀儡一样举手赞成，他很肯定地回答说，“今后将进行充分的讨论——棘手的问题将在这 里 作 出 决定。”他甚至别有用心地对我说：“也许我们将逐渐成为反对派。”根据这项新法律，总统将是国家元首，取代主席团的作用。当然，将担任总统职务的是铁托。这项法律尚在起草期间，卡德尔在政治局或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作了介绍。铁托十分留神地听了新宪法中有关总统的权利和作用的具体规定。卡德尔早就预见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扩大了总统的职权，以迁就铁托的虚荣心。在这之后，这项法律看来就不会遇到任何障碍了。

这项宪法性法律反映了我们积极捍卫马克思关于无

产阶级国家逐渐消亡的学说，这与斯大林和苏联人的背离行为适成对照。那时，卡德尔也许是最坚定、最著名和最受人尊敬的理论家。他把国家逐渐消亡的思想与民主化和自治结合了起来。他认为，如果共产党在日常生活、尤其是经济生活中的影响太大的话，那它就阻碍了民主化和自治的进程。因此，这项宪法性法律规定：政府由专业人员——当然指的是共产党员——组成，将游击队的高级领导人转为国民议会的代表，从而加强国民议会的作用和地位。铁托很了解卡德尔的立场，同时也很了解这项宪法性法律中支持这一变革的那些条款。所以，据认为，这项变革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凑巧，卡德尔被马上召到了贝列，铁托当时正在那里猎鹿。卡德尔在那里只呆了一夜，他根本不是去打猎的。那时，我几乎天天看到卡德尔，或是通过电话与他进行长时间的谈话，我们主要不是讨论国家大事，而是交换想法。我们有许多共同之处。这是我之所以知道他去贝列的原因所在。我曾预感到将要发生某种不幸的事情，因为那年夏天，在布里俄尼岛召开的那次中央全会上，铁托就已经开始遏制民主化的进程，并使党回到经过考验的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理论的笔直道路上去。

在卡德尔从贝列回来后的第二天，我到他的办公室去。他对我说："老大说：'你们所有的人（这就是说，党的所有最高级官员）都可以去国民议会，但是让我

一个人留在这里！’”这就是说：铁托不赞成由专业人员组成政府。他十分坚决地反对中央委员们参加国民议会。他显然存有戒心，恐怕在党的最高级官员领导之下国民议会的作用会加强。对于铁托拒绝这项宪法性法律我并不赞成，因为我认为，这项法律的草案规定政府的最上层要实现民主化，我的这种看法也许是幼稚的。尤其叫我生气的是铁托反对这项法律的方式，他没有征求政治局的意见，而且又是在一次打猎中表示拒绝接受这项法律。显然，他认为事情还没有紧迫到需要他返回贝尔格莱德的地步。

我认为这样作出决定和这样召见卡德尔并不是偶然的，我的看法也许是错的，或许我当时已经对异端观点入了迷。铁托当时以强有力的和严厉的手段重新建立先前在上层存在过的关系，也就是在南斯拉夫与斯大林对抗以及其后实行改革之前在上层存在过的那种关系。那些改革在我看来是温和的、次要的改革，但是至少具有象征性的重要意义。我责备卡德尔说，“别人召你去，你就去了！”卡德尔反驳说：“事情并非完全那样！”他被刺痛了，很生气，因为我看出了，他与铁托的关系好象是奴仆对主子，百依百顺。这使他恼羞成怒，大概更甚于他对那种关系本身感到羞耻。

我想，我大概是在那个时候对卡德尔说过：“铁托是官僚的头子！”卡德尔在一九五四年一月召开的三中全会上举出了我讲的这句话，在这次会议上，我被谴责

犯有修正主义，并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卡德尔为什么要那样做呢？他那样做与其说是他担心我们的谈话被窃听，不如说是他对我本人不忠和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很可能这两者兼而有之。

追求奢侈生活是最容易不过的，适应奢侈生活也是最快不过的。只要你有权，就总是有吹牛拍马之辈竭力为你铺平道路。战争临近结束，我们开始攀登权力阶梯时，遇到的情况正是如此。铁托遇到的情况也是如此。在战后的头几年里，我们行为笨拙和思想守旧，有的人严重一些，有的人轻微一些，这要看一个人的文化程度和机灵程度如何了。铁托适应得最快，但是由于他的地位和他的虚荣心，他发现自己处于最复杂和棘手的处境之中。在他的宫殿和别墅里，很快就建立了具有欧洲水平的秩序。如果铁托身边的哪一个人员愚昧无知或缺少文化而出了差错，他的行为很快就得到纠正。铁托的宫廷决不亚于它之前的王室宫廷；在铺张方面，它超过了它所取代的王室宫廷。铁托很自然地要炫耀他的珠宝，一味讲究排场。这与他身边的人员和礼仪毫不相干。他的制服上都镶了金边。他所用的一切都必须是十分合适和非常特殊的。他的皮带扣是用纯金制造的，由于太重，经常向下滑。铁托写字用的是一支沉重的金笔。他的椅子给人很深的印象，它总是放在房间的中央。根据场合和他想要给人造成的印象，他经常换衣服，有时一天要换四次。在军队领导人的面前，他穿的是元帅制

服。当他穿着军服出现在文职官员当中、或与中央委员们在一起时，那可能意味着：他希望让人知道，无论他遇到什么问题，他都有军队作他的后盾。他经常使用太阳灯来使他的皮肤保持黝黑。他的头发是染过的，他的牙齿都是假牙，洁白发亮。尽管他天生是个精力充沛的人，但是在公开场合露面时，他常常特别努力摆出一副生气勃勃和精神抖擞的样子。

铁托十分努力养成一种作风。别人都努力赶上他的作风。作风和实质最终都合为一体了。我认为，他握手的方式在一九四四年他搬到贝尔格莱德以后就改变了；从那以后，他的手无力地垂在他的身边，所以那些与他握手的人都不得不有点弯腰。

铁托还努力为树立他的作风而奋斗，他利用他部下的力量来做到这一点。例如：他曾要我们的报纸刊登他就一些特别事件打给外国政治家的电报。这成了一个大难题。在战前的报纸上，这样的电报是很少刊登的。世界上别的国家也没有这种习惯，甚至在斯大林统治下的俄国也没有这种习惯。因此，我们的报纸主编在我们报纸上的不显眼地方刊登铁托的电报，而且常常是完全不登。总统办公厅对此进行了干预，铁托本人曾几次对我说：“这损害我的声誉！”我并不这样认为，但是我说了情，从而情况有了好转。后来某个副主编因疏忽犯了错误，总统办公厅为此再次进行了干预，铁托也再次生气。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年，直到弗拉迪米尔·德迪耶

尔被任命为党报《战斗报》的主编时为止。他说："我已经解决了铁托的电报问题。我们将把铁托的电报登在头一版上。"所以，报纸的头版不再象通常那样刊登一些论述重大问题的社论，而是刊登铁托收到的和拍发的贺电。没有人愿意看这些贺电，因为它们都千篇一律。

为铁托收集勋章是国事活动中首先要做的事情。在国内，这些勋章标志各次全国性纪念日和他起过显著作用的成就。与来访的外国贵宾交换勋章成为一种必行的礼节。古时候，有一位黑山国王尼古拉一世非常喜欢勋章，但是铁托超过了他，成为首屈一指的勋章爱好者。他收集了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批勋章。前不久，社会主义联盟（人民阵线）贝尔格莱德分会建议授予铁托第四枚人民英雄勋章，这一次是为了表彰他经受手术的忍耐力。这件事十分生动地说明了全国是多么了解铁托喜好勋章。这一建议由于铁托在最后一次患病期间出现并发症而悄悄地取消了。

公众向铁托致敬的表示从来都不是自发的，大体上说，这些表示看上去越是自发的，实际上也就越不是自发的。战时以及战后不久，革命的热情与对失败的担心交织在一起。渐渐地，这两种因素都融合成为讲究排场和礼节、墨守成规的庆祝活动了。随着领导人的变动，除了铁托以外，一张张人们所熟悉的人物的画像都逐渐地从宣传画上和公开展出中消失了。个人独揽大权不可避免地要导致非人的作法。

如何庆祝“五一”节的问题使得中央委员会鼓动宣传部的成员们，尤其是担任该部部长的我，感到无限的痛苦。开头，“五一”节庆祝活动确确实实是自发的，正象庆祝铁托生日的活动是自发的一样。自发的庆祝活动是愉快而吸引人的，但是这些活动并不盛大，也不引人注意。渐渐地，有组织的活动取代了这些自发的活动。佐戈维奇不喜欢这些经过安排的欢呼致意的场面和表示效忠的游行。他在一九四六年“五一”节游行大会上讽刺了一个外科医疗单位在卡车上表演一次手术，他对我说：“下一次，他们将表演接生的场面！”

随着庆祝活动组织规模的扩大，表示不满的人也增多了，有的人就在观礼台上当场表示不满，有的人在政治局的会议上表示不满。游行都是由一个单独设立的机构组织的，但是由鼓动宣传部负责主持，因此我受到了批评。然而，这些批评是微不足道的：你们为什么展示这个领导人的画像而不展示那个领导人的画像？为什么一些领导人的画像要比另一些领导人的画像小？为什么这家工厂的游行队伍乱七八糟？为什么郊区人的游行队伍稀稀拉拉，而城里人的游行队伍全都十分整齐？为什么斯大林的画像小于（或大于）铁托的画像？铁托的不满意见最少，也许是因为每支游行队伍都向他欢呼，并且抬着他的画像——他的画像比其他领导人的画像都大，都好，斯大林的画像除外！但是，卡德尔、兰科维奇和其他一些领导人唆使铁托对他根本不关心的一些问题下

定论。所有这些细枝末节对保持最高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来说都是重要的，因而对国家、对人民来说确实也成了重要的了！鼓动宣传部掌管着一切。我们吸取了以往的经验，以更充沛的精力努力处理了这个问题。在政治局的会议上，我提出了一项建议，具体规定"五一"节庆典中使用的标语和画像的数目，规定该展示哪些领导人的画像，画像的尺寸大小，应有多少万公民参加游行（这个数字不必太准确），应有多少辆彩车等等。我的建议经过一些修正之后通过了。这结束了从上层到基层的批评和庆祝活动的自发性。"五一"节庆祝游行的问题终于解决了，最后游行本身开始逐渐消失，这主要是由于南斯拉夫和苏联的意识形态分歧日趋扩大。

铁托形成上述作风，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模仿。他并没有什么发明。模仿的做法是人们最难于接受的，因而引起人们批评和背地里表示不满，甚至在铁托周围的亲信中间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在王国时期的南斯拉夫，当时有这样一种风俗习惯，即君主给任何家庭里的第九个男孩当教父。这一传统起源于塞尔维亚，它是纪念传说中的尤戈维奇九兄弟，他们是在一三八九年的那场致命的科索沃战斗中牺牲的。铁托一住进王宫就把这种风俗习惯延续下来。但是他不可能承担那种君主行动中含有的教父职责。首先是当时已没有宗教活动；此外，十四世纪时还没有预见到会有男女平等。但是，当教父就是当教父，即使是没有神甫、没有举行洗礼——没有人能

够提出一个替换的词来，这种仪式甚至适用于女孩子。南斯拉夫有许多家庭有九个孩子。一些家庭甚至开始要求追溯他们的权利，他们提出要求，并且从这位最有名望和最有权势的教父那里得到各种各样的好处和特权。因此铁托充当教父次数不断增加，并且当了二十年的时间——直到他对此感到厌烦为止。

铁托模仿富贵人家赛马的习惯十分令人震惊和可笑，这使他周围的亲信，首先是卡德尔和兰科维奇，感到不安。刚刚再次允许进行赛马活动，人们就听到有人介绍“铁托元帅的赛马”。养马场当时已经收归国有，都是国家财产。然而当时还留下一家私人养马场——这个唯一的例外就是铁托元帅的私人养马场，尽管众所周知，铁托对马并不特别感兴趣，铁托元帅的养马场实际上是一个军马繁殖场。但是，铁托元帅的赛马还是经常取胜！如果当时有赌场的话，那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报纸茫然不知所措，来自赛马场的消息说，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元帅的这匹或那匹赛马获胜了，铁托的办公厅指示发消息。秘密警察送来的机密报告（这些报告是每天从各地区送来的，铁托贪婪地阅读这些报告）也许对这种作法没有好评，上层人物中间也常有反对意见。一、两年以后，铁托元帅养马场的赛马不再取胜了。

向孤儿赠送礼品过去是王室的风俗习惯，王后往往照此办理。然而，以前的许多君主并没有给孤儿太多的

东西，也许是因为他们所给的东西是要自己掏腰包的，他们也不经常外出旅行，去看望孤儿的次数也不多。但是铁托却经常外出旅行，并且时常去看望孤儿，战争所造成的孤儿是太多了。钱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对铁托来说，用钱从来就不成问题；他只需要下命令从国库中拿钱来，拿出来的总是新钞票，点数和堆放得整整齐齐。那些接受赠款的人总是很高兴，但是又感到迷惑不解。他们知道铁托给的不是他自己腰包里的钱：给予赠款是不是仅仅因为铁托凑巧路过而顺便来访问呢？

对于接受者以及我们这些人（铁托的同事）来说，也许最令人窘迫的一件事是发生在一九四六年夏季铁托去黑山的途中。我们在乌日采停留，参观了一个孤儿院。当铁托把钱递给这个孤儿院的女院长时，她大为吃惊，木然地站着不动。她结结巴巴地说："我们的钱够了。其他孤儿院的情况要比我们差得多。差得多。谢谢你。"我们返回贝尔格莱德后，兰科维奇和我谈论了铁托模仿君主的作法。兰科维奇并不支持我对铁托的批评，但是他也没有把我的批评向上报告。在赠款的问题上——肯定是因为兰科维奇自己曾亲眼目睹了令人不愉快的施舍场面，他说："我不赞成那样做。这是不正当的和不值得尊敬的。"然而那个风俗习惯一直延续下去，直到铁托最后认识到他模仿君主的施舍作法是在降低自己的声望。

国王和其他任何人一样也是人。当上领袖和独裁者

的人是极少的。国王除了继承王冠以外，还继承了一套适合朝廷气派的礼仪。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人懂得如何以专制君主的身分进行王室的统治。许多国王可能会妒忌铁托的专制权力——有些人确实是妒忌的。但是，由于铁托是一个精明和有才干的政治家，他没有建立一个王朝。毕竟，这个国家难道不是刚刚抛弃一个国王吗？铁托不需要王位。他也不能够确立一个继承人——王储。

十

铁托的个人生活和他的政治活动是分不开的。我并不想过问任何人的私生活，但是铁托不属于这种“任何人”。即使是在休息的时候，铁托也依然是一位政治人物。他力图把自己个人生活中的品格和公开活动中的品格结合在一起，但是当这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政治总是占了上风。又怎么能不是这样呢？

假如我不作出努力来对铁托个人生活中的品格和公开活动中的品格这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加以评价，至少是加以描述，那么我分析铁托这位人物的思路就会中断。要描述一位政治领袖身上这两种品格的关系，是极其困难的，但是这一关系之深刻、强烈和意义重大，都超出了客观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承认的程度。

铁托是一个精力旺盛的人，有点神经质，但能自我克制。他的手粗壮而坚韧，跟他颧骨突出的脸可以说是相得益彰。一九四三年德军第五次攻势以后，他开始发胖，手也变肥了。他有时从完全平静的状态一下子冲动起来，把两手伸开，脸上表情丰富。这时，他那一双深邃的蓝眼睛睁得大大的，在两道浓眉之下闪现光芒。但是他也能同样突然地抑制自己突然的兴奋，言谈举止一下子恢复到平时的样子：怡然自得，但又有点急躁不安。铁托高兴的时候通情达理，富于同情心；但他也会勃然发怒，叫人不得安身。他可以迅速而又大胆地摆脱犹豫不定的心情，一头扎进行动之中。铁托作为一位司令官，他在战略上的弱点就反映了他的这种气质，但是这种性情也是一个优点，尤其是在作出政治上的战略性决策的时候。

铁托身体健壮，充满活力。他从来不曾抱怨自己体力不支，他也从不吝惜自己的体力。他并不需要鼓起他全部的力量就可以作出有信心的表示，以维持我们的人的斗志，可是许多人——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却需要鼓起自己的全部力量才能做到这一点。一九四三年三月，在德军第四次攻势期间，有一次我们在普雷尼山区夜行军，铁托的马找不着了。他只好吃力地徒步行军，但是他走在队伍前面，步伐很快，战士们费劲地勉强跟在后面，一头大汗，还不知道是谁在这样带队呢。跟铁托一起行军，差不多总是这样急促。这种急促反映了他

的耐力和活力——神经质的活力，它能够不断地自我充实，似乎也能够本能地自我克制。象斯大林一样，铁托集中注意力的本领是惊人的。但是斯大林的这种能力被他脆弱的身体掩盖了，仅仅通过他的敏锐的思想和脸部表情才表现出来。而铁托注意力的集中则反映在他的全身。

铁托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男子——女人比男人更觉得他漂亮。他皮肤白皙，脸色又晒得发黑，身材结实。他的头圆圆的，前额很高。他的鼻子稍微带点弯，嘴唇薄薄的，下腭显得刚劲有力。他举止端庄大方，体形显得紧凑刚劲，特别是精力充沛而又易于激动，因此人们第一眼见到他就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外表有点日耳曼人或北欧人的味道。给铁托刻过几座半身塑像的阿夫古斯廷契奇常常开玩笑说："他必定有贵族血统。谁见过扎戈尔耶有这样的人？"（扎戈尔耶是老克罗地亚的中心。）南斯拉夫一位海军将领有一次写道，有一点并非无关紧要：我们的领袖首先是一个漂亮的人。他也许不懂得，任何人一旦成为领袖，他的崇拜者就会觉得他漂亮。可是，平心而论，铁托确实可以说是一个真的很漂亮的人。

铁托富于激情，直率。对每件事都富于激情，饮食、爱憎和决策莫不如此。不论是最严重的事还是最微小的事，他都热情对待。有时他在危急情况下失去自制，但是不久就会过去。事实上，只有当他认为发脾气

在政治上对他有好处的时候，他才让自己失去控制。只要你听到“铁托发怒了！”这通常意味着，最好是把有关的问题从议程上撤掉。

一九三七年春天，在我第一次见到铁托以后不久，他计划在斯洛文尼亚的塞夫尼察附近山上召开一次秘密会议。他同一个名叫赫尔塔·哈斯的年轻女交通员一起住在附近的一家旅馆里。后来她成了铁托的妻子。卡德尔、洛拉·里巴尔和其他一些人却从来不把自己的女伴带在身边，即使是作为一种掩护措施，转移当局的注意力，他们也不这么做。可是从铁托的表现来看，爱情生活和党的重要工作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区别。不过，他不让赫尔塔参加会议。他派她到火车站去迎接我们从卢布尔雅那来的同志。我记得，铁托对鸡汤非常满意，对恶劣的天气感到失望，而一着手处理重要工作以后，就很快把鸡汤和坏天气都撇到一边了。

铁托的激情天性，在战争期间，在争取生存和争取胜利的无数次拚死斗争中表现得很明显，这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他给共产国际的电报反映了南斯拉夫革命和苏联利益之间的分歧与不和，也反映了铁托的个性。他的调门很高，提出不同意见时很激烈，尤其是谈到苏联对米哈伊洛维奇的切特尼克分子勾结占领军这件事态度暧昧的时候，他更是言词激烈，往往超过了共产党人对莫斯科的态度所应有的界限。由于我们的军队日益巩固，我们在西方的声望日益提高，同时也由于我们身居

巴尔干要冲，因此铁托在莫斯科眼里有了地位。但是在战争期间，莫斯科和贝尔格莱德之间就相互抱有恶感，因为南斯拉夫领导人作出了史无前例的努力要形成南斯拉夫革命的形象和地位。不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算是什么武装斗争呢？从铁托的充满激情的本性来说，他看到人们遭受屠杀和蒙受苦难是非常痛心的。但是在新的责任的压力之下，他的这一本性只有让位于通常的活动，不论是人道的还是不人道的，只要是现实生活所强加的和现实生活所认可的，就非干不可。

除了处理政治问题以外，与铁托相处是很愉快的。他的确有幽默感，尽管他开玩笑缺乏想象力，也不新颖。可是这些玩笑并不粗鲁伤人。他可以开自己的玩笑——比较温和的，不是针对他的威信或虚荣心的玩笑。我从不记得他开过卡德尔的玩笑，卡德尔也没有开过他的玩笑。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严肃的，公事公办的，尽管是密切的。兰科维奇跟铁托开玩笑是亲热的，但也是谨慎的。别的同志们也都很小心，因为铁托年岁大，责任重，而且可能发脾气。总的说来，我们这些当年身居最高职位的人彼此之间都是不粗鲁的：我们长期共事，结下了友谊，同甘共苦，共担重任，因此，彼此偶有伤害也只是觉得遗憾，而不会恼怒。在玩笑开得很成功的时候，铁托尽情地笑，有时笑得流出眼泪。他会喊道“见鬼去吧！”然后继续笑，笑得前仰后合。

铁托不骂人，除非是在对敌人表示蔑视的时候。即

使在那种时候，他也仅仅使用民间的俗话，而不说那种难听的话。别的同志也不骂人。唯一的例外是莫沙·皮雅杰，他爱骂人是天生的，从语言上和感情上来说，是从贝尔格莱德郊区多尔乔尔这个地方继承下来的。他骂起人来又高兴又激动，抑制不住自己。我们高兴听他骂，谁也不为这种事责备他，因为谁也不会当真。

铁托在闲暇的时候，在坐火车、打猎或者作私人拜访的时候，喜欢东扯西拉地聊天，或者打多米诺骨牌和下棋，下棋的时候比较少，因为下棋很费时间和精力。他打多米诺骨牌的时候心不在焉。他把骨牌平放在面前的桌上，每一次出牌都要把这些牌拿起来看看。他从来不赌博。当时最高领导人都不赌博，不过在革命后的岁月里赌博慢慢地盛行起来了。

铁托总的说来是健谈的，只是在工作中比在私人生活中更爱说。他很少谈自己。当别人说个不停的时候，他会感到厌烦。他喜欢抓住具体问题不放，通常是开诚布公和通情达理的。但是，如果一个问题叫他感到难堪，他会直率无礼地把它撇到一边："这没有用。没有人谈这样的事。你要了解的东西是根本不存在的。"

在形势极其危险的时候，铁托对别人保持一定的距离，变得叫人捉摸不透，不可接近。在他和他的朋友之间，在他和他的先后几个妻子之间，总有一道可以移动的屏障。一道可以移动的屏障，但却不是鸿沟！这道屏障是可以本能地移动的。任何人只要靠得太紧了，就

会感到这道屏障在靠近——他的表情会在一定程度上严峻起来，他的两眼会闪出一道凶光。铁托是不爱忏悔或转移感情的。他的整个为人是毫不含糊的；我就是我，你就是你，我是一个特殊的人。他严肃，负责，有自信心。

铁托记忆力强，但是记得不长久。例如，当铁托一九四五年六月五日跟苏联大使伊凡·萨奇科夫交锋的时候，卡德尔没有支持铁托，但是铁托始终没有报复过他。铁托懂得，他要是跟卡德尔公开吵翻了，就会对斯大林有利而对他自己的地位有害。此外，当铁托与萨奇科夫这次会谈的情况公开发表出来时，卡德尔也受到了足够的惩罚。铁托决不会忘记别人对他的自尊心和虚荣心的损害。他认为自尊心是南斯拉夫人民的基本特征，这只是因为他自己是敢顶敢抗的。

在我和铁托决裂之前不久，有一次，我指出奥地利没有取消他们的奥地利民族属性。铁托说，“不错，奥地利确信奥地利人占第一位。当年我在奥国军队里没有当上击剑冠军，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克罗地亚人。”为此，据报道，铁托最后一次访问奥地利的时候，曾愿意接受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奥地利奖给他的一枚奖章。

铁托力图使自己流芳百世，这是出于他的虚荣心，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既有器量小，也有自大狂。他小气地守护他拥有的每一件小东西，同时还鼓励别人为他建立纪念碑和博物馆，监督这些工程。铁托不是一个挥

霍浪费的人。他的奢侈享受都是有数的。但是他是爱占有东西的，特别是那些为他服务过的东西，它们都必须打上他的印记。在乌日采街他别墅的院子里，他为自己的马竖了一座铜像。

铁托确实爱他这匹战时骑过的马。战后，这匹马不知怎么弄的也带到了贝尔格莱德，铁托在他的花园里为它修了一个马厩。这匹马还是茹约维奇恨铁托的一个原因。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德军进攻德尔瓦尔以后，铁托不得不乘飞机去意大利。他登上飞机的时候，向茹约维奇喊道："照看好我的马！"茹约维奇很恼火。"他关心他的马，我们却呆在这个鬼地方！"茹约维奇比铁托虚荣心少而英雄气概多，他根本不能理解铁托的这个脾气。铁托爱他的战士。他也爱他的马。

铁托在他别墅的花园里修建了一个仓库，用来收藏礼品。这就是五·二五博物馆的开端（铁托在五月二十五日过生日）。一九六八年，博物馆的新馆长建议重建博物馆。铁托批准了重建计划。

在南斯拉夫，城市、学校、工厂和街道都有以铁托的名字命名的，几乎没有哪一个城镇不以此为自豪。战时他走过的路，他停留过的地方，都成了圣地。在铁托的性格中似乎没有什么是最终的、不可改变的——正象一切都是有条件的、不定的和不断变化的一样。

铁托对于突然出现的敌意的反应，应当说是凶猛的和不理智的。由于他拥有绝对的权力，有时候他走得太

远。但是，在最初的发作以后，他通常会冷静下来，考虑有什么别的合适的做法。一九四六年，在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露出了我们跟赫布兰和茹约维奇分裂的苗头。铁托说："他们会成为南斯拉夫的什么领袖！一个是乌斯塔沙，另一个是切特尼克！"（赫布兰是克罗地亚人，茹约维奇是塞尔维亚人。）但是，当他看到我们冰冷的目光时——毕竟，赫布兰和茹约维奇都是老共产党员——铁托沉默了，不再提这个话题。

一九四三年三月，铁托作过认真的努力——我也曾参与其事——设法把他已经抛弃了的前妻赫尔塔从德国集中营里救出来。战后，赫尔塔孤独一人，很有怨气，据说她在贝尔格莱德到处讲铁托的坏话。铁托对她用了一个尖酸刻薄的字眼："日耳曼佬！"（赫尔塔的父母是奥地利人。）大家很不赞成他的这个评语。这一次，铁托又退让了，尽管这样的退让是少有的。

这两个例子——一个是党内的政治问题，一个是个人问题——说明了铁托会怎样对突然的威胁作出反应。他重视一些与政治毫不相干的事情；他认为与他有分歧就是对他有敌意。铁托这种态度，有一些是从苏联学来的，但是也有其自身的根源。

当铁托怀疑别人有偏差的时候，他就会向他的同事们暗示说："他出了什么毛病？""奇怪的态度！""他近来有些疏远了！""你们发现了什么吗？""老天爷作证，这不是偶然的。"一九四八年跟斯大林发生

了灾难性的和令人清醒的冲突以后，铁托对人比较温和一些了，他认识到在政治运动中或者在朋友之间，政治分歧是不可避免的。

铁托的诡诈是出于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而不是出于性格。只要熟悉了他，就可以知道他什么时候是真心实意，什么时候是装装样子罢了。当他决心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的脸色就会缓和下来，露出笑容。有两次，他提出正式辞职，第一次是真的，第二次只是要手腕而已。第一次是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在乌日采附近的德雷诺瓦村，那是在德军第一次攻势之后，我们打了败仗，士气低落。铁托筋疲力尽。没有任何人敦促，他就要求辞去党的书记的职务。据另一位政治局委员回忆，铁托还要求辞去最高统帅的职务。第二次是一九四八年三月一日，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铁托要求辞去政府总理职务，那是在收到卡德尔和我在莫斯科会谈的报告以后，我们跟苏联人关系紧张，所以铁托表示要辞职。但是我看出来了，别的同志也看出来了，铁托只是要考验我们一下而已。每个人都真心地反对他辞职，只有茹约维奇例外，他已经受到怀疑，没有发表意见。

铁托非常懂得，搞政治必须滑头。他机敏精明，他靠这一手能看透他的对手的意图，并采取对策。我想举两个例子，这是还没有人写到过的。一九四八年夏天，我们当时很紧张，对苏联的计划心中无数，我想要听听铁托估计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是在斯普利特，在亚得

里亚海滨。铁托大声说："美国人不是傻瓜。他们不会让俄国人进到亚得里亚海的。"我记得，在我们和苏联对抗的初期，铁托与美国政府还没有接触。同美国的关系仍然紧张。美国人没有忘记我们在战后打落了他们的飞机和鼓励希腊的内战。可是铁托在跟苏联争论时，却始终依靠了美国的支持。我应该讲老实话：尽管我在意识形态上反对资本主义和美国，但是我当时感到铁托对事态的看法是令人欣慰的。

在朝鲜战争期间，柏林发生了又一场危机。莫斯科和它的卫星国莫名其妙地软化了它们对南斯拉夫的宣传攻势，同时加紧了对美国和西欧的攻击。在那几年，我们这些最高层领导人曾经设想过许多方案来应付可能来自东方的进攻，其中的一个方案是参加大西洋联盟。卡德尔、兰科维奇和我都到乌日采街铁托别墅，讨论苏联立场的变化。有人指出，苏联可能要向欧洲发动进攻，最后再收拾我们。铁托已经走上楼梯要回卧室去，他忽然说："你们知道，我对这件事情已经考虑很久了。我有过一个想法：假如出现那样的情况，我们就应该挑起一个事件。"我相信，就是在这一次，铁托引用了一句历史悠久的谚语：政治是一个大婊子。

很多人都以为铁托工作勤奋专心。其实，铁托还不如卡德尔勤奋，卡德尔又不如兰科维奇或者基德里奇勤奋。不过，铁托办事认真、细致，从来不放过最小的细节，即使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也从不马虎，在他当权

之初尤其是如此，因为当时他希望赢得民心，亲自听取各种人的意见和申诉。

他的工作和生活都很有规律。他天天早起，通常在八点钟开始办公。他在上午接见来访者。他每天定时进午餐和晚餐。午饭以后，他散步一小时，然后回到办公桌旁看报告、文件。晚上，吃过晚饭以后，他总要看一场电影，如果手边没有好片子，就随便看什么都行。他在十一点钟就寝，入睡前读通讯社的报道。甚至出外旅行的时候，他也保持这套生活常规。只有重要会议或者打台球才能打乱他的作息制度。他跟他的同志们打台球，可以打一通宵。后来他慢慢放弃了这项娱乐，我们也都一样。由于新建了家庭，承担了别的责任，往昔的亲密友谊纽带松弛了。

铁托的秩序感还表现在他的穿着和饮食习惯方面。每一次活动，他都穿得整整齐齐。他的衣服崭新，而且时髦，没有一条皱纹或一块污迹。在战时，他特别注意自己的仪表。这种爱时髦、爱整齐的习性有点新富人的味道。铁托在吃喝方面是有节制的。他吃得好，但不过度。他喜爱淀粉质食物、熏肉，尤其是熏香肠，以及浓汤——这是他家乡的冬季饭菜。一九四一年一月，我陪他乘车从卢布尔雅那到萨格勒布。（他当时有一辆小汽车，有一名党员司机。）我们在他的家乡停了一会儿，去看望他的亲戚，一对老夫妇。他给钱请他们把两头猪喂肥了再宰，还问了一些有关猪肉的问题，他说，香肠

很不错，不过还可以熏得更久一点。至于白酒，他不时地喝一小杯，很少喝两杯，只有在寒冷的天气或者他感到疲惫的时候，才喝上两杯。午餐，他喝一两杯掺了水的葡萄酒。传说他在晚年大量喝威士忌。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他会失去自制或者违反医生的嘱咐。

不论他住在哪里，都必须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这很符合礼仪和威望的要求。他手下的工作人员也同样整齐清洁。女佣人穿白制服，男佣人穿无尾小礼服。在森林里打猎的时候，随从人员都穿正式制服。铁托和他的佣人之间是不随便亲近的。铁托这种有条不紊、谨严不苟的生活，无疑为他思考问题扫清了道路。对铁托来说，思考是一个必须养成的习惯，他多半是在散步的时候进行思考。在时间紧张或工作繁重的时候，他倒背着两手散步，把怒气和怀疑发泄到自己身上，或者发泄到任何一个碰巧在他身边的人身上。

铁托考虑些什么事情呢？象别的任何人一样，他考虑他想到的任何事情。我相信，铁托考虑得最多的是各种具体问题。他无拘束的长时间的思考对于他的决策是必不可少的：对铁托来讲，思考就是工作，是艰巨而又费力的工作。比较起来，说服他还容易一点，劝他打消一个念头就比较难了。一旦他打定了一个主意，那就只有严峻冷酷的事实才能使他改变想法。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他可能变得不容人。在有两个以上的人参加的会议上，他可能说话尖刻而使人不悦，可是当他同仅仅一个

人谈话的时候却不是这样，这时的气氛几乎总是比较亲密的。

铁托处理公务很利索。他要求办事一丝不苟，一贯反对拖拖拉拉。他不灵活和不容忍，是由于他爱大权独揽的性格，也是由于他独断专行的工作方法。兰科维奇是以耐心和注意小节而著称的，卡德尔是容忍的，不过他在中央含含糊糊，不明确表态。铁托的强硬和不容忍并不是经常的，因为他跟人们打交道的时候往往是灵活的，心胸开阔，听得进意见。只有在涉及他的威信的时候，他才固执己见，吹毛求疵。对他来说，威信是同任何国家大事一样重要的。

铁托很少为工作上的事情打电话，只有在紧急情况下——当他认为他发现了政治上重大偏向的苗头时，当问题涉及一个严重错误的时候，他才会打电话叫人。在一段时间内，他可以几个月不叫我去看他，我也可以不要求去见他。在这中间，在他的别墅里开过几次会，但是铁托从来不利用这种开会的机会来责骂或者为难他的下级。他这种态度就给他的部下灌输了一种自主感，鼓励了他们的主动性。他们觉得自己是铁托的同事，而不是他的雇员。使他们感到屈辱和难过的，仅仅是铁托的君主式的欲望和他的专制特权。

我始终弄不懂铁托为什么喜欢把自己神话化。有人解释说，这来源于他对权力和荣誉的追求，但是我始终认为这种解释是不充足的。诚然，铁托情不自禁地把他

的成就说成是丰功伟绩。他甚至虚构出一两件事，来强调他的优越地位和夸大他经常遇到的危险。但是这并不是为了沽名钓誉。铁托的自我神话化是幼稚的，有时象孩子一样沉湎于空想。这种做法几乎从来不曾提高他的威信和增大他的权力。是不是他有一种下意识的倾向，就是认为他自己和他的使命是体现了一种更高力量的意志和想法？我不知道。无论如何，铁托的神话化从来没有落到全盘虚构的地步：他的想象总是联系到某件具体事情、某个人或某个物以及某个真实事件。总是运气控制了他的政治活动。

一九四六年，俄国的一个医疗小组给铁托做了疝气手术。过了一年光景，在南斯拉夫于一九四八年同苏联决裂之后，他对我们说，在动手术时，那位俄国外科大夫喝醉了酒。此前不久，他说，他戴了一只戒指，做手术时救了他的命。一只戒指怎么能救他的命呢？他指的并不是他从前在苏联买来在紧急情况下用来兑换成现钞的那只戒指。那只戒指在德军第五次攻势中从他的手指上滑下来丢失了。不，不是那只戒指，他指的是苏联人在他一九四五年三月访问莫斯科时送给他的另一只戒指。可是从那以后，他一直没有遇到过什么致命的危险，肯定没有遇到过一只有魔力的戒指能够救他一命的那种危险。

那么，这句话倒底是什么意思呢？他还告诉我们，在德军第五次攻势期间，一条专门受训侦察爆炸物的狗

使他免死于一颗德国炸弹！若干年前，铁托有一次回忆起德军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五日进攻德尔瓦尔之后，我们撤退的情景，铁托说，当时有一个名叫罗迪奇的切特尼克分子用枪瞄准过他。铁托怎么会知道这件事呢？也许他曾经听说过这个罗迪奇当时一直在那一带暗中活动。但是，罗迪奇又怎么知道他跟踪的是铁托呢？真是说不清楚！机会和冒风险——冒很大的风险。可事情就是这样。除了那些奴气十足的马屁精以外，大家都把铁托的自我神话化看作是一种无害的离奇想法，一种唯灵论者的把戏。铁托并不这样认为。他经常反复讲述有关他自己的一些神话，直到这些神话在他自己的形象中牢固地树立起来为止。

铁托一定要由他来第一个宣布重要新闻，他需要出头露面，他是搞神秘化的能手。一九四六年春天，他正在波兰进行国事访问，兰科维奇拍电报向他报告，说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已被捕获，还说这个消息还不能宣布，因为米哈伊洛维奇的同伙仍然隐藏着，正在追捕中。那时我正陪同铁托在波兰访问。兰科维奇的电报使铁托感到特别高兴。切特尼克运动遭到了致命打击，有关米哈伊洛维奇的神奇传说也就此告终。大战爆发以来，西方宣传机构一直把米哈伊洛维奇吹得神乎其神。铁托不能克制自己，高兴得得意忘形，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米哈伊洛维奇已被捕获。

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二日，中央委员会召开会议，起

草对苏联攻击南斯拉夫党的复信。就在这次会议召开前两天，在我下班回家的路上，我乘车恰好经过斯拉维亚广场附近的苏联大使馆。茹约维奇的小汽车正停在大使馆前面。车旁站着他那个留着胡子的警卫员。为了再核实一下，我让司机把车调过头开回去，再一次驶过苏联大使馆。茹约维奇由于具有亲苏倾向已经遭到怀疑，可是他还没有受到监视。同一天，卡德尔、兰科维奇和我同铁托会面，讨论即将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的事项。我把有关茹约维奇的小汽车的事告诉了他们。我们最后不得不承认茹约维奇在同苏联大使阿尔卡季·拉夫伦季耶夫勾勾搭搭。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由于茹约维奇接受苏联的批评而引起了一场激烈的辩论，铁托不得不干脆把秘密泄露出来："茨尔尼（茹约维奇的外号），你有一天去苏联大使馆干什么？"茹约维奇不禁大吃一惊，但是很快就故作镇静地说："噢，我们去谈给拉夫伦季耶夫弄一辆车的事"。这时我开了腔："好极了，一位南斯拉夫政府部长为苏联大使效劳。"这种急于泄露不宜泄露的内情的做法似乎是铁托自我神话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做法大概也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这种做法证明铁托是无所不知的，因而也是无所不能的。

铁托的宗教感情是否与这种情况有关系？他有这样的感情吗？由于他是共产党员，所以他自然也是无神论者。但是，他根本就算不上是什么共产党员。他的无神论从来不具有战斗性。的确，这种无神论从来都没有作

为一种深刻的信念表现出来。在他看来，无神论是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铁托同教会保持关系，他确信，国家仍然占主导地位，决不会受到教会的损害或威胁。他不相信哪个固定不变的神，也不相信任何宗教教义。

谈论铁托的宗教感情有什么意义吗？完全有意义。宗教包含着罪恶，这是一种起伏不定的感情。这种感情对政治上的至高要求和判断有影响。宗教也会使人产生怀疑，并反映人类的悲剧。铁托不愿在死刑判决书上签字。南斯拉夫宪法通常总是规定，这是国家元首的职责。然而，按照铁托写得明明白白的命令，这个职责转交给其它机构来履行。女演员伊丽莎白·泰勒①对铁托佩服得五体投地，主要是因为她曾听说他连一份死刑判决书都没有签发过。这也许的的确确是真的。在铁托看来，他在死刑判决书上签字具有神秘的威力，这是一种证明有正当理由的威力。他或许认为，如果他不在死刑判决书上签字，就可以不必处死。不管怎么说，如果确实把人处死了，他不能对此负责。

列举铁托关于死刑的命令是件多余的事。杀了不少人。不大可能不杀这么多人，因为铁托是权力的代表，是权力的俘虏，权力已经成为造成这么多人被杀、这么多人死亡的根源。在铁托看来，这样杀人就是政治，为了达到预先计划好的既定目标，必须这么干。只要情况允

① 英国著名电影女演员。——译者

许，他就逃避对某人被处死所负的责任。我认为，在我跟他长期的发狂似的斗争中，正是这一点救了我。① 铁托也许不是唯一想救我的人。兰科维奇保护了我，这大概是因为我们有着久远的友谊。我得到了可靠的消息，说秘密警察机构建议，吉拉斯一案应"从肉体上来解决"。但是，兰科维奇没有接受这个建议。对于这个建议，他也许甚至连考虑都没有考虑过。还有其它一些对我有利的情况也起了作用：西方对我的案件大肆宣传，最高领导人害怕丧失威信，但首先是在同苏联发生对抗之后认识到政治上要变得宽容些，特别是对斯大林的血腥清洗有了新的认识。C·L·苏兹贝格对我说，他要求到监狱里探望我，铁托拒绝了，并说，"在苏联，他们为这种事而把人处死！"——他指的是我的所作所为。

政治上的权宜之计"永远"抑制住铁托的宗教感情。这种感情是不表现出来的，而且使他感到不安，但这种感情在现实中曾短暂地有所流露。一九五三年四月，铁托的蓝色专列将基德里奇的遗体运往卢布尔雅那安葬，在列车上，话题转到了死亡和时间无情地流逝的问题上。基德里奇是我们领导人中在和平时期去世的第一个人，他的死令人感到神秘而震惊不已，使人需要得到玄妙的保证——这产生于感情上的迷惑。我说，没有

① 此处原文有脱漏，据美国《新闻周刊》一九八〇年十月二十日补正。——译者

什么能超越物质本身，物质本身是无法毁灭而又在不断变化的。铁托打断我的话说："现在不要再谈这件事了。"接着他带着责备的口吻而又面带笑容地说："不管怎样，谁知道这一切呢？谁知道呢？"

尽管铁托的标志是权力和斗争，但是他也具有一种天生的、异乎寻常的、非意识形态的认识。当谈到奥匈帝国的时候，他不止一次地说："一个组织得很好的国家。"当我谈到黑山国王尼古拉执政后期的那种专横暴虐、令人激愤的统治时，铁托表示反对说："哦，不，我们的青年人认为他可爱、勇敢、爱国，是一个真正的南斯拉夫人。"铁托认为，南斯拉夫各个民族最终会合并成一个真正的民族。当我谈到亚历山大·卡拉乔尔杰维奇国王也曾有过这个想法时，他反驳道："是呀，可是那时没有社会主义。"就在那列运送基德里奇遗体的列车上，我们谈论了创造历史的力量。我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学说来解释历史，马克思说，思想和群众是基本的和决定性的力量。铁托厉声说："胡说！整个历史过程常常取决于一个人。"显然铁托心目中是指他本人。这位政治领袖必定是用他自己的方法、按他自己的形象来解释学说的。

十一

铁托想把他的私生活同他的政治活动分开，但是，他只能部分地做到，因为私生活以及其它一切都服从于绝对权力。他极力保护他的私生活，这种做法来源于他所接受的欧洲的个人主义传统，任何列宁主义的体制或意识形态都无法消灭这种传统。这种做法还来源于人对性生活、对个人幸福的渴求。

那么，铁托是否幸福？不该提这样的问题！什么是幸福？特别是对于一位把权力看作是最高利益（即使不是唯一的利益）的政治家来说，什么是幸福？让我们更加广泛地来探讨这个问题：可曾有这样的创造者，他并不幻想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然而他也没有使那个世界成为一片荒地，最后，他也没有破坏他本该热爱的一切？

斯大林毁坏自己的家庭，牺牲他自己的一切，并不是偶然的。铁托从与斯大林的对抗中所学到的主要一点就是，专制的统治者一旦失去权力，他们也就完了。纳杰日达·曼德施塔姆① 对斯大林的评价是，一个暴君活

---

① 为苏三十年代著名诗人奥西普·曼德施塔姆的妻子，一九八〇年年底病逝于莫斯科。奥西普·曼德施塔姆（一八九一——一九三八），在三十年代大清洗中被杀害。——译者

着的时候是不朽的。铁托自我安慰说，如果他能够把南斯拉夫这样一个面临外来威胁、有一个教条主义的党和一个非民主的国家机器的落后而又四分五裂的国家引向繁荣和独立，他行使专制权力就会是正当合理的。在同苏联发生对抗之后，铁托使他的个人权力合法化了，因而能够使个人权力有所节制。这与他负有超凡的使命是一致的。他是在民族的危亡中靠造反起家的。他追求创新。他赞赏君主式的富丽堂皇。他的权力接近西方的专权统治甚于接近东方的专制主义。

我已经明确指出，铁托并不破坏南斯拉夫各民族内部的思想和社会潮流，尽管他抑制过这些潮流。他也不毁坏他的家庭。相反，他的兄弟们和他们的子孙都兴旺发达了起来。但是，他同他自己的家属并不亲密，没有享受天伦之乐。

铁托有过四个妻子。他同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妻子结了婚，同第二个和第三个妻子是同居关系。这四位妇女在他的生活中起了重要而又不同的作用，但是，没有哪一个对他的生活施加过任何重大影响，更不用说对他的决策施加过任何影响了。我肯定，甚至连他的第一个妻子也没有，虽然我对她并不怎么了解。

他于一九一七年或一九一八年在西伯利亚遇到了他的第一个妻子。人们一直认为，彼拉吉娅·贝洛乌索娃当时是十六岁，比布罗兹小十二岁。据说，贝洛乌索娃长得异常漂亮。铁托所有的妻子都是漂亮的女人，而且

跟他相比，她们一个比一个年轻，这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一九二〇年九月，约瑟普·布罗兹从苏联回国，陪同他回国的是他的年轻而美丽的俄国妻子。她也是一个共产党员，虽然对于她所从事的政治活动，南斯拉夫从未宣传过。布罗兹和彼拉吉娅生了三个孩子，其中只有一个儿子活了下来，名叫扎尔科。至于他们夫妻间的关系，便一无所知。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对铁托来说，不管谁提到这桩婚事都使他感到很痛苦。仿佛他想从他的生活和记忆中把有关这桩婚事的一切痕迹都抹掉。从铁托的传记中可以看出，他经常同他的亲人们分开生活，但是原因很可能是党的非法地位使他所处的环境，以及他没有固定的工作。

不管是什么原因，在铁托于一九二八年被捕之后，布罗兹和彼拉吉娅终于分居了。彼拉吉娅带着他们的儿子回苏联去了——对于一个丈夫已被捕的妻子来说，这样做并非不寻常。当她的丈夫仍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她在俄国改嫁了，并且把他们的儿子送进了一家保育院。由于他们的儿子性格不受管束，还由于苏联的教育方法，这个儿子很不喜欢上学，变得象一个流浪儿。

一九三三年一月，布罗兹从监狱里获释后，就去莫斯科了。由于党务缠身，他无法花很多时间来照料这个没人照管的孩子。一九三六年年中，他不得不离开莫斯科到巴黎和南斯拉夫开展党的工作。

约瑟普·布罗兹在莫斯科可曾见到过彼拉吉娅？如果他见到过，他们也决不会重提他们以前的关系。清洗也没有放过她。直到斯大林一九五三年去世后，她才从劳动营里释放出来。铁托从内心里是了解她的。他知道她是个什么样的“敌人”，但是他对于她所谓的罪过和苦难显然是无动于衷的，由于她在铁托为革命坐牢期间对他不忠，他的这种态度更加强烈而无情。她的不忠对于他的男子汉的虚荣心是个巨大的打击。他认为，单单就她不照管他们的儿子这一点来说，他就有理由感到痛苦和悲伤。

铁托从不说起彼拉吉娅。卡德尔有好几次提醒我不要谈这方面的事。大战期间，当铁托得知他的儿子在保卫莫斯科时失去一条胳膊的时候，他的反应是既感到伤感悲痛，又感到自豪。我碰巧遇到一位从莫斯科移居国外的苏联人，他了解铁托第一个妻子出狱以后的情况。他对我说，铁托后来几次访问苏联时都没有见她。她对铁托的唯一要求是让她看看她的儿孙。

铁托第二个妻子是赫尔塔·哈斯，她是斯洛文尼亚马里博尔的一个大学生。他们是在一九三七年春天铁托从事党的地下活动时相遇的。赫尔塔是一个性情温柔、体态匀称的黑发女郎，她流露出一种内在的热情。她深深地爱慕着铁托。那些十分了解她的斯洛文尼亚党的干部们认为她是资产阶级分子，这大概是由于她与众不同。她衣着整洁，说话流利。但是，她却是一个真心诚

意、有献身精神的党员。大战结束后，她同另一个人结了婚，生了两个女儿，现在她住在贝尔格莱德。五、六年前，我偶然碰见了她。（我的妻子更是常常见到她。）我们互相亲切地打招呼。尽管当她谈到铁托时隐约地流露出不满，但她从不让你忘记他是她儿子的父亲，而且从不说他一句坏话。她总是抑制自己的感情。我曾听说，在她六十寿辰之际或在其它某个周年纪念日，她拒绝接受铁托授予的勋章，这是一种不寻常的高傲姿态。

铁托于一九四一年春天同赫尔塔分手。当时她生了他们的儿子亚历山大（米沙）之后正在养身体，并照看孩子。与此同时，一位年轻的女大学生从贝尔格莱德被派往萨格勒布参加秘密举办的无线电训练班。她的名字叫达沃尔扬卡·帕乌诺维奇，可是在大战期间，我们都叫她兹登卡。很可能是铁托建议用这个典型的克罗地亚名字作为她的假名的。达沃尔扬卡在贝尔格莱德有一个男朋友，他也是一个大学生，还是一名共产党员。他在战争中表现出色，后来成为一位杰出的政治领导人。无线电训练班是在萨格勒布的一所公寓里举办的，铁托有便经常去那里。他和兹登卡就是这样互相认识的。南斯拉夫被占领之后，铁托和政治局回到了贝尔格莱德，那时兹登卡和铁托已经是形影不离了。事实上，他们在整个战争时期都呆在一起。兹登卡当铁托的秘书，虽然她的组织能力不是特别强，她也不是特别勤奋。她不太勇敢，特别容易紧张和惊慌失措。

兹登卡长得特别漂亮。她那炽热的表情使她变得越发美丽。她的身材修长，而且非常匀称，皮肤略显茶青色，有一双闪闪发光的黑色大眼睛。她具有某些罗马尼亚妇女的那种异国情调的美，鉴于她的故乡有罗马尼亚族少数民族，她的家庭里也许具有同斯拉夫族之前的古老民族的混合血统。

一九四一年春天，当铁托在贝尔格莱德同兹登卡一起露面的时候，他面临着一个清教徒式的党，特别是贝尔格莱德的组织。你只有在终止了以前的伴侣关系之后，才能更换伴侣。此外，人们指望忠诚，决不会随随便便同另一个人发生关系。这种清教主义是对早几代人的自由恋爱的一种强烈的反应。提倡和实施清教徒的准则和行为的确有利于加强党的友爱和团结的纽带。但是，这种做法最后却导致了悲惨和荒谬的情况：一个同志自杀；另一些同志受到党的处分；还有另一些同志同资产阶级小姐有交往——不过，进行这种交往的想法，在我们女同志的头脑中大概从未有过。

铁托认识到这一切。他并不反对这种做法，虽然他不鼓吹清教主义，他这一点与兰科维奇和我本人形成了对比。对于他同兹登卡的关系没有什么议论。直到第二年，实际上直到一九四二年，我才了解到他们的关系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总有点不对头。赫尔塔是他公认的妻子，而且她不久前还替他生了个儿子。没有人否认铁托有权同另一个女人发生关系，但是他不该在他同赫

尔塔的关系了结之前就这样做。可是又没有人公开提起这件事。铁托也不谈，直到情况迫使他说出来为止。

赫尔塔显然意识到，她是党的总书记的妻子，应当自重，她对铁托的忠诚表明了这一点。而兹登卡呢，她同铁托的关系，使她突然陷入一场保全尊荣体面的斗争。她无时不在担心她会被撇在一边。她是在战时——在游击战中，在森林和山洞里，在农民的房舍里，在断了炊粮、面临着死亡威胁的时候无情地进行着这场斗争的。但是，这种地狱般的生活非但没有扑灭、反而燃起了她的强烈的情欲和勃勃的雄心。兹登卡常常在最出乎意料的时候和最不应该的场合，寻机和人吵架，出风头，她谁都不放过，包括铁托在内：有人不慎摔了东西；有人走过时无意挤了她一下；没有先问问她，铁托睡没睡；肉煮得欠火或煮老了；烟朝她那个方向吹等等。没有人喜欢她。甚至没有人有机会去喜欢她，因为她把每个人都得罪了。我们觉得，铁托渐渐地对她不能容忍，但是他认为，他不能和她脱离关系，不然的话，他在党内的地位会受到损害，清教徒们会骂他喜新厌旧。我们甚至希望他回去找赫尔塔，虽然那样做并不符合我们的清教主义，因为不久之前他才和兹登卡结合。

但是我们错了。在克服重重困难以后，在德国人合作下，赫尔塔作为一个交换的战俘，从乌斯塔沙集中营里释放出来了。她受过严刑拷打，受过凌辱，经常提心吊胆，担心死神的降临。一九四三年春天，我把她从萨

拉热窝带到我们的森林指挥部。在路上，关于兹登卡，我对她只字不提，她似乎也一无所知。她因为重新获得自由而欣喜若狂，兴高采烈。但是，她的高兴和希望，在我们到达的那一天全都化为泡影。在一次单独谈话中，铁托告许她，兹登卡现在是他的伴侣。他爱着兹登卡，他是根据党的规定办事的。赫尔塔趴在我的肩上抽泣着说："这是怎么回事，吉多同志？"但是她以自身的尊严和忍耐，同意了分居，她以同样的尊严和忍耐，熬过了战争中那段最困难的时期——德军的第五次攻势。一九四三年夏天，她离开波斯尼亚去斯洛文尼亚，也是和我一起去的。

战争结束时，兹登卡得了肺炎。她得了这个郁积的病症，至少部分地怪她爱发脾气，性情暴戾怪僻。她被送到苏联治疗，当她回到白宫铁托身边之后，就很少露面了。她露出苦笑，好象在乞求宽恕，兹登卡在一九四六年去世了。遵照她的遗嘱，她被埋在白宫花园里，以便就在铁托的身边。

铁托显然神情沮丧不振。当我问兰科维奇，"老大"（洛拉·里巴尔和我在一九三七年给铁托起的绰号）出了什么事的时候，兰科维奇对我说，他是因为兹登卡去世了。没有一位领导同志出席她的葬礼，不是因为她不被人喜爱，而是因为铁托对她的去世保密。从此以后，没有人再听说过兹登卡了，似乎她未曾做过铁托的最亲密的伴侣和战时的秘书。铁托的传记作者不提她

的名字，她在战时的照片统统消失了。在她的家乡波扎雷瓦茨，以她的名字命名了一条街道，但是出这个主意的八成是当地的干部，而肯定不是铁托。

铁托很快从这个严重打击中恢复过来。泽卡·孔茨·米拉诺夫，这位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明星，在战争结束时回到南斯拉夫，人们马上就看出，铁托对她发生了兴趣。她除了在募捐音乐会上演出外，很少登台表演。她是一个端庄持重、容貌迷人的女人，在国内外享有名气。由于铁托登上了王室宝座，他或许发现泽卡的名望，和她那令人倾倒的容貌以及不可超越的清脆歌喉，具有同样的诱惑力。但是，铁托有心，她却无意，除了以礼相见，除了一位富有经验的女性对于一位身居如此地位的追求者应当表示的姿态以外，她没有更多的表示。再说，她刚刚第二次结婚，丈夫是一位南斯拉夫将军，名叫留博米尔·伊利奇，是一位优秀的革命家，铁托的战友，在西班牙内战和法国抵抗运动中屡建殊勋。铁托即便对泽卡·孔茨·米拉诺夫发生了兴趣，但是要突然同她形成新的关系，就很不合适了。虽然他可以不理睬他人的蔑视，也可以无视党内女性对“有外国派头的”妇女，尤其是对舞榭歌台上的女流的憎恨，但是要夺自己的将军之美，是不会提高他的声望的。

因此，新欢新爱显然只能在铁托最接近的人中去寻找。他的行动自由，无论是正式场合还是个人消遣的时候，都受到他的警卫和他身边工作人员的严密监视，他

们不仅保卫着他的生命安全，协助他从事重要的工作，而且还把他当作党的英雄主义和道德品行的化身。新欢是约婉卡·布迪萨夫列维奇。她是专门料理他的家务的。即使铁托所过的生活简单得多，俭朴得多，也必须有人去料理种种数不胜数、意料不到的琐碎事务，采办各种各样的细小的生活必需品。约婉卡的任务就是料理这些事务。

约婉卡成天围着铁托转，没有固定的作息时间。由于她的地位和职责，她也成了铁托的一名警卫和随从。到一九四六年，铁托和约婉卡之间大概已经达到了某种程度的亲密关系。约婉卡在认识他之前，未有过恋人。她二十三岁，一九二三年生，铁托五十五岁。

约婉卡很快就受到了注意，不仅是由于她的容貌仪态，而且也由于无论铁托走到哪里，或者在哪里停留，她总是在一边伺候。这一回，我对她的观察比对兹登卡的观察还要留心。我断定铁托同约婉卡之间肯定有意思了。但是我假装没有把握。科查·波波维奇为了说服我，有一次对我讲："咳，为什么不会呢？这是很自然的嘛。"

约婉卡是一个动人的美人，是一个身体健壮的塞尔维亚美女，她有一头乌黑的头发，白皙的皮肤。她虽然不会卖弄风情，却不乏女性的妩媚。她的妩媚是内含的。她象一个修女，或者象一个为了丈夫子女而发誓要献出一生的农妇。因为她总是不离职守，她经常是穿一身

军官制服，那时，她身材苗条，配上束紧腰带的制服，就更显得苗条了。在她那稍微歪戴着的游击队员帽子下面，露出我从未见过的最柔滑最浓密的头发。她有一对乌亮的大眼睛，显出耐性、关怀和一片忠诚，又有细嫩的面颊衬托着。

约婉卡是从利卡第六师挑选到铁托身边来担任工作人员的。她出生在一个殷实的塞尔维亚农民家庭。她念完了小学，对于那个时代的孩子，尤其是在利卡的穷乡僻壤长大的女孩子来说，这证明她比一般孩子聪明。有一段时间，她在她的一个亲戚开的小客栈里当过帮手，这使她更加具有充当铁托身边工作人员的资格。然而，她的主要资格，还在于她作为一个军人的无懈可击的操行以及她对党的绝对忠诚。

就这种事而论，只有那些经过彻底审查的人才能在铁托和其他任何高级官员身边服务，这是一条坚定不移的原则。令人兴奋的传说认为，保安机关挑选约婉卡担任铁托身边的工作人员，不是偶然的。他们挑选并送来了一位政治上无懈可击、尤其是相貌漂亮的姑娘，把她放在他的身边，听其自然发展，甚至我也不时地开兰科维奇的玩笑，说这一切都是他的保安机构精心安排的。当然，我是在铁托和约婉卡结婚之后才开这样的玩笑的，这样就不至于被误解为是要拆台。兰科维奇扫了我一眼，否认有这么回事。

两人的关系是不愉快的，令人难堪的，对约婉卡来

说尤其如此。她的生活天地，只限于铁托身边的一小圈人，和履行自己的日常职责。多少个夜晚，当我们拜访铁托的时候，经常发现她坐在过道里，和铁托的警卫一起守卫着他，一守就是几个小时，直到铁托就寝时为止。在这种情况下，铁托身边的其他工作人员必然对她产生妒忌和不信任。她同铁托的亲近，可以作各种各样的解释——有野心，拍马屁，女性的奸诈，情欲，利用铁托的独身，贪婪。没有一种说法对她是公正的。保卫人员出于恶意和不信任，时而强迫她先吃第一口她一片真诚为铁托做的饭菜。

这种状况持续了六年——充满怀疑、恶意和妒忌的漫长的六个年头。但是，出于对铁托的热爱和克尽厥职，这位年轻的女人耐心地坚持下来了。对她来说，铁托是党内和战时的神明，为他作出牺牲是应该的。后来，她渐渐觉得铁托也是血肉之躯，并且深深地爱上了他。在整个那段时期，她默默无闻地忍耐着——从不多说一句话，从不大惊小怪。她下定决心，如果需要，不惜毁灭自己，不惜在她向往的神明身边，日渐凋谢，不为人知晓，也得不到赏识。她之所以属于铁托，仅仅是因为他选择了她。

为什么铁托要保特这种有损他的身分的关系呢？是因为约婉卡这个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农家女儿，不足以打动人心吗？是因为结婚三次都不美满，他再也不期求从婚姻中获得幸福吗？是他想孑然一身，不求任何女性

吗？显然，约婉卡是遵从他的旨意的。约婉卡命运的悲剧——铁托最后同她决裂，在他八十五岁高龄莫明其妙地同她分居了——难道根源就在于这种痛苦的开端吗？

事态奇怪的变化，导致了他们的结合。一九五一年三月底或四月初，铁托患了急性胆囊炎。医生和最高级官员纷纷赶到乌日采大街他的别墅里探望。铁托以前就患过胆囊炎——这次必须有人监督他的饮食，尤其不能让他吃他所喜爱的熏肉。这一次，医生发现胰腺感染了。这是可能致命的。外科医生拉弗里奇从卢布尔雅那乘飞机赶来，在铁托别墅的餐室里摆起了手术台。为了检查他的肝脏，每小时要验一次血。

兰科维奇和我偷偷溜进铁托的卧室。卡德尔也在那里。铁托躺在床上，痛得浑身直扭，时而喊叫，时而气喘。我们问了他一个在这种时候不得已而问的空洞无用的问题。他痛苦万状地顶了我们几句："不要问我任何事情！太可怕了！让我一人安静会儿！"约婉卡在楼梯上碰见了我。在忙乱中，谁也没有想到她。她含着眼泪问我："吉多同志，会出什么事？"

这是约婉卡第一次同一位政治局委员讲话。至少在我担任最高层领导职务期间，她是尊重和虚心对待这个领导集团的同志们的。我们已同医生们谈过，所以能够安慰她。当天晚些时候，同拉弗里奇大夫（他的信心使我们完全感到放心）商量了以后，我对约婉卡说，铁托的病已经控制住了。如果他的病情恶化，就要立即动手

术。当他身体好转之后，终归是要动手术的！他经不起这种病再次发作了。这就是所发生的情况。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九日，铁托在布莱德的一家医院里动了手术，那家医院是德国人为他们的伤员盖的，战后铁托把它接管了过来。

在患病期间，约婉卡对铁托的关怀和护理，从各方面来说都是不同寻常、无微不至的，而且加强了两人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对于铁托身边的那些人来说本来已经可以明显看出，现在变成公开的、自然的了。在动手术的头天夜晚，政治局委员们和医生们吃罢晚饭，在客厅里呆着聊天。铁托虽然有点担心动手术，但是似乎非常喜欢当时热烈而又不带政治色彩的气氛。约婉卡也在那里，第一次超出了充当护理这样一个虚假而又不自然的角色。她仍然显得克制、羞涩。谈话转到伟人和他们的私生活方面来了，拉弗里奇大夫或许意识到铁托和约婉卡之间的关系，故意说道："伟人的私生活不会对评价他们的历史作用产生任何影响。"我不同意拉弗里奇大夫的话，但是无论是我还是其他任何人，都没有表示反对他，他的话鼓励和宽慰了铁托和约婉卡。第二天，铁托成功地动了手术。手术后，他由约婉卡和一位修女护理，没有她们，本人也是共产党员的拉弗里奇大夫，就无法对这位共产党领袖动手术。

第二年，一九五二年新年伊始，铁托同约婉卡结了婚。结婚时，我对铁托说："你和她结婚，做得对。"

他回答说："是呀！你知道，她是一个很不错的人！"同年六月我和什特菲察结了婚，铁托问："那位同志是哪个地方的人？"我笑着说："扎戈尔耶的。我想从你的家乡挑一位新娘。"铁托也笑着说："你真行。"

在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对南斯拉夫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约婉卡第一次公开露面。她激动而又有些怯场，就象俄国小说中描写的首次参加舞会的少女一样。法国大使的夫人，一位极其媚人而又十分坦率的女士，在招待会上冲着我说："都在这里度蜜月啦。"这些细节之所以重要，仅仅是因为它体现了一九四八年以后高层领导人私生活的变化，以及同西方国家代表之间关系的变化。假若不是抛弃了列宁主义的教条，使我们的私生活有了新的自由，我真不能保证铁托会娶约婉卡，我能娶什特菲察作我的第二个妻子。

那时候，约婉卡和什特菲察日渐亲密，经常互相作伴。要不是她俩之间的友谊，我本来是不会了解约婉卡的。对于公众来说，约婉卡是一个未知数，因为他们只能从报纸上、电视上、游行检阅和官方的典礼仪式上了解她，她在这些场合，总是穿着皮大衣，浑身珠光宝气。她的举止是合乎礼仪的，脸上总是露着笑容，穿的衣服也总是很华丽的。

约婉卡很快就显得派头十足了——太爱笑，太爱打扮，太自命不凡，太过分，太过分了。但是，正是这个约婉卡，忠实信守了铁托本人的威望亦即铁托式的权力

的观念。她拜倒在这种威望和权力的观念下。她是一个忠贞不二的妻子，她自己也被使人眼花缭乱的权势冲昏了头脑，相信自己应当享受这样的权力。多数人，尤其是妇女，不喜欢甚至憎恨这个约婉卡，说她的闲话。据说有人因为说了她的闲话而坐了一、两年牢。人们发泄着妒忌和不满，他们不敢往铁托身上发泄的怨怒，就一股脑儿地往约婉卡身上发泄。由于她对铁托的忠诚，和她的头脑简单，她使自己很容易受到攻击。

然而，她既不蠢，也不坏。她聪明，思想有条理。同铁托结婚后，她上了一所特殊中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但是并不是因为老师害怕她的地位而给予她优异成绩的。她学习很用功。只是在公开场合，她才显得拘谨、不自在。她留心自己的外貌和别人对她的看法。她的农家出身，既不是有利条件，也不是不利条件。阶级出身已不再是一个问题。

在我还是领导人的时候，约婉卡并没有卷入政治纠纷，更没有参与决策。她的工作范围只是料理家务，照顾她的丈夫约瑟普。她主要考虑的是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舒舒服服。然而，铁托对她却是疾言厉色，冷嘲热讽，甚至当着别人的面也是如此。她一声不吭，低三下四地忍受下来了。

铁托的两个儿子不喜欢她，虽然她没有得罪他们。但是他们同铁托的关系也不好；他的大儿子扎尔科很狂妄，而米沙的嘴也够厉害的。约婉卡照料了她的两个妹

妹，帮助她们受到了教育，因而能够独立生活，但是她没有为她们谋求特权，而这本来是能够办到的。

约婉卡想要孩子，但是铁托不同意。大概他觉得养孩子费力不讨好，或者是他干脆不想承担更多的义务。约婉卡只得作出牺牲。

由于是被迫过着她本来无法获得，也没有为此作好思想准备的显赫一时的生活，约婉卡很快就拜倒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权势和声望之下。她和艺术家、记者、电影界人士交朋友。据说她曾建议以铁托甚至以她自己作为拍摄电影的专门题材。

不过，我并不相信她背着铁托参与了政治活动。当他们分居的消息宣布后，我曾试图说服外国记者，如果相信她进行了政治活动，那是荒谬的。可是，他们还是执意相信蜂起的谣传：约婉卡同塞尔维亚将军们密谋，她是亲苏分子，她操纵最高级官员的任免。据说她对她的贫瘠的家乡利卡被忽视而表示不快，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克罗地亚人（天主教徒）和塞尔维亚人（东正教徒）之间互相仇视，使克罗地亚境内的利卡这个塞尔维亚人居住的地区吃了苦头。人们说："约婉卡身上的塞尔维亚血液觉醒了。"

我认为，使约婉卡觉醒的，是她那受过创伤和打击的自尊心。使她觉醒的，极其可能是一件小事。她认识到，她牺牲了自己的青春，牺牲了自己的生活，原来是毫无意义的，她还认识到，别人背叛了她自己的信念，她所信仰的神明原来是泥足巨人。约婉卡不由自主地变

成了一个被遗弃的人。突然间，每个人都对她表示同情，唯有铁托身边的那群高参幕僚例外，他们对她的失宠幸灾乐祸。谣言说，铁托在晚年尽量回避贝尔格莱德，尤其是乌日采大街，免得见到约婉卡。

她现在在哪里？她在干什么？她生活得怎么样？有没有严加保守的秘密从这座封建宫廷里泄露出来？铁托的两个儿子守在他的病榻旁边。这两个儿子，他平时很少见到，他们从不干涉他的工作和生活。铁托临终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孤独。他身边只有扎尔科和米沙。

扎尔科的相貌和性格很象他，但扎尔科的放纵无度却使他痛苦万分。扎尔科终于在家庭生活中找到了归宿。米沙一心埋头于自己的工作，只跟自己圈子里的人来往。扎尔科和米沙——毕竟是铁托的亲骨肉。在铁托弥留之际约婉卡守在床边的说法，是不足凭信的。

铁托躺在床上，奄奄一息，靠机器维持生命，周围是一群同他没有个人关系的工作人员，陪伴他的是一批阿谀奉承之徒和他自己安排的领导人物。著名的战时领导人和党的领导人，下台的下台了，死的死了，放逐的放逐了，失宠的失宠了——确确实实地失宠了，完全是一派封建宫廷的景象。当他把握不定和孤独一身的时候，是否知道和意识到，他所缔造的一切都面临着威胁？或许他在自我安慰，有些东西总会留传下来的。甚至现在他可能会说，他们正在举行马拉松赛跑来庆祝我的生日，是的，这将留传下去，这使我感到幸福。

十二

"你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一九五四年一月初，我们在白宫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铁托这样对我说。卡德尔和兰科维奇也在场。是我给铁托写信，要求这次会见的，这一半是听从了朋友们的劝告，一半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但是，事实证明我缺乏远见，不善于玩弄政治手腕，会晤的结果出乎我的意料。这是几天之后就要在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宣布对我的判决的前奏：我奉命提出辞呈，辞去国民议会主席的职务，这是一个间接的但却是明确的威胁：我得"咎由自取"。

"你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即使是在今天，我仍然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但是这句话却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中。如果我的记忆不出差错的话，铁托是在兰科维奇说我没有接受党改名为共产主义者联盟这一决定时讲这句话的。可我是接受了这一决定的！或者铁托是在卡德尔粗暴地说我已经在最坏的改良主义——爱德华·伯恩施坦的改良主义的道路上滑得太远的时候讲这句话的。我猜铁托的意思是说，当我脑子里形成了一种思想时，我就不放弃它，是说我不知道怎样让步，或者是说我不会让步。

铁托的话掩盖了我同他决裂的根源，但是同时又对这一决裂作了解释，他和我是迥然不同的人，只是共同的信念才能把我们连结在一起。在我们长期共事期间，他和我常常发生意见分歧，但是从来不是为了重大政治问题。我们之间的磨擦，常常是因为做法上的意见分歧而动了肝火。到我下台时为止，我写的有关铁托的东西，除了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他写了一本铁托的传记）以外，比其他任何作家都多。在我们最后一次会面的时候，我向铁托讲了这一情况，还是出于感情用事，希望缓和一下打击。然而，事实仍然是我不能改变我的观点。我是本着当时盛行的个人迷信的精神去写铁托的，但也是出于我的信念。同斯大林发生对抗后，我认为铁托是推动民主、提倡民主的力量。其实，与其说我真正相信铁托是这么做的，不如说我希望他这么做。

在我同铁托的争吵中，作风、方法和行动上的分歧，比性格上的分歧起更多的作用。同铁托一样，我毫不动摇地维护我所缔造的东西。在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我对他说："我懂了。你有所缔造，现在你要保卫它。而我仅仅是刚开始。但是我不理解那两个人。"我指的是卡德尔和兰科维奇。铁托的态度缓和了，但只是一会儿，接着又继续同我算帐。

从前铁托和我之间的小争吵，没有造成什么后果，因为它们不是政治上的争吵。我热爱铁托、尊敬铁托。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更加热爱和尊敬他。我记得我从来

没有不忠于他。每当我有一个不好的想法，我总是尽力把它压下去，抛弃它，老老实实地干工作，执行手头的任务。铁托从来没有恨过我，从来没有出卖过我——我们在政治上分手之后也还是如此。我们唯一的也是最后一次政治上的争吵，丝毫也不是个人之间的争执，当然，如果你不能把思想和持有这种思想的人区分开来，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和铁托之间对抗的根源，在于我们的性格，同样也在于我们的作风。铁托认为，思想和行动，同个人的抱负和威信是不可分割的。而我认为，我只注重思想和行动，因此，我对威信是无所谓的，甚至还觉得它烦人。只要我相信铁托的活动，他的独断专行的作风就用不着多加指摘。当然，我并不总是赞成他的作风的，我也可能唠唠叨叨地骂过几句，但是我终究按照他的话去做，甚至在制定党的政策上发挥了主观能动性。

自从我们取得了胜利，我们掌了权，我们就开始分道扬镳了。在我的思想上产生了一点怀疑：这不是我们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但是这也许是我们未来的开始。我还感到不满，对自己不满，对自己的抱负、前景不满，这种不满犹如云雾。时而密布，时而消散。假如不是斯大林主义那场风暴刮得天翻地覆，露出它那副压迫和征服的狰狞面目，很可能我会回过头来从事写作，而对现实生活听之任之。

如果在我们之间的对抗爆发前六个月有人问我，能

不能想到有一种力量可能把我同铁托、卡德尔和兰科维奇分开，我会说，我想不到。我会说，即使死亡也不能把我们分开。

南斯拉夫领导人，其中首先是铁托，曾预言：斯大林之死将在苏联领导集团中引起权力之争，对南斯拉夫侵略的威胁将因此而消失。这番预言应验了。铁托立即抓住这一形势，乘机阻止民主化的进程，首先是思想领域内的民主化进程。为此，他一劳永逸地把中央委员会和党完全置于他个人的控制之下，搞垮了寡头政治的那些执政者，特别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寡头政治执政者，那些异端学说倡导者的作用。

一九五三年夏天，在布里俄尼岛召开的二中全会上，决定性时刻来到了。在那次全会上，铁托结束了“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换句话说，他结束了争取民主改革的斗争。在那次秘密全会之前，卡德尔曾对我说，铁托预料在我们同苏联的关系中可能出现变化。可能发生这种变化，使我感到不舒服，尽管当时我说不出究竟是什么原因。

在一九五三年秋末之前，我还没有意识到我们之间的不和发展得多么快。我仍然狂热地公开提出实行改革的建议。铁托及其布里俄尼岛上的一帮人开始一点一点地反对。卡德尔显然态度审慎，有保留。

从一九四九年底到一九五三年夏季，南斯拉夫党的领导一直处在从精神上摆脱苏联模式和教义束缚的痛苦

之中。不仅党的大多数理论家——卡德尔、巴卡里奇、皮雅杰、我本人以及其他人感到可以无拘无束地批判苏联的制度，而且我们还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评价南斯拉夫的现实情况上。这一时期是大胆思考，精神自由的时期，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运动再也不会经历这样的时期了。权力结构、秘密警察的控制以及党对政治的垄断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但是胡作非为、违法乱纪的行为受到了限制，死抠教条的做法也有了松动。

我自己过高地估计了民主进程的深度和广度。我以为既然我们的领导人意识到了苏联制度的非社会主义性质，意识到了我们自己比较温和的、模仿苏联的制度的非社会主义性质，那么他们就会采取相应的行动。我的这一观点并非突然产生的，也不是脱离当时领导集团中普遍存在的情绪而单独冒出来的。铁托也估计了这种情绪，但是他审慎行事，每当事态出现理论上的转折时，他向来都采取这种态度。兰科维奇是对实行民主化不悦的唯一重要领导人。他之所以同意实行民主化并付诸实施，并非出于信念，而主要因为他是一位遵守纪律的党员。

有一次，我记得是在一九五二年，铁托象刚刚想起了什么重要事情似的，大叫起来："我们不要多党制。我们要多派制！"这不过说明我们与苏联对抗造成的气氛。铁托在一九五三年秋召开的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对苏联制度的批判以及对我们自己的官僚主义的估

价更进了一步。后来，在七十年代，在官僚主义恢复原样时期，铁托竟说，他不赞同那次代表大会！一九五三年春，铁托对于他同瑞典社会党人的谈话有深刻印象（瑞典社会党人应邀出席了我们的社会主义联盟代表大会），他对我说："我们应当尽快加入社会党国际。"既然铁托有这种想法，那么象巴卡里奇和卡德尔这样的党内自由派分子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一九五四年一月初，当政治局决定在定于一月十八日召开的三中全会上讨论米洛万·吉拉斯同志的问题时，铁托并没有在贝尔格莱德。执行委员会实际上没有开会。卡德尔和兰科维奇主要是通过电话交换意见的。当然命令是铁托下的。谁也没有通知我召开全会的事。我是从报上知道的。

当时，我同卡德尔和兰科维奇常常见面。我首先从兰科维奇身上感到有一种疏远之感。有一个时期，我每个星期天都为《战斗报》写文章，论述我认为对民主化，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这些文章成了召开三中全会的理由，成了随之而来给我定罪的依据。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底的一天下午，我去看兰科维奇。我们曾亲密地共同经历了我们的生活——战前的地下斗争，战争时期和抗苏斗争——的各个关键阶段。这次，兰科维奇也是热情、友好的。他还送给我一件礼物，一支猎枪。但是，在交谈中，他沉默寡言，给人一种不

祥之感。虽然我很喜欢那支枪，但是我没有收下。我想，既然我们各走各的路，我收下这支枪又有什么意思呢？我直截了当地问兰科维奇，对我在《战斗报》上发表的那些文章有什么想法，他也直截了当地回答我说："我希望我永远不必为哲学问题伤脑筋，但是让我告诉你，你在《战斗报》上写的文章对党是有害的。"他的回答并没有使我感到惊讶。他过去就表明，他是反对可能危害党的铁板一块的结构的改革的。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态度是光明磊落的，他从来也没有对我采取过任何背信弃义的行动。

我同卡德尔的会面却使我大吃一惊。我深信我们俩人都是主张实行民主的。的确，他是主张实行民主的，平心而论，一直到他多少察觉铁托持反对态度为止，他于是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告发者，他提醒铁托谨防危险，并设法要铁托进行干预。不仅如此，卡德尔作为民主化的倡导者曾经显然压倒了我，如果不是在作风和独创性方面，那么肯定凭他作为一位理论家所享有的名声以及他身居更负责的地位而压倒了我。然而，一九五二年底，特别是一九五三年，我相信由于我的主张范围广，思想新，而超过了他。卡德尔感到他作为党的无可争辩的理论家的作用受到了威胁，特别是他明白，在一个铁板一块的统治集团内，如果他的作用逐渐削弱，那就自然而然意味着他的权威逐渐削弱。我可以肯定，这一点使得卡德尔下了决心。当我说我和他意见一致时，

卡德尔反驳说："不，我们意见不一致！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你想要改变整个制度！"我成了孤家寡人了。孤家寡人也罢，我打定了主意。

一月初的一天下午，保安部门的几个特工人员尾随我直到基诺特卡电影院门前。我的妻子什特菲察以为他们要逮捕我。这件事本身就说明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气氛。但是，我相信他们不是来逮捕我的。他们告诉我，要我立即去向卡德尔汇报，我去了。在卡德尔那里，没有进行任何讨论，没有作任何说服工作，也没有妥协。兰科维奇也在场，他又是沉默不语，不过我要说，他这一次的态度不仅很坚决，而且还多少有点怒气。他们没有告诉我将召开中央全会。谈话模棱两可，而且晦涩难懂。他们说，老大很生气，我的问题很严重，事情不能象原来那样继续下去。

卡德尔说："实质上，这是修正主义，跟伯恩斯坦是一路货色。"我回答说："我除了从列宁那里了解到伯恩斯坦一点情况以外，我没有读过伯恩斯坦的书。"卡德尔说："我读过伯恩斯坦的书。你看，我有一本！"最后，我问他现在干什么，是否在写文章，他对着我晃了晃写了半页的纸，笑着回答说："在写。"我揣摩他在写攻击我的什么材料，写向三中全会作的报告。但是，关于三中全会或者报告的事，他们只字未对我讲！兰科维奇走开了，去处理别的事了。我和卡德尔站在大厅里。难道他怀疑有人对他的书房进行窃听？卡

德尔作出一副诚恳的，无可奈何的样子说："在我的一生中从来没有比这更困难的了。"他摊开两手，似乎是说，有什么办法呢？然后他转身上楼去了。两三个月以前，他对我写的几篇评论中的一篇曾经激动地叫起来："也许我们将逐步地成为一个反对派……"接着他又说："至于说到我，最好是这个党"——他的意思是指共产主义者联盟——"不存在"。

卡德尔这个人就是善于随机应变，机灵，忍让，讲客套，狡诈。卡德尔暗地里渴求民主的东西，甚至抱有这些民主的思想，但是他没有胆量为民主的思想去奋斗，去牺牲，为什么他不能为民主的思想去牺牲呢？并不是因为他贪图安逸！也许他是贪图权势。这就是列宁主义的实用主义，不受偏见左右的最有效的实用主义。卡德尔实行的是讲究实际的理论，即没有组织机构，没有权力，理想只不过是空想而已。他徘徊于专横独断与渴望自由的梦想之间。也许由于卡德尔是一个明白事理，讲求实际的斯洛文尼亚人，因此他不可能头脑发热。可以肯定，他不能让自己被一个发狂的黑山人弄得晕头转向。

铁托对于同我的决裂并不感到轻松。我没有必要来证明这一点。他非常精明，不会不懂得他正处于向完全的专制统治深刻转变的危急关头。这在三中全会期间必然变得特别明显，因为在三中全会上大肆宣扬我的偏差，引起了西方报刊和国内舆论的反响，所以情况就尤

其是这样了。在我们最后一次会面时，铁托说：“这是自一九四八年同共产党情报局对抗以来最重要的事件。看看西方报刊对这件事的报道吧！”于是我到南通社走了一趟，离开的时候真是惊喜参半，我高兴的是我的事引起了这么大的注意，我害怕的则是竟然看到资产阶级和反动派争先恐后地帮我说话。很明显，当时我毕竟是一个共产党人，一个理想主义者。

铁托感到不快和表示反对的最初消息，是通过佩科·达普切维奇将军传到我的耳朵里的。我同达普切维奇是知交。他正好在一九五四年新年前夕因公事拜访了铁托，铁托对我的文章发表了不赞同的看法。达普切维奇没有完全理解铁托这种反应的含意。铁托是闻名的爱突然发怒的人。但是，我不抱任何幻想。我知道我处于真空之中。比较保守的同志回避我，向我作一些暗示。

同卡德尔和兰科维奇的会面并不完全使我感到意外。但是召开三中全会不让我知道，却使我困惑。我本来希望，如果这场争论公开化，是不会使用尖酸刻薄的语言，不会进行那种由于与敌人阵营站在一起而通常出现的指责。正因为如此，我向卡德尔和兰科维奇建议，在中央委员会内解决这个问题，不要公诸于众。当然有一个条件：得让我为我的立场辩护。他们不理睬我的建议以及我的意见，这些建议和意见归结起来就是：我最后退出执行委员会，而留在中央委员会内，这样我可以继续公开地——以温和的但不是官方赞同的方式阐述我

的观点。

我的建议没有得到答复。无论是铁托，还是同铁托一起把持大权的列宁主义保守派都不准备考虑我的建议。对权力的垄断必然要对思想进行垄断。铁托和那帮人的反应也不能不是坚决的、全面的谴责。他们的垄断地位受到了威胁。这些人死心眼，而他们的方法是可怕的，毫不妥协的。

尽管铁托对这帮人是同情的，但是他的心情同这些人的心情并不完全一样。虽然他拥有绝对的权力，但是他不肯让人给贴上独裁者的标签，特别是贴上斯大林式的独裁者的标签。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地知道，我既不是敌人，也不是叛徒。何况，他更知道，我并没有组织什么派别。在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铁托承认："没有组织任何派别。"的确，即便我能够这么做，我也不想建立任何集团或派别。我是想促进自由交流思想，如果这种交流扩大到共产主义者联盟内，那将会对共盟的决定以及向民主社会前进的运动产生影响。

我们的冲突除了造成政治损失以外，我相信，铁托在心理上是很难受的，尤其是在政治惩罚已变得很明显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在我们的最后一次会面时，我要求他吩咐部下给我一杯咖啡，因为我一夜未睡觉，他这么做了，而且说了一句："别人也没有睡觉！"他看上去神情紧张，精疲力竭，卡德尔和兰科维奇也一样。四驾马车——铁托、卡德尔、兰科维奇和我——曾带领党经

历了多次狂风暴雨，使党走上独立的道路，而现在分道扬镳了。党的团结和对党的信任也在瓦解。

甚至在三中全会对我进行指控和谴责之后，铁托仍然感到难过。他同外国记者谈话时喜欢回顾我们之间的友情，并对事情弄到这步田地表示遗憾。但是他强调指出，我在政治上已死亡了："政治上的死亡是最可怕的了。"当我从报纸上看到这句话时，我身上的遗传因子，我这个人身上的黑山血统遗传因子发作了："我决不会完蛋。只要我还活着，就不会完蛋。"

一旦铁托打定主意，他就不会犹豫不决。在三中全会前夕，他一个一个地找那些据了解摇摆不定的中央委员，或者在观点上同我接近的中央委员谈话，通过呼吁维护党的团结，维护国家的利益，婉转而明确地暗示他得到军队和秘密警察的支持，想方设法把这些中央委员拉到了他那一边，团结得几乎象一个人一样。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七日，在我作了心烦意乱的自我批评，我的前妻米特拉·米特罗维奇以及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表示了审慎的支持之后，三中全会作出了裁决。但是我当时还没有正式被开除出党。铁托明白，如果此时开除我，会在外国报界引起不利反应，会被说成是跟苏联的做法差不多。过了两个月，我退党了。

一九五四年二月，三中全会之后不久，德迪耶尔到我在德迪涅的别墅来看我。（那时还没有把我赶出那幢别墅。）已是晚上八点多钟了。我们在花园里散步，尽

管天气很冷。我们谈了大约两小时。他的谈话比较含糊，但是他对我说，他同兰科维奇谈了七次。他没有提他们谈话的实质内容。从铁托写给安奈林·比万的信（发表在迈克尔·富特所著的比万传记里），可以明显地看出，当时铁托只认为我是持不同政见者，而没有说德迪耶尔是持不同政见者。在那天晚上，德迪耶尔有三、四次着重对我说："他们"——他指的是党的领导集团——"会同意跟你谈谈，如果你要求见面的话。"但是，他理解我对此的反应。我在经历了三中全会那种场面之后，党发动了一场运动来攻击我，我是不会要求再这样见面的。

我在政治上坚持自己的权利，在感情上也毫不示弱。同南斯拉夫领导，同这么多亲密的朋友，首先是同铁托、卡德尔和兰科维奇决裂这一点，对于我的打击比思想上的任何冲突给我的打击要大得多。但是，三中全会上对我的侮辱，对我采取的卑劣手法，诽谤中伤，把我们的友谊毁了。我感到完全被疏远了。在三中全会上，铁托指责我没有象基德里奇同志那样接受批评。对基德里奇，他患病末期的可怕情景以及他那给人印象深刻的葬礼，我仍然记忆犹新。我为什么要象基德里奇那样接受批评呢？

我知道，他们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在我的思想上，在我的心里，我明白，我正在碰到的不幸就是共产主义运动内所有共产党叛逆者已遭到的不幸：所有的叛

逆者都遭到诬陷，都表示悔过，都同意自我毁灭，只有这样才能继续当共产党员。

直到三中全会闭幕了相当长时间之后，也许是过了一个星期，我才能整理我的思想。睡觉帮了忙。我终于明白了：我不仅连连失败——这并不十分重要，因为我已经被击败了——而且我还会轻易地陷入精神上的衰退，陷入精神崩溃，如果我不脱离共产主义这种意识形态的话，铁托、卡德尔和兰科维奇将会总是强迫我对党、对共产主义表示忠诚。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这是唯一的出路！在三中全会上，在我作了自我批评以后，铁托说过：“我们要看看这有多少是真的。”

正因为如此，我不可能对德迪耶尔的建议作出任何别的反应。出于同样的原因，一年以后，当德迪耶尔建议我整理自己的思想，向领导作系统的汇报时，我除了拒绝没有别的选择。我说：“如果这么做的话，只会是批判共产主义。”此时，他沉默不语，以惊愕的眼光看着我。

三中全会以后，我陷入精神和思想危机的痛苦之中，这种危机是我的家庭和我的故乡黑山的苦难所遗留下来的，这时又有一番深刻的但是尚说不清的感受。我意识到，在这以前，我一直在同犹豫不决作斗争，一直抱有幻想，对共盟的领导人，对他们的思想和精神价值的统一性，对他们的友谊和他们的忠诚抱有幻想。我的主要对手，虽然不是我的唯一对手，是铁托。我再也不

可能指望他的宽恕，或者他的谅解。同志间的友爱和共产主义，真挚和忠诚，平等和自由全都完蛋了。

既然斯大林去世了，我猜测铁托会使南苏两国关系正常化。果然，我在一九五三年秋目睹了这件事的发生。苏联代办指出，象我的《结束的开始》这样的文章很难有助于两国关系正常化。最高领导层的人也没有对此加以明确否认。在同年秋天的一次选举前的讲话中，我间接地对有关两国关系正常化，包括南苏两党重新建立合作关系的设想提出了异议。在我看来，同斯大林决裂就意味着同苏联制度决裂。

南苏关系在我与铁托和其他领导人决裂这件事上是一个次要问题。但是即便我仍然留在领导集团内，我也是不会同意南苏两党进行合作的。我们两国政府关系正常化是有益的，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两党之间的合作对于南斯拉夫却是有害的，破坏性的。

苏联领导集团听到对我采取行动的消息幸灾乐祸，欢喜若狂。双方作出的和解姿态越来越频繁。南斯拉夫领导集团为了批我的修正主义，也拒绝了我认为苏联制度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一九五五年，赫鲁晓夫访问贝尔格莱德时，以他那特有的愚蠢态度表明，南斯拉夫人消灭我这个敌人为同苏联人恢复友好关系铺平了道路："你们干掉了吉拉斯，我们干掉了贝利亚。"南斯拉夫驻莫斯科大使韦利科·米丘诺维奇在他的回忆录《莫斯

科岁月》中，描述了在一九五六年匈牙利起义期间苏联领导人因我被捕向他表示祝贺的情景。

铁托一定想到，同我冲突会得到莫斯科的赞同，但是，这是次要的，无关紧要的考虑。不管同莫斯科的关系如何，都会对我进行清算。甚至在斯大林死之前，铁托就公开宣布反对党内出现任何松弛，反对在意识形态统一方面出现任何裂口。如果说同苏联的和解在我同党的这场冲突中是一个次要的问题，那么，无庸置疑，随之而来对我的监禁则是由于南斯拉夫领导决心要改善同苏联政府的关系。我两度被判刑，总共坐了九年牢。可以肯定，他们怀有别的动机：恐吓党的那些有野心的、教条主义的和自由派的领导人；不让任何反对派合法化。但是同苏联的关系是有影响的。仅仅在几年前还非常勇敢地反抗苏联的攻击的铁托，似乎仍然被一根致命的，难以解开的绳索捆住了。

我受过五次审讯，一次是在南斯拉夫王国时期，四次是在铁托统治时期，如果不把三中全会那次包括在内的话。三中全会发生的事是一次独特的放逐行动。有一次，一九五六年那次，我被判处三年徒刑，是根据我发表的支持匈牙利起义的一次讲话和一篇小品文定的罪。另一次，一九六二年那次，我被判处五年徒刑，是根据我写的《同斯大林的谈话》这本书定的罪，这本书是在安德烈·葛罗米柯访问南斯拉夫前夕，在同赫鲁晓夫建立兄弟友谊的阶段出版的。不可否认，两次监禁都是因

为南斯拉夫领导人想同苏联人建立良好关系，特别是因为给我定的罪名是进行“敌对宣传”和“泄露国家机密”。这简直是荒唐的作法，荒唐的政治！为了不惹怒一个外国政府，竟审讯一个同志，审讯一个为不依赖于这个外国政府而进行过坚决斗争的同志！当我被关在狱中的时候，这种荒唐的做法，这种同志关系的颠倒不时使我痛苦，但是也提醒和增强了我的自我意识。

我非叛逆不可吗？我犯了错误吗？还是铁托犯了错误？只有历史会作出回答。在我们决裂之前，我从来没有幻想或者希望我有可能夺权，决裂之后肯定更不会有这种想法了。我不是说我有时不渴望有权。在一九五三年一月初，我同卡德尔的那次会晤中，我说，我没有实权，我这么说并非偶然。我的这番话有双层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没有决定权，我在权力机构中没有实质性影响。卡德尔以讥讽的口吻回答说：“不，你有权，多大的权呀！”

经过这些年之后，不管我如何经常分析我的动机，我仍然得出同样的结论：我一心想着某些思想和某些现实，在不让自己精神崩溃的情况下，我是不可能放弃这些想法的，即便我想这么做也不行。这些思想与我渴望写出、创作出我自己的某种东西有关。不仅如此，这些思想和这种迫切愿望是不可分的，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思想怎么可能有所创造？如果思想不加以更新，不加以阐述，如何能存在下去？我相信，一开始铁托就感到

我是一个决不屈服的对手。他也意识到，我产生了某种不可抗拒的、影响深远的而无法甩掉的想法。铁托是一个直觉很强的人。他对于我的不忠所表现出来的双重态度，狂怒和极度痛苦，我是不能作别的解释的。最后，由于铁板一块的权力结构松散了，而且考虑到西方对我的支持，铁托修改了他的立场，尽管只要一提到我的名字，他就压制不住他的盛怒。那么，我自己又怎么样呢？由于我一心想着的是一些主张，因此，我不可能采取秘密手段，或者玩弄权术，虽然这两者对我都有诱惑力。

情况就是这样。我缺乏政治感。我生来就没有玩弄狡猾的、影响逐渐深远的政治手腕的能耐。因此我经常受到国内外的批评。然而，我深信，应当有人首先进行批判，提出思想，这个人应当是我，因为没有一个更负责任、更有才能的人企图这么做。我的思想说真的并不全是新颖的，甚至对于南斯拉夫来说也不全是新颖的。我认为，我只不过是对来自任何地方的事物发表意见而已。不讲原则和搞阴谋诡计是同我的思想实质、同我的感情易冲动的性格背道而驰的。每当我想到这样的手腕时，我就觉得它们似乎是渺茫的，行不通的。我活动的圈子很狭窄，在这个圈子里的都是彼此亲密无间的同志，一个无意识的手势或者说话声音的细微差别就能使彼此心领神会。这种结合靠的是共同浴血战斗和友谊，而不是靠思想。不仅如此，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比苏联共

产党人坦率，讲友谊，通情达理。在这种气氛中，说假话不仅是不诚实的，而且也是行不通的。

我只能凭良心办事。否则就只好隐瞒自己的观点，抛弃我的信念，在自己不再相信的一位领袖的令人窒息的、没有成效的办事班子中腐烂下去，而这位领袖把自己说成是理想和国家的化身，而且使理想和国家服从于他个人的权力和荣耀。一些善于玩弄手腕，比我更爱权的人仍然留在中央委员会里。他们做出了什么成就呢？

我是根据我的见解、我的能力并凭我的良心作出我的选择的。我相信我做得对，尽管我不相信在我有生之年我会取得胜利。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就是差别之所在。铁托是胜利者。而铁托是不为战败者操心的。

十三

评价过去要比预测未来容易一些。真是这样吗？新的事实要求作出新的评价。因此，我简直不能对铁托下最后的定论。我做不到无偏见。我的一生和他的一生交织在一起。但是叙述他的故事令人神往，因为这有无穷尽的可能性，因为它增长知识，因为它可以用另外的方式提出假设，因为它把不可改变的过去同变化无常的现在混合在一起。

铁托清楚地懂得，他不会留下一个接班人。说实在的，他确保没有任何一个接班人。他十分重视他自己和他的工作，以致在他晚年下令修改宪法，实行集体领导，保证在他身后接替的任何人不能掌握象他所掌握的那样的权力，保证没有任何人能够使用这样的权力在他死后来败坏他的声誉。为了使别人不能起到他那样的作用，铁托竭力使自己名垂史册。同时他认识到，政治形式不是固定不变的。他所提供的一种形式将在一定时期内确保他自己和他的成就不致被毁掉。

在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庆祝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成立十周年的仪式上，我坐在铁托的右边。就在举行庆祝活动之前不久，卡德尔提到，我们没有准备好在这个场合颂扬铁托一番。我们讨论了在这个场合把“元帅印”公诸于众是否合适。这个印章是雕刻家阿夫古斯廷契奇在铁托的监督下设计的。我曾建议把这个印章作为合法的象征，由一个总统传给另一个总统。但是当我向铁托提到此事时，他已经对我的修正主义的文章感到恼火，就怒气冲冲地回答说，“噢，当然，这样，一些叫化子就可以炫耀一番了。”当然，这个印章可能落入一些“叫化子”的手里，但是那个叫化子将是南斯拉夫的总统。铁托要让他和同他有关的一切东西都是无与伦比，无法超越的。他相信，只有历史的光辉才会留在人民的记忆中。

铁托原先没有抛弃他最高级的助手，因为他担心他

们会篡夺他的位置，或者贬损他的光辉。但是他却在巩固他的绝对权力的过程中抛弃了他们。只有卡德尔在政治上保存下来了，可是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看来他也受到冷遇了。他坚持下来直至去世，他附和铁托，适应铁托的集体领导的主张，在这样的领导中，卡德尔自己的作用和别人的没有任何差别。

一些人从革命中获得他们的声誉和权力，从一开始，铁托的绝对权力就得到他们的支持。权力是铁托的遗产。然而，在一党制底下，权力既不是持久的，也不是普遍有效的。我不主张不改变形式，我更不认为权力发生作用是完全建立在绝对权力基础上的。但是即使不是在那么动乱的时代，而且南斯拉夫也不是在巴尔干，存在好幻想的坚强领导人以及稳定的制度，这于南斯拉夫是有利的。集体领导是和铁托创立和行使的权力相矛盾的。他的集体领导将由铁托主义的共产党人组成，他们象铁托一样，对权力的观念是非集体的。这种形式的领导是矛盾的、派生的。在斯大林死后，作为对斯大林恐怖统治的一种反应，在苏联第一次实行了这种领导，一直到一个寡头政治的执政者夺取权力为止。这个人就是赫鲁晓夫。

南斯拉夫既没有苏联的内部和外部的稳定，也没有强大的单一的统治阶级。南斯拉夫不是一个大国，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强国或世界性帝国。铁托的南斯拉夫的稳定来源于铁托个人的地位稳定和独裁。今天在南斯

拉夫不存在可以类比的人物。政权的结构是以平等为基础，以各共和国平等参加这个政权为基础的。铁托靠他的专断的优势和权威保证了和谐。现在，只要有最微小的分歧，就可能引起很大的动乱，这当然是于苏联有利的。

铁托的成就很可能在最脆弱的部分受到威胁，那就是在意识形态上实行垄断的权威。因此，南斯拉夫的独立也将受到威胁。

但是，预言未来超出了本书的范围。让我们仔细看看铁托留下的现实，人们将把这些现实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南斯拉夫共产主义和它的领袖铁托的第一个重要成就是革命。这是以后一切成就的源泉，其中包括最重要的一项成就，即一九四八年同莫斯科决裂，这是一个国际范围内的事件。它标志着世界共产主义开始瓦解，分裂成为民族国家和民族党。

当然，有人反对这场革命本身，把它看作是祸害和倒退。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反对它，因为它分割并且贬低了塞尔维亚思想；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反对它，因为它使他们的国家处于从属地位；民主主义者反对它，因为它破坏了公民自由权。但是这场革命是生活中的现实，就象跟着发生的改变一样：各民族享受平等的行政权利和文化权利以及新的社会和经济关系。这场革命并没有完全解决民族问题。这个问题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因为每个民族都有不同的内部结构和不同的愿

望。但是这场革命的确使不同民族主义国家在一个联邦共同体内开始发展。这场革命也没有完全解决社会问题。要完全解决问题也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样平均使用力量会使社会的生命力耗用殆尽，宣告社会停滞不前。新的社会关系产生了新的统治阶级。

铁托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应当为他们没有做的事情而大受赞扬。虽然他们倾向于全体南斯拉夫人在意识形态上和感情上的结合——铁托特别喜爱的一个口号是“友爱和团结！”——但是他们并不禁止在民族基础上肯定国家和文化的特点。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在铁托领导下，工业革命得到很大的发展。这个革命开始于奥地利统治下的北部地区。南斯拉夫和苏联不同，它没有全部消灭非社会主义的形式，排除外国的参与，尽管有最先进的列宁主义的教导，因为这样做，一个内部薄弱的南斯拉夫就会受到外部的压力。

独立，同莫斯科决裂，无可争辩地是同铁托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最大的成就。南斯拉夫独立的根基在于革命的力量。这一独立最充分地表现在制定并实行一种独特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同不结盟国家团结的政策。

我们讲到的这些遗产，不管是哪一项，我们都将发现是不全面和前后矛盾的。国家经济不仅由于世界经济危机而受损害，而且由于内部的结构危机而受损害，而在目前的社会和政治的情况下，这个结构危机是解决不了的。生产率很低；所有制不起作用；存在意识形态上

的偏见，行政干部就是依据这种偏见挑选的；劳动力输出过多，现在由于西方国家减少需求，这一输出的速度正在减慢下来；失业率在欧洲是最高的，超过了百分之十二；工厂依赖进口的原料和半成品；债务过分沉重，贸易赤字过大。官员们自己提请人们注意共产主义者联盟缺乏活动能力，尽管有一百万党员，尽管共产主义者联盟多年来进行了深入的思想灌输，从小学到大学，从工厂工人到科学院的学者都是如此。

南斯拉夫社会是多元的、有阶层的。只有党的最高层是铁板一块的。我已经谈了党把自治看作是万应灵药这种乌托邦的思想态度。至于不结盟政策，指出下面的事实就足够了：在所有重要危机中（对阿富汗的占领、苏联和古巴的干涉、不结盟国家之间的战争等等），“第三世界”不起作用，而且意见不一。亲苏国家属于不结盟运动中最活跃的国家之列。尽管不结盟运动的领导人（大都是独裁者）称它是人类的良知，但是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国在涉及力量和金钱的时候就显得差劲了，更谈不上良知了。不结盟国家处于混乱之中。南斯拉夫必须寻找它自己的位置，结交它自己的朋友，并且设法维护它的政治独立、南斯拉夫人民的特性和自由。

铁托肩负起列宁主义政党、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在一个遭受战争和内乱破坏的落后国家里行使专制权力的沉重负担，能否比当年有更多的作为或者有所作为？这个问题是不答自明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可能有更

多的作为的。

铁托有无可能找到某些形式，解放某些力量，使之产生更好的结果呢？这就产生了一个根本的问题：这样的形式是否存在？这样的力量是否存在？换句话说，铁托和铁托的党是否窒息了这样的形式和这样的力量？如果是这样，他们是否得加以压制？这里的问题是在铁托统治下的自由问题——不是理论上的自由，也不是符合某种模式的自由，而是真正的自由，是从每个民族的生命力产生的自由。联系这一点来看，铁托的成就是微不足道的，对于南斯拉夫的精神和物质前景来说是倒退的和致命的。

谁也不会否认，在南斯拉夫，一个普通人只要不参与政治，他的私生活是不会遭到非法待遇的。但是，如果政治涉及每个人和每件事，又有谁不卷入政治呢？只要他领受微薄的薪金，从生物学和精神上说，他能够生存下去。在东欧大多数国家里，这种情况大抵如此。至于自由，匈牙利和波兰与南斯拉夫没有多大不同。南斯拉夫的富裕和南斯拉夫的自由与其说来自铁托的自由主义——铁托从来不代表党内的自由派——不如说来自这个国家的历史地位和它的自然资源。在南斯拉夫，生活在大多数方面无疑比东欧其他国家好，比较过得去。然而，如果执政党内有较多的言论自由，情形可能会更好些。而这种自由的希望是渺茫的。政权、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垄断性质压制了其他力量。我在这里将只讨论最重

要的力量。

民主反对派是以民主党领导人米兰·格罗尔为首的。这个党的党员大都是塞尔维亚人。除了共产党人以外，战前南斯拉夫的所有政党都是各民族的——塞尔维亚的、克罗地亚的、斯洛文尼亚的。这些党在战争中瓦解了。但是，除了民族阵线团体的支部以外，这些党的一些支部把它们的自治权交给了共产党人，并且放弃了独立的组织，它们承认革命的变革，而且愿意组织一个忠诚的合法反对党。共产党的领导人不仅拒绝接受这一选择，而且采取可怕的迫害和折磨的办法来消除成立任何合法反对党的可能性。

在这件事情上，我在宣传方面起了显著的作用，我是主动这样做的，这完全是因为有发生反革命的危险，虽然反革命基本上已被摧毁了，虽然军队、警察和宣传——事实上全部权力——牢牢地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在格罗尔的民主党人周围动员起来的少数残余反革命分子并没有得到机会。但是共产党人把反革命的概念扩大了，把以任何方式反对他们的所有人都包括进去。

我们共产党人不要任何反对派，无论什么反对派都不要。我们要的是绝对的权力、这样我们就可以更有效地统治，就可以建立一个无干扰的无阶级社会。一九四五年夏天，讨论修改选举法草案时，我们有意加上了一些条款，实际上使反对派无法参加竞选。我们很了解反对派四分五裂、漫无组织的状况！我们知道，我们可以

以“同敌人相勾结”为理由取消他们的公民权利。党的领导对我们在竞选中取胜的机会做了现实的估计，考虑了我们的战时成就、我们的组织、共产党人在举行起义地区的声望。我们估计，我们至少可以赢得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的选票。可是，我们决定，选举法应该这样措辞，以阻止反对派参加竞争，不让他们在法律上确立自己的牢固地位。

格罗尔曾是政府的副主席。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八日，他向铁托递交了一封辞职信。这封信卡德尔给我看了，使我注意了这件事，信中说，我们是固执的、不老实的和空谈理论的。这封信给我们最高领导人深刻印象的是它的稳重的、有素养的和尊严的语调，而不是信中论据的有力。因为我们的良知、我们的力量和我们的体制早就是片面的了；我们已经牢牢地扎根于一党制之中。民主这一选择完全被抛弃了；它已经被消灭了。我们和过去的政治形式的联系被割断了；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开始建立起来了，事事都必须从头开始建立这种秩序。

一九四八年同苏联发生对抗以后，党内有人反对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这一情况并没有给民主的和多元的解决办法带来希望。当然，对立的方面，即亲苏方面，完全排除了这种可能性。

五十年代初，情况有所不同。那时候各个派别主张重建现有社会秩序，以保证更有生气的政治发展和意识形态的独立。因为对这种方针的压制刚好发生在党对我

进行清算的时候，所以人们常常把这些改革归因于我。但是实际上一些可变因素，即民族的、哲学的和意识形态的因素起了作用。

六十年代末，南斯拉夫又有了一次民主化的机会，这是最有希望的一次，虽然也是最靠不住的一次，因为克罗地亚出现了民族共产主义（米卡·特里帕洛，萨夫卡·达普切维奇一库查尔）和塞尔维亚党领导内部出现了民主运动(马尔科·尼凯集奇，拉廷卡·佩罗维奇)。

克罗地亚的民族共产主义不是建立在某一特定的政治哲学上，但是它是生气勃勃的、现实的，它要求自治权，包括公民权和经济权。南斯拉夫从苏联式的文化和行政的联邦制转变为拥有一定自治权的共和国联邦，就是克罗地亚的民族共产党人展开活动和随机应变的直接结果，克罗地亚的其他民族主义分子也参加了他们的队伍。最后，这个运动扩大了。铁托自己没有领会到这件事的意义。后来他说，他受骗了。克罗地亚的领导利用了他的虚荣心，发誓效忠于他。他们在报纸上把他作为一个克罗地亚人加以颂扬，并且组织欢迎会欢迎他。他们得到了他的支持，但是当这个运动显然发展到了不可控制的程度，而且被非共产党的势力左右时，铁托就在一九七〇年十二月撤换了克罗地亚党的领导人，并且下令逮捕最著名的和最有战斗性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

在塞尔维亚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但是那里的反对派没有得到巨大的支持，或者说没有民族主义的情绪。

塞尔维亚反对派主要由党的上层知识分子、新闻记者以及艺术家和作家组成。他们没有明确宣布，或者更确切地说没有得到机会宣布一个明确的意识形态纲领。显然，他们支持民主的方法。不管他们知道与否，他们所遵循的是塞尔维亚的民族自由传统。他们没有真正的权力——警察和军队是由中央控制的——而且他们没有组织起来。无论如何，铁托召开了非法的塞尔维亚党执行委员会会议；当他在那里不能得到多数时，他就让从党的底层和秘密警察抽调来的他的人支持他，这样来排除塞尔维亚的反对派。

在斯洛文尼亚和马其顿也进行了类似的清洗，消灭了那里的民主民族主义分子。

铁托能不能采取别的行动，而又不使他的成就受到损害呢？这是一个不适当的问题！铁托的成就是自成体系的、独立的。真正的成就会产生创造性的力量。七十年代初，铁托比以往更加坚决地阻止改革的运动。他迫使社会、民族和个人从事创造的可能性重新受到过分简单化的、消失了生气的他青年时代的理想的束缚，即受党、阶级、马克思主义和思想灌输的束缚。

铁托是在共产主义运动的范围内取得了独一无二的成就的政治家。但是在更广泛的民主和人道的世界的范围内，他却遭到了重大的、无可挽回的失败。他是一个才智惊人、本能精确无误和精力无穷的政治家，但是他太迷恋于个人的权力，以致在关键时刻压制了本来可以

丰富生活，使它对个人、对社会来说都更加开放、更有创造性的力量。

铁托是个伟大的、具有很大独立性的政治家，但是我相信人们将会看到，他并没有创造出精神和制度上的持久的东西。铁托主义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消逝，如果人们把铁托主义看成是指个人权力，实行一种所有制，党的官僚的垄断以及一党制，并以此作为内部团结和对外独立的基础的话。这一消逝过程是从铁托去世开始的。但是约瑟普·布罗兹·铁托作为一个历史性人物在他死后仍将存在下去，因而在今后长时间内他仍将是人们要研究分析的。

铁托的成就和铁托的品格是分不开的。他的品格比他的成就更加引人注目，更别具风采，而且也更持久。如果铁托不是根据他本人的意志，不是往往为适应他的弱点而估量和调整他的党和他的国家的许许多多努力的话，情形就会不同了。毕竟是成就造就了个人，而不是个人造就了成就。

封面
书名
前言
正文